

# 當代港澳

*STUDIES ON HONG KONG & MACAO*



迎接澳門回歸特刊

99

第二期





当代港澳  
1999年第2期  
(总第13期)

# 目 录

主 编:

许锡挥

郑佩玉

副主编:

周运源

孟庆顺

郭天武

主办单位:

中山大学港澳研究中心

电 话:

(020) 84113279

传 真:

(020) 84036749

邮政编码:

510275

出版许可证:

GD-1152

刊 期:

逢6月15日

12月15日出版

本期出版日期:

1999年11月15日

## 展 望

利用和发挥澳门的文化特色,落实“一国两制”

..... (澳门) 魏美昌 (2)

澳门发展与区域合作 ..... (澳门) 黄汉强 (8)

澳门回归的形势分析 ..... 孟庆顺 (12)

## 专 稿

澳门回归与内外合作研究 ..... 周运源 (18)

澳门回归与穗澳高等教育合作 ..... 赵大英 罗干坤 (21)

## 经 济

澳门社会价值观之特点 ..... 李 萍 (25)

## 文 化 教 育

论澳门经济增长的外生性与内生性 ..... 陈广汉 (28)

粤澳经济合作发展新阶段 ..... 李华杰 李永杰 (31)

依靠科技振兴澳门经济的策略思考 ..... 郑佩玉 (35)

澳门旅游博彩业的发展路向与对策 ..... 雷 强 李 邨 (39)

论澳门旅游博彩业的发展方向 ..... 黎熙元 (41)

粤澳工业合作探讨 ..... 陈丽君 (45)

## 法 律

澳门现代教育的发展 ..... 王季云 吴福光 (48)

澳门文学的发展 ..... 栢 媛 (50)

## 历 史

澳门与内地司法协助问题论析 ..... 李启欣 (52)

论澳门民法的渊源和效力 ..... 邓伟平 (55)

## 本 刊 声 明

·本刊所发表署名文章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编辑部的意见。

·本刊所刊登的图文均保留版权,请勿擅自转用。

# 利用和发挥澳门的文化特色， 落实“一国两制”

澳门中华拉丁基金会执委会主席 魏美昌

## 一、前言

澳门的回归已进入最后倒数阶段，面对这个即将来临的重大历史时刻，澳门人的心情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当然是澳门终于可以回归祖国的怀抱，忧的却是过渡期里的许多问题，如何落实“一国两制”问题尚待具体解决。

众所周知，澳门是弹丸之地，人口稀少，资源匮乏，是一个典型的对外高度倚赖的经济体系，她在金融及商业方面不可能与香港竞争；而在人力资源及市场规模方面，亦无法与中国其他城市比较。澳门于七十年代欣欣向荣的劳动力密集性工业到了八、九十年代便渐趋衰落，于是经济学家及专家们开始另谋出路，试图为澳门重新定位，指出澳门除了是一座赌城之外，还可发展成为珠江三角洲西部地区的一个战略枢纽。他们认为当澳门能在信息、通讯、交通、金融、技术及管理经验等方面提升到国际化程度后，便可吸引更多的外来投资者和游客。

专家们描绘的蓝图虽然美丽，但却有舍本逐末之虞。即使现时澳门国际机场的运作日上轨道，联接中国大陆腹地的铁路及高速公路已开始修筑，深水港的建成亦指日可待，但是，澳门在完成这些基

本建设后，能否成为一个区域性的战略枢纽呢？答案仍是否定的。因为文化特征才是一个国家、地区或城市的魅力所在，城市的基础设施如果不能配合其特有的“上层建筑”，充其量只是一具失去灵魂的躯壳。作为一座城市，如果澳门只追求基本建设（即硬件）的现代化，而忽略对文化特征（即软件）的保护与改善，那么本身的特质就会逐渐消散，最终与中国其他沿海城市同化。更大的问题是，澳门若丧失了本身的文化特征，势必轻易地沦为强邻香港或珠海的附属物。这绝非危言耸听，澳珠关系是无法与港深关系相提并论的，因为相对于深圳，香港在经济及财政上均处于强势，港深两地互动的结果只能是使深圳变得“香港化”；而澳珠关系则刚好相反，珠海不论面积、人口及资源都远比澳门优胜，两地之间一旦消除了边境障碍，澳门势必日渐“珠海化”，那时，在澳门实行“一国两制”的构想将完全失去意义。

因此，澳门极需全力保护本身的文化特征。而中葡联合声明及澳门基本法亦为此奠定了法理基础。但是，现在若不积极落实具体措施以保护澳门的文化特征，有关的法律保障就只会流于形式。与邻近城市（包括香港）相比，澳门实在是地小势弱，只有在历史文化背景方面能够占有优势，因此，九九年后，澳门应继续强化本身在长达四个半



世纪的东西文化交流之中形成的文化纽带,才有望在“强敌环伺”的情况下成功开发其他中国城市所无从竞逐的发展空间,以期进一步发展为一个能服务于中国及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联系欧洲及拉丁语系国家)的战略枢纽,在下一世纪发挥出独特的中介作用,为中华民族作出更大的贡献。

## 二、澳门的文化特征

澳门和广州是中国由明朝以来最早对外开放的两个港口,其中澳门的地位尤其特殊,因为她被中国朝廷划定为西方人在华居住的唯一地方,必须向中国朝廷交税。明、清两代均指定葡萄牙人及其他西方国家人士只能利用澳门作为他们进入广州进行贸易的基地,而不可在广州居留,由此可见,澳门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完全开放”的经济文化特区。

因此,在十六、十七世纪,澳门得以成为连接东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据点,贸易网络北至日本,东经马尼拉到墨西哥和南美洲,南到印度支那和南洋各地,西经印度和非洲东岸至大西洋和地中海,是继郑和下西洋一百年后,东西方的贸易合作真正得到开发扩展、取得更大突破的重要时期。随着转口贸易的繁荣鼎盛,来往澳门的西方人士愈来愈多,澳门亦成为了天主教教廷在远东的传教中心,传教活动更进一步带动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深层发展。创办于约四世纪前的澳门圣保禄学院,虽然以传播宗教作为学习宗旨,但却是在东方建立的第一所西方式大学。耶稣会士从西方到圣保禄学院来学习中国语言、风俗习惯及中国文化,也学习日本的语言、风俗习惯及其他东方文化,因此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汉学家。另一方面,该所学院亦录取中国学生修读拉丁文及研究西方文化,造就了中国第一代精通西方文明的专家。这些中西学者,包括耶稣会士和中国的有识之士,例如西方的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神父及中国学者徐光

启、李之藻、梅文鼎、何国棟、吴历等等,正是带动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者。在他们的努力译译和推介下,中国人首次接触到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建筑学、医学、军械学、音乐、绘画等西方科技和文化艺术,而中国的哲学、医学、绘画、茶道、瓷器、漆器以及许多其他文化精粹亦被推广到西方。

这个广袤而深远的文化交流对东西方社会的冲击都十分巨大,以致分别导致重大的社会变革。在西方,上述的交流推动了启蒙运动,使法国、德国及意大利的社会革命走向巅峰,并开创了富有东方特色的洛可可新艺术风格。另一方面,西方科技文化和思想之传入亦改写了中国的近代史。中国近代的风云人物,如太平天国农民领袖洪秀全,对抗贩卖鸦片的民族英雄林则徐,策划中国自强运动的郑观应,以至中华民国的始创人孙中山先生……所有这些杰出的领袖都是透过澳门得到接触外国思潮的机会。在消化这些外来的“精神食粮”后,以改革社会为宗旨的新思潮,开始在中国及日本的土壤上萌芽和蔓延,动摇了几千年单一而封闭的东方传统文化架构,同时亦揭开了多元化及开放的新纪元的序幕,推动了东西方在文化、科学、技术及教育等领域上的新跃进。总而言之,澳门虽小,但却曾对中国的现代化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值得强调的是,虽然在十九世纪中期英国人以武力占领香港,以其不平等和强制的形式对澳门产生了负面影响,使葡人在澳门的扩展和占领过程中亦与华人发生流血冲突,但整体上看,澳门本土的东西文化交流基本能在互相尊重的基调下进行。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及其他西方人并没有将背负着数千年文化传统的中国人强行同化,而中国人也没有对科技比自己优胜的“化外夷人”盲目排斥。这种互相尊重、互相包容的精神在澳门深厚地扎根,使澳门文化中的中华和拉丁特质一直并行发展,即使出现碰撞亦能体现出和谐多于冲突、平衡多于对

抗、包容多于分离的特性。这种相互影响更以螺旋向上的循环方式带引着澳门整体文化的发展。从本土的宗教发展中当可窥见澳门文化的此一特点：在澳门，道教、佛教、回教、妈祖信仰、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巴哈伊教等不同宗教长期并存，很少发生像其他地区那样的流血冲突，各种宗教在社会上拥有平等地位，直到现在，本地一些重大的庆典上，还总是邀请佛教的大师和天主教的主教一同以各自的方式进行祈福，为世界上所罕见。

从港澳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以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为主流的香港文化和以拉丁文化为主流的澳门文化，具有不同的特色。虽然两者均为欧洲的强势文化，但英国人因其国势较强，就具有更多的强制性，强制本地华人接受英国文化，受英国教育；但葡人因其国势渐衰，而少具强制性，不强制本地华人学葡语或接受葡国文化。因此形成两种不同的统治精英，前者培育了一套以华人为主体的英式管理制度和管理人才，而后者则仍保存以祖家的葡人为主要统治者，辅之以本地的双语葡生土人充当中、下层官员，以便与本地华人沟通，而且其管理制度只是在1974年葡国革命后才走向民主化，大大落后于英国人。此外，在香港实行的是不成文的欧洲海洋法，而在澳门实行的是成文的欧洲大陆法，比前者更为严谨，但实行起来有时更为繁琐。既然港澳两地所实行的是不同的管理模式，不同的法律制度，就不能简单地加以等同，尤其是在落实“一国两制”的进程中，更不能忽视两者的不同特征。

在中西两种文化的交融方面，港澳两地亦有差距。与英国人不同，葡人鼓励不同种族通婚，因此在澳门四百年来形成了欧亚混血的特殊阶层，即葡人后裔，通称土生葡人，他们仍然沿用葡人姓名，受葡文教育，信奉天主教，但母语却是广东话，在民俗方面亦吸收了不少中国的传统文化，被称为双重文化人，在澳门历史上起了沟通葡人社会与华人

社会的重要中介角色。他们大部分已移民海外，但留下的还有一万多人。他们在语言学、文学、建筑学、美学、神学等方面都融合了东西方文化的因素，形成澳门独特的新一代文化，其中有不少杰出的代表，例如汉学家高美士，文学家飞历奇，美术家马若龙等。

这种文化融合现象在民俗方面更为普遍，例如中西合璧的婚礼和烹饪尤为明显。以中国的民族音乐来伴奏葡国民歌法度在澳门已试验成功，在欧洲乐坛上轰动一时。被“本地化”了的葡式蛋挞在港澳台曾风靡一时。

澳门著名的拉丁风格结合中国传统风格的城市建筑模式又是另一个文化互相渗透的具体见证。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体现于教堂、庙宇、堡垒、亭阁、房屋、店铺、花园、墓穴、广场等建筑物的身上，构成独特的文化遗产。澳门比香港及中国其他地方幸运的地方，是这些文化遗产，连同保存在教堂、庙宇、洋行、当铺内的书面资料和档案，加上在中国大陆已经失传的某些习俗，都能够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这是基于澳门在历史上的特殊际遇，使她得以成功地避开世界大战、国共内战乃至六、七十年代那场著名的文化浩劫的破坏。

澳门本身就像一座活生生的博物馆，一个人类文明的巨大宝库，对学术研究及发展文化旅游提供了独特而丰富的资源。因此具有拉丁文化特征的澳门文化及其和谐模式需要长期保留，并应继续加以探索 and 开发，以建设与香港不同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同时利用澳门的文化特色发挥它在中欧之间的桥梁作用。

### 三、保留澳门的文化特色

一位旅居海外的华人学者，在来澳访游时，曾对澳门的价值作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评鉴。他说，如果香港是一颗“东方之珠”，澳门则是一颗未经



雕琢的天然钻石，只要有适当的琢磨，终将成为光芒万丈的宝钻。

但是，如果得不到恰当的琢磨，这颗钻石便有逐渐蜕变成一块普通石头的危险。倘若在九九年后，我们抱着狭隘的民族主义或极左思想，把澳门文化遗产中的拉丁色彩及中国的旧传统视为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垃圾加以扬弃，那么澳门将会变成甚么样？

可喜的是，我们对此不必过度悲观。因为在澳门本土及海内外华人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保留及发挥澳门文化特征的重要性。而且，保留澳门文化特色的必要性在中葡联合声明及澳门基本法中早已有明文规定，目的就是为了保留澳门原有的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制度五十年不变，真正落实“一国两制”。澳门的这些政治法律文化及其他属于“上层建筑”的宗教、文化艺术等，是在澳门四百多年的历史中逐渐形成的，除了殖民主义的某些成分之外，大部分应予保留，使澳门能够作为一个具有特色的特区，长期存在下去，以担任称职的中介角色。

以下提出一些保护澳门文化特征，以促进澳门经济、文化发展的措施：

### 1. 加强学术交流与积极推广葡语

尽管澳门政府、澳门东方基金会、澳门基金会、澳门中华拉丁基金会等机构鼓励和赞助海内外学者对澳门进行研究，澳门亦曾举办过很多以本身文化特色为主题的国际性研讨会，但总体上说，本土及海内外对澳门文化的系统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因为它是跨越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文学、法学、教育学、政治学、经济学、美学、音乐、神学、哲学、建筑学、民俗学及烹饪学等多个不同领域的学科，需要投入更大量的人力物力才能充分研发。

今后，澳门大学作为澳门最高学府，可与香港及欧洲各大学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使澳大的教学与

研究工作达到国际水平。一方面聘请高质素的教授和讲师任教，并令澳门及周围地区就读的学生有机会进入欧洲各大学进修；另一方面要加强澳大的研究工作，使其为本地及周围地区的工商界及社会提供更佳的服务。澳门宜成为欧洲与中国的训练中心，集中在语言和法律方面，一方面鼓励亚洲学生到澳门学习欧洲语言（葡、法、西、德等）和文化，以及欧洲大陆法和管理模式，另一方面鼓励欧洲学生在澳门进修中文和中国文化，并定期在澳门组织这方面的研讨会，促进中国与欧洲的相互了解，推动法治建设。

近年来，澳门成立了欧洲研究中心，在保护知识产权和保护档案方面亦做了一些培训，但本人认为还可利用澳门的多语言环境建成亚洲独特的语言培训中心和谘询中心。以葡语来说，澳门是亚太地区唯一在下个世纪继续保留葡语作为官方语言的地方，应充分利用本身的优势，大力推广葡语，并吸收亚洲各国的学者来澳门学习葡语和葡国文化，包括欧洲大陆的法律文化，以便同巴西、莫桑比克、安格拉等葡语国家沟通。在此基础上更可把语言培训范围扩大至整个拉丁语系（如西班牙语、法语、意大利语和罗马尼亚语等），由于属拉丁语系的国家人口相加约占世界人口的六分之一，分布在南欧、非洲和美洲，是潜力极大的发展中市场。澳门可以成为亚洲地区的首个拉丁语培训基地，以成为中国乃至亚洲各国打入这个广阔市场的跳板。

### 2. 推动公民教育

要长久保留澳门的文化特征，必须令澳门市民对澳门文化产生深切的认同。而事实上，大部分来自中国内地的新移民或从世界各地移居澳门的海外华人，对澳门归属感并不浓。至于土生葡人，虽是在澳门土生土长的一群，但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已移民海外，留下来的对政权移交后本身在澳门的前途仍存有疑问。因此，在余下的过渡期内，公民教育应摆在优先的位置。在宣传基本法之余，政府亦应

向澳门市民,尤其是年青一代加强宣传澳门的特征(包括历史、地理、法律及政治制度、文化及宗教等),以及这种特征在澳门未来角色定位中的重要性。

几年前建成的海事博物馆,刚落成的澳门博物馆及文化中心,无疑能让市民对澳门历史文化增多一点认识,但政府有关机构还应该为普通市民编写有关于此的小册子和刊物,并编写有关教科书及把相关课程列为中小学的必修课,使澳门的新一代能够对澳门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更明确的认识。

### 3. 改善及充分利用澳门的文化遗产

近年澳门政府不遗余力,动用巨款,以确保具有极高文化、艺术及历史价值之遗址受到保护。对岗顶前地、下环街前地(阿婆井前地)、福隆新街等旧区的修葺,便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有需要修葺之遗址还很多,这项工作除可使澳门的老区成为一座活的博物馆以供游客参观外,同时亦可为公民教育作出贡献,是一项既深具价值,又需要延伸至一九九九后的宏伟计划。

今后,特区政府应利用澳门的文化特色大力发展文化旅游和休闲活动。为了吸引更多的游客(1996年来澳门的游客曾达到八百万之高峰,是人口的20倍),满足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爱好、不同种族的游客的需要,应当在博彩旅游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文化旅游。为此,一方面需要继续整理和改善原有的旅游景点,使保护文物工作能够延续下去,严格控制澳门半岛内的建筑风格模式,使新旧建筑更好地协调起来,保留其固有的欧亚风格。在文物保护区设置更多的旅游步行道,并将半岛内过于密集的人口逐步迁移至离岛,使半岛内更易于进行文物保护工作。

另一方面,要在离岛和填海区增设新的旅游景点,即以澳门文化特色为主题的文化娱乐公园和相关的设施,而不是简单地抄袭别的地方已有的主题公园。正在兴建的“观光”和“海洋世界”就是以

发展澳门独特的文化旅游为宗旨的,以吸引欧洲游客了解中国文化,吸引亚洲游客了解欧洲文化。为此需要开辟中国与欧洲经澳门的旅游专线。

为了更好地开展文化旅游活动,我们需要培养经过严格训练的导游和其他专业人才,澳门的旅游学校可提供这方面的服务,但需经过更进一步的改革与提高。

此外,还可以充分利用澳门比香港更为宁静、宽松和富有文化气息的环境,使澳门成为国际会议中心、展览中心、文化交流中心(如举办国际电影节以及富有拉丁特色的国际音乐节、艺术节、美术节等),而且可设立休闲中心、安养中心,提供中西合璧的高质素医疗保健服务。

### 4. 密切与欧盟的联系,加强两岸之间的中介作用

澳门的经济是外向型的,至今与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关系,其中美国和欧盟是澳门的主要贸易伙伴。澳门还参加了47种国际性和区域性的组织或协议(包括世界贸易组织WTO),是我国独立的关税区。这些关系在99年回归之后,应当继续扩大和发展。

但是,我们认为澳门应重点发展同欧盟的关系,因为自从葡国于80年代加入欧共体之后,欧共体通过葡萄牙对澳门予以特别照顾,于1992年同澳门签订了优惠合作协议,在投资、贸易、关税、环保、电讯、咨询、旅游、金融、科教、培训、反毒、传播、文化、社会发展等多种领域内给予澳门以特惠待遇,而在亚洲地区,只有澳门享受此待遇。

与此相关的是在澳门设立了欧洲资讯中心,将欧洲二百多个资讯中心通过电脑与澳门联网,提供欧洲有关国家关于贸易、投资、法律等各方面的信息,同时又可以通过澳门的欧洲资讯中心向欧洲各资讯中心提供澳门及其周围地区的信息,以促进双向信息交流。

此外, 欧盟还设立了亚洲伙伴计划, 鼓励欧亚两地的中小型企业结成投资和贸易伙伴, 以取得贷款、贸易、培训等方面的优惠条件。而澳门被列为缔结此伙伴计划的理想地点, 因澳门同欧盟签订了上述优惠协议。

由于澳门政府没有认真宣传和推广有关协议与计划, 因此 92 年欧澳协议的潜力远远没有发挥。不过欧盟仍然决定将欧澳协议延续至下个世纪, 99 年在澳门派常驻代表以协调各方面的活动, 亦希望澳门在加强欧盟同中国的关系上能发挥自己的中间角色。对欧洲人来说, 澳门仍是在中国土地上唯一有着文化认同的地方, 因此, 只要澳门下决心保留和发展本身的文化特色, 继续推广葡语, 必能在中欧之间的贸易、投资、技术转让和培训等领域发挥积极作用。

为了扩大欧洲在澳门的投资或利用澳门作为中转站, 今后必须改善澳门的硬软环境, 并设立国际学校, 让更多欧洲人和台湾人在此地落户。欧盟预料目前靠配额维持的澳门纺织加工出口业 (97 年占澳门出口 85%), 到本世纪末多纤维协定 (即配额) 取消后, 澳门输往欧美的出口额 (各占 35% 和 40%) 将大幅减少。因此必须开辟其他途径, 例如加强欧盟投资伙伴计划和亚洲投资伙伴计划在澳门及其周围地区的推广, 吸引大陆、台湾的中小企业在澳门与欧洲中小企业合资, 开辟大陆和欧洲市场, 促进两地或三地的技术转移, 发挥澳门的中介作用。

其实, 有很多内地的企业家, 特别是广东, 也在利用澳门打入欧洲市场, 但澳门所能够提供的咨询和各方面的条件仍不足够, 有待进一步开发和沟通。为此, 澳门方面需要大力改善澳门投资促进局、澳门生产力中心和欧洲资讯中心的工作, 促使他们加强研究和推广, 并提供更佳的咨询服务。这项咨询工作应扩大至民营部门, 并充分利用海外华人和土生葡人网络, 以缩小中欧两地企业家之间的文化差异, 这种差异是双方进行投资和贸易的极大障碍。

#### 四、结 语

澳门虽然小, 人力和财力有限, 无法与香港相比, 但只要应用得当, 扬长避短, 必能用有限的资源来扩大自己的优势, 发挥香港或其他沿海城市所不能替代的中介作用, 在 21 世纪的生存竞争中脱颖而出。无疑这是跨世纪的系统工程, 要实现此目标并非易事, 而且决不可能在短期内达成。因此我们必需取得北京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 寻求国内外朋友们的认同和鼓励, 并由现在开始争取时间, 朝著这个目标进发, 以期为将来的特区政府多奠下一块基石。希望特区政府由一批熟悉和珍惜本澳文化特征并由懂得利用这种特征的人组成, 以便加强澳门的对外联系, 认真落实“一国两制”。

【责任编辑: 周运源】



# 澳门发展与区域合作

澳门社会科学学会会长 黄汉强

## 一、借力发展 迎接挑战

澳门回归祖国在世纪之交，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踏上新历史新里程，这是中华民族继香港回归后又一盛事。

新世纪是和平、合作与发展的世纪，是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世纪，是知识与科技创新的世纪。澳门的新里程是实践“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新里程，是开创新时代建设新澳门的新里程。在新世纪中，顺利而又出色地完成这个新里程，是摆在 40 多万澳门人面前的光荣而重大的历史使命，也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澳门是个微型经济体，地域狭小，资源缺乏，科技单薄，加上回归建立特别行政区之初，又面对着复苏经济、整治社会治安、理顺政府运作，提升基本制度水平和公务员素质的难题，澳门人的历史使命既光荣又重大，也是历史提出的严峻挑战，其复杂性与高难度可想而知，因此，必须有正确的足够的估计和自强不息、知难而进的信心和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

事实上挑战与机遇从来就是并存的，既是严峻的挑战，也是难得的机遇。因为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为澳门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增长点和新的发展空间。知识经济与实物经济不同，是以知识的生产和应用为本的经济，其特点是大量消耗脑力劳动和较少的物质资料，产出的知识产品数量是以

投入的脑力劳动成正比例，相对而言，发展毋需巨大的物质资源、劳力资源和广阔的土地，只需密集的知识和较少的物质，不是以企业规模而是以科技创新取胜，因此为缺乏资源的微型经济体提供新的持续发展的良好机遇。另一方面，“一国两制”的优势亦为澳门提供新的发展空间和动力。因此，机遇是十分有利的，甚至是空前的，问题是如何把握和利用，迎接挑战。这就是要制订一套符合世界潮流、周边地区客观环境以及澳门主观条件的经济及社会发展战略，大力推进区域合作。

关于澳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十多年来，澳门本地朝野以及内地特别是广东学术界都做了不少研究工作，时至今日，基本上逐渐形成共识。在这个基础上，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与北京大学港澳研究中心联合成立的“澳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课题小组，经过两年的调查研究，今年四月提出的澳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是：“继续依靠和加强与香港和内地的紧密联系，近中期（10—15 年）力争成为亚太地区一座有特色的现代化的以第三产业为主的旅游博彩和娱乐城市，以及周边地区的后勤支援基地；远期成为区域内的国际性的综合旅游和商贸服务城市。”

无论是澳大北大联合课题小组提出的还是其他机构和学者提出的澳门经济发展战略，无一不考虑澳门在区域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无一不力倡区域合作。澳门基于自身环境的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自力更生受到极大的局限，在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

的大潮中,借力发展加强区域合作是不被浪潮冲倒而保持航速到达彼岸的唯一道路。

澳门同内地(尤其是广东地区),同香港、台湾都有地缘、亲缘、史缘的关系。澳门的发展,无论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离不开而且依赖内地因素(广东因素)和香港因素,近十年来澳台关系的发展表明,台湾因素也起重要作用。

中国内地改革开放的20年来,内地因素对澳门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越来越重要,它是澳门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腹地 and 后方,保证了澳门必需的生活资料、生产资料以及资金、劳力、技术的供给,亦提供了伸延至内地发展的广阔空间。澳门与内地的贸易额,从1979年的5.48亿元(澳门元,下同)增至1998年的62.49亿元,增加10.5倍,内地成为澳门第三大贸易伙伴。同年随旅行团到澳门的内地游客47.5万人,占当年来澳旅行团游客87.1万人的54.1%,占总体游客的6.84%,仅排在香港客、台湾客之后成为澳门旅游市场的第三大客源。在澳门外来资本中,中资(内地资本)居首位,在金融、贸易、旅游及房地产业中的比重占30-70%,开设企业200多家,资本总额超过400亿元。如果将其他以各种名义投放在澳门的中资计算在内,资本总额估计多达900亿元。而澳门在内地的投资,1998年底累计有6000个项目,投资协议资金总额超过90亿美元,实际投入33.04亿美元,在内地吸引的外资中排列第10位。

澳门与香港只一水之隔,唇齿相依,休戚与共,香港因素对澳门经济发展的襄助和推动作用极其重要,不可取代。澳门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吸引香港的资金、技术来发展,同时亦充分利用香港对外交通基础建设和世界四大中心(金融、贸易、运输、资讯)的地位、设施和网络,强化自己的竞争力和扩大对外活动的空间。据不完全统计,澳门出口加工业中,大约60%左右是从香港转移过来或港商在澳新开设的;对外贸易中,香港是澳门的最大的贸易伙伴,进口中有30-40%是从香港进口,出口中对香港的出口占第三位。至于越洋的进出口,大部分货物都经香港转口。在旅游及博彩市

场中,香港为第一客源,占来澳游客总数70%以上。在房地产市场中,香港货家占六成左右。在货币流通中,港币亦约占60%。至于澳门居民中,有四分之一大约16万人同时持有澳门和香港身份证。今天的澳门,已成为香港市场伸延和补充的辅助城市。

90年代以来,澳门与台湾的关系也日益密切,特别是两地机场通航以后,距离大大缩短,只需1小时又20分的航程,加上澳门对台湾客实施免签证入境的措施和“一机到底”“一票到底”准直航到大陆的政策,往来两地或两岸都十分方便,对两地的经贸关系的发展起着促进作用。例如两地贸易总值,1987年仅为2330万美元,1998年3.668亿美元,增长1548.5%。(台湾“财政部统计处”资料)台湾来澳旅客,1988年84076人,1997年906740人,增长1078%。(澳门统计暨普查司资料)关于台湾商人在澳门的投资(主要是在旅游、工业、商贸及房地产行业)估计超过10亿港元。

由此可见,通过区域合作特别是两岸四地的区域合作借力发展对澳门经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 二、澳门实行区域合作的可能性及其取向

澳门所以能够实行区域合作借力发展的战略,是因为澳门自身拥有多项优势,对外力有一定吸引。这就是:1. 区位优势;2. 自由港优势;3. 对外商贸网络优势,其中包括欧共体的伙伴关系的优势;4. 东方“蒙地卡罗”的国际名牌优势;5. 历史文化优势;6. “一国两制”优势。其中区位优势、自由港优势和“一国两制”优势最富吸引和便于争取外力。

无论在粤港澳大三角经济区域中还是在两岸四地的大中华经济区域中,澳门都不是中心城市,而是边缘城市,处于中介地位,难以发挥辐射作用。但又不是是一般边缘小镇,而是背靠大陆面向世界的中国南疆的自由港,是具有400多年历史的东西方

贸易易枢纽和中西文化交汇之地,今天最具优势的功能是作为中国对外的“桥梁”和“窗口”提供中介性的服务,包括综合旅游服务和商贸服务,借助内地、香港及台湾的资源、资金、科技、人才等优势,推动各行各业创新,改进技术和方法,酌情发展以科技为本的高增值的综合旅游和商贸服务业,以及作为基础的高增值的出口加工业。而提供的高质高效的中介服务不仅是区域性的,也是国际性的,对象不只是内地及港台,也是世界各国特别是欧盟各国及拉丁地区。

澳门推行经济合作,实行周维平教授提出的“近靠远交”的策略,根据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有分别地发展专项的合作关系。例如同广东和香港,建立粤港澳大三角旅游区,利用三地各有特色的旅游资源,组合丰富多彩的旅游项目,如香港购物游、澳门娱乐游、广东及内地岭南文化(中华文化)游和锦绣河山游等。这个大三角还可以利用澳门的国际机场的“准直航”同台湾联网成两岸四边旅游区,加上一项台湾宝岛游。

又如同广州合作实行优势互补,在澳门建立科技产品孵化区和高新科技转移中心,前者将内地的高新技术产品在澳门孵化为商品,推向国际市场;后者将内地高新科技转到海外或者将海外高新科技转入内地。

再如同台湾合作在澳门建立台湾工业区或者使澳门成为珠江三角洲台商企业服务基地。

澳门同珠海两地相连,更应提升和加强两地的互补合作共同发展的关系,特别是在交通基本建设和开发海岛方面,例如共同开发靠近澳门的横琴岛,建成汇粹中西文化的“国际特别旅游区”。

澳门同香港是中国的双生子,早已形成了不可分割的自然组合。澳门回归后,两地都实践“一国两制”,关系必然更加密切,相依相助也必然加强,两地合作将趋向经济一体化,即“在两个特别行政区独立运作,保持各自经济多元发展的前提下,建立一个有机的合作体系,让经济要素得以在更大的范围内自由流通和合作配置,互补互利,从而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澳门大学、北京大学联合课题

组:《提升澳门竞争力战略研究报告》)。

澳门还有一个已存在的国际性的区域合作及一个潜在的国际性的区域合作。前者是同欧盟的合作,早已提到日程上,并签了建立伙伴关系的合作协议,问题是推行不力,成效不高。后者是同拉丁语系区域的合作,虽然还未完全摆上日程,但潜力很大。澳门同两个国际区域的合作,都须加大力度去推动,特别是同欧盟的合作,可以分别联合内地和台湾来发展。目前澳门已在欧盟总部布鲁塞尔设有经贸代表处,欧盟亦在澳门设立亚洲唯一的欧洲资讯中心。

### 三、发展区域合作的原则和措施

发展区域合作,需要遵循以下三大原则:

#### (1) 优势互补、分工合作的原则

无论是粤港澳三地还是大中华四地,在自然条件及社会环境方面都有共同之处也有相异之点,发展经济各有优势也各有弱项,因此,区域合作须建立在优势互补、分工合作的基础,唯有优势互补,才能达到分工合作提升四地竞争力的结果,生产要素的交流,资源获得最有绩效的利用和避免浪费,形成更高的生产力。

四地的比较优势,相对而言,内地是地大人多资源丰富,科技实力雄厚;香港是四大国际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交通中心和资讯中心;澳门是旅游博彩胜地、自由港及欧盟伙伴,经营成本亦比港台低;台湾拥有较充足的资金、技术和较先进的科技力量。因此,粤港澳的互补合作历史悠久,80年代内地、台湾相继开放,四地的区域合作得以发展和扩大,今天,已达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辅相依的程度,只是台湾因政治因素对大陆的开放还有不必要的限制而已。

#### (2) 互利互助,共同发展的原则

区域合作,优势互补,必须是互利的,同时也是互助的。互利就是对参与区域合作的任何一方,都是有利的,都不能受到损害。不过,不等于利益均等,除了共同组织股份公司按股分红者外,双方

的受益不一定各占50%。因为两地的合作是为了优势互补实行地区分工提高生产力,限于两地条件不同,利益很难完全“五五”分账,很可能是“四六”、“三七”、“二八”甚至“一九”分账。在此种情况下,只要对一方没有造成损害,为了达到互助实现共同发展的目标,也应推动这项合作的。总之,既然两岸四地或者粤港澳大三角,都有地缘、亲缘,在区域合作中,既讲互利又讲互助,是不能因利而忘义的。

(3) “一国两制”平等协商的原则。前述三地或者四地的区域合作,都存在“一国两制”的问题,即使内地同台湾的合作或者港澳同台湾的区域合作,也是“一国两制”。一国就一个中国,两制就是两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因此都必须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互相尊重、互不干预的原则。内地同港澳的合作,更须按照“基本法”的规范,平等协商、互相尊重、互相协调,互相配合。

澳门加强区域合作,不仅要在软件方面(法律和政策方面)继续不断完善,还要在硬件方面(对外交通基础设施)不断作出配合,充分发挥区域的中介作用和自由港的功能。

首先,扩建深水港。澳门虽是自由港,但由于沿海水浅,没有深水港口,最近10年才修建的最深水的路环港,也只有负5米水深,只能停靠5000吨以下轮船。但在东边海域10公里处有一深水槽,负10米水深,有集团已计划在该处海面上建深水码头,停泊万吨海轮,如计划实现,自由港便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此外,亦有学者提出建议,澳门回归以后可向珠海租借附近的深水海岛,例如东南面的牛头岛建大型深水港,效益大投资小。不过由于涉及“一国两制”问题,是否可行,还有待研究。

其次,修建“港澳珠”大桥,跨越伶仃洋,一桥连澳门、香港、珠海三地,同时在珠海和澳门登陆后,分别同珠江三角洲西部地区的铁路网及高速公路网连接起来,既有利于三地的往来,同时可以将区域合作伸延至珠江三角洲西部地区以及西江流

域和内地西南地区,极大地开阔活动空间,提高区域合作的效益和竞争力;另一方面亦大大有助于“一国两制”在港澳的实践。因此,跨海大桥不仅是一座推动区域合作的桥梁。同时也是一座推动祖国统一大业的桥梁。港澳财团和珠海政府都有计划在伶仃洋上修筑大桥的计划,提出了多个方案。只要三地遵照区域合作的原则进行磋商协调,对各个建桥方案进行科学和民主的论证,不难找出“一桥连三地,三地共建共享”的理想方案来,及早施工。

第三,兴建对接珠海伸向内地的基础工程。例如北京至珠海的京珠高速公路正在修建,连接广州、茂名、佛山至珠海的广珠铁路也在筹建中,这两大纵贯南北及沟通西部的交通干线,澳门需要分别兴建对接工程将两大干线引入,目前有些接驳工程正在进行,其中有珠澳共建的连接澳门路环和珠海横琴岛的莲花大桥,将于99年12月澳门回归前建成,而珠海也在加紧完成横琴至湾仔的大桥。这样,澳门通过这两条大桥接驳京珠高速公路直达北京。此外,珠海与澳门接壤的拱北新海关大楼,澳门也须相应地增加关闸的出入境通道和设施,以适应回归后交通流量增加的需要。

第四,澳门原有的对外交通网络设施,如国际机场、往来港澳客货运输系统以及电讯系统等,都应为促进区域合作的需要提其服务的能量和质素。

上述的对外交通基础工程如能兴建或者改善,无疑必将极大推动区域合作,极大地提高澳门的发展空间,极大地提高竞争力,这是达致把澳门建成为区域的国际性综合旅游服务和商贸服务城市的不可缺少的。

不过,兴建这些基础工程,必须有关地区之间做好协调和协作,吸取经验教训,节省资源,提高效益,避免重复建设,做成浪费。因此,成立粤港澳三地基建协调委员会也是十分必要的。

【责任编辑:周运源】



# 澳门回归形势分析

孟庆顺

## 一、澳门平稳走向回归

香港回归后顺利实施“一国两制”、高度自治，为澳门树立了一个极好的先例，澳门回归也在平稳进行中。

首先，中葡双方对多项有关政权交接的议题进行了友好磋商，取得了不少共识。与英国政府刻意在香港问题上制造对抗不同，中葡关系一直比较友好。中葡友好关系的发展为澳门的平稳过渡创造了良好条件。中葡联合联络小组及其附属的三大问题小组、国际问题小组先后召开多次会议，就中葡双方关心的各项议题，诸如三化问题、公务员退休金、澳门政府设立财政储备、资产移交等与政权交接有密切关系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在许多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如双方就澳门继续参加国际官方统计组织、国际档案委员会、国际消费者联盟组织等问题达成协议，就中国外交部驻澳门和葡萄牙驻澳门领事机构设施问题完成了磋商。仅 1998 年 7 月举行的中葡联合联络小组第 32 次全体会议就在澳门葡文学校问题、涉外商事仲裁法案范本、移交被判刑者协定文本问题上达成共识并签署了会谈纪要，会议还就 40 余项国际公约达成协议。一些拖延多年的问题，如东方基金会问题等经过双方谈判，也都获得解决。1998 年 11 月 12 日的中葡联合联络小组组长会议还就成立澳门政权交接仪式工作组问题签署了会谈纪要。

其次，澳门回归的各项准备工作顺利进行。1998 年 5 月 5 日上午，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在北京宣布成立。筹委会的 60 名澳门委员来自各个界

别，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自成立以来，筹委会积极开展工作，对与回归密切相关的公务员本地化、法律本地化、社会治安、公务员退休金、经济、财政预算、主要官员设置、公众假日、回归庆祝活动等重大问题提出了对策建议。1998 年 11 月 6-7 日召开的筹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具体产生办法，标志着澳门特区政府的筹组工作列入了议事日程。1999 年 1 月 16 日，筹委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了特区首任行政长官产生办法。1999 年 4 月 10 日，特区筹委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以无记名和差额选举方式产生了 200 名推选委员会委员。4 月 23 日，澳门特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提名已报名参选的澳门银行公会主席何厚铨和汇业银行主席区宗杰为特首候选人。5 月 15 日，何厚铨当选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5 月 10 日，他被中央政府正式任命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

再次，过渡期三大问题进展较快。在公务员本地化方面，澳门当局创造条件培训澳门本地专业人士，提供机会协助他们进入政府部门。澳门大学、中山大学等教育机构举办了多期澳门公务员培训课程，对提高公务员的文化水平和整体素质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已有 50 多位澳门公务员获得中山大学的公共管理学硕士学位，并被晋升为澳门政府的副厅级官员。中国国家行政学院也为澳门培训了近 200 名高级公务员。1998 年 10 月 15 日，澳门行政暨公职司司长薛尼路表示，澳门政府官员本地化已逾九成。在 600 个领域及主管职位中，有 551 个已

本地化,有10个公共部门的司长或主席也已本地化。具有高等学历的高级技术人员及技术员,以中文为母语的也已达81.9%。

在中文官语化方面,为了满足公务员学习中文的需要,澳门政府开始聘请内地专家,在澳门举办各种中文学习班,也派出公务员赴北京学习。1990-1997年,共举办了15期中文及中国行政课程,有230名澳门公务员参加了为期1个月到10个月不等的培训。

在立法、司法领域使用中文对法律本地化和中文官语化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如果没有中文版本的法律,在法庭中不能使用中文判案,中文的官语地位只能是一句空话,法律本地化也无法真正实现。1988年,澳门政府设立了法律翻译办公室,负责将澳门的葡文法律翻译成中文。在澳门地区的五大法典中,《刑法典》、《刑事诉讼法典》基本完成本地化。随着本地华人司法官员的出现和增多,中文在法庭的地位也逐步提高。截止1997年7月,已先后有两批共11名本地培训的司法人员获委任为刑庭法官、检察官、合议庭法官和独任庭法官、检察官。在1997年7月的两宗案件中,本地司法官分别以粤语和普通话质询报告、进行审理,缩短了案件审理时间,也有助于在场听审者明了事件的审讯过程。这表明司法领域的中文官语化和法律本地化又迈出了新的一步。

正因为三化问题已取得较大进展,1999年3月23日,中葡联合联络小组属下的三大问题工作小组举行第二十七次会议,双方认为,鉴于双方在三大问题工作上已取得明显进展,这次会议将是该小组的最后一次会议。

最后,尽管澳门经济整体萧条,但也有发展极为迅速的地方,即澳门国际机场运作顺利,客货运量逐年增加。1996年,澳门航空公司接载旅客664458人次,第二年增加到989553人次,增幅达49%。该公司货运量同期增长率也高达42.9%。因此,在正式开展业务的第22个月,澳门航空公司

就还清了全部债务,收回了投资成本。澳门机场的发展速度和澳门航空公司的发展一样迅速。1997年澳门机场的航班班次达到19800多班,比上年增加48%。其中客运量为1952578人次,比上年增加60%,货运量为45540吨,比1996年增长82%。1998年在亚洲金融危机的阴影下澳门机场客货运依然保持增长势头。前九个月,共接待旅客1643109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长11%。货运增长速度更快。同期货运量已超过1997年全年的总量,达到45664吨,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幅高达52%。值得注意的是,在1998年香港新国际机场航空货运系统出现电脑故障、货运陷于瘫痪之际,澳门国际机场成为香港机场的临时分流站,飞往香港的部分货机不得已转停澳门机场,输出香港的货物也有些在澳门机场付运。澳门机场的货运量由每天的100吨骤增至900多吨,对解决香港机场的暂时困难起到了重要作用。澳门机场的顺利运作对改善澳门的投资环境、推动旅游业及运输业甚至整体经济的发展都有重要意义。

澳门回归面临的整体形势良好。香港回归的成功先例以及澳门葡萄牙当局的“夕阳”政府心态,促使澳门居民急切地期待着澳门回归的早日到来,从而与香港回归前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但澳门回归同样存在一些在短期内难以解决的问题。

## 二、澳门回归面临的问题

三化问题虽然进展良好,但与澳门政权交接的实际需要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中葡联合联络小组的三大问题工作小组中方组长王西安在该小组最后一次会议上讲,三大问题工作小组定期会议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三大问题工作的结束,三大问题虽然取得明显的进展,但仍然有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

公务员本地化的速度不能适应现实生活的需要,尤其是占人口绝大部分的华人在高级公务员中所占比例太小。随着澳门回归的日益临近,公务员本地化问题显得越发迫切。到1998年8月为止,

在已经本地化的8名司长级公务员中,只有两人为华人。在55个政府部门的102个厅长职位中,以中文为母语者约占41%;副司长55个职位中,说中文者仅有十余人;司长级55个职位中,母语为中文者仅有7人;保安部队警务总长十多人中仅1人讲中文。葡方的政策是到1998年底基本完成所有主管职位及副司长职位的本地化,只在1999年上半年方能把行政当局中较为复杂或较敏感领域的副司长及司长职位本地化。到1998年11月中旬,在澳门政府550个领域及主管官员中,还有约40个职位仍由外聘人员担任。在司级官员本地化方面,尚有12个司长级和11个副司长级官员职位仍未本地化。<sup>①</sup>致使将来可能出现本地人士在完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出任要职,对澳门的平稳过渡将会造成较大不利影响。

在公务员本地化过程中,澳门政府机构越来越臃肿。澳门政府以总督为核心,下设7个政务司协助总督工作,政务司下辖数个司级部门,司级部门下设厅、组、科等。各个部门由上而下构成一个直线组织,只向上级机关负责。各政务司之间协调不足,下级的司署部门常常出现功能重叠的现象,也有一些因人而设立部门或将部门扩大、升格的情况,致使政府部门机构增大、资源浪费、效率降低。澳门公务员的数量在过渡期大幅增长,从1987年的10064人增加到1997年的17589人,10年间的增幅达七成多,1998年的数字还在上升。公务员的薪俸也大幅攀升,1987年公务员的薪俸平均值为4664澳门元,1997年增加到14395元。公务员薪俸与私人机构人员的薪酬相比,近年差距越拉越大。澳门每年用于公务员薪俸的总金额近30亿澳门币,公务员的支出占了政府财政开支的四成强,成为澳门愈来愈沉重的财政负担<sup>②</sup>。与香港相比,可以明显看出澳门政府机构的过分庞大。根据行政暨公职司出版的《澳门公共行政97》中提到的政府架构包括司级部门就超过35个,司长级官员有50多名,而香港特区的政府架构仅有25

个局级部门。香港600多万人口,有18万公务员。而澳门仅有40多万人,就有17000多公务员。从人口与公务员比例来看,香港是33:1,而澳门是23:1。

中文官语化也存在很多问题。澳门当局本应把主要精力放在提高中文在澳门的官方地位上,但它却利用双语制的提法,积极推广葡语的学习。政府专门成立葡语推广中心,要求公务员掌握葡语。截止1997年,参加“赴葡就读计划”者共有368人,比参加中文及中国行政课程培训的人多了138人<sup>③</sup>。公务员学习葡语并非完全出于自愿,调查表明,有34%的人认为学习葡文是被迫的,94%的人承认自己只是在上葡语课时才讲葡语。如果由学生自己选择所学外语语种的话,只有5%的人会选择葡文,但有90%的人选择学习英文<sup>④</sup>。葡方关心的主要是葡文在1999年后的存在问题,在1998年2月的中葡联合联络小组会议上葡方要求订一个规范,确保葡文在将来的生存权。澳门政府1998年度施政方针还提及“全面落实中文官方地位,将继续鼓励中文使用”,然而,1999年度施政方针却只是提到“将继续发展在各部门普遍推行的双语制”、“将继续致力深化和扩大澳门官方语言的使用”。由此可见葡方关注的焦点所在。

中文官语化的规定在许多政府部门也未得到很好的遵守。澳门反贪污反行政违法高级专员公署在1998年年报中指出一系列违反中葡双语平等原则的行为。如公署在阅读多期的政府公报中,发现许多公共行政当局的公布事项只以葡语刊出。许多强制公布的内容,都没有以中文刊登,如公开考试告示,临时或确定的准考人名单、考试成绩名单,公务员及公共行政人员的委任和合同的续任、请辞或解除,发出行政准照、声明等。还有一些私人行为,也只是用葡语刊登。公署要求在《政府公报》刊登的行政行为、批示、纲要及其他强制性刊登的行为,能够以中葡双语刊登<sup>⑤</sup>。在澳门政府部门内,行政文书和内部文件仍然以葡文为主导,再加

上公务员本地化速度不够理想,有人担心,特区政府成立时很有可能形成“主要官员谙中文而不太懂葡文,中级官员懂葡文但又不擅书写中文,下级公务员懂中文而不懂葡文”的尴尬局面,影响特区政府的运作<sup>⑥</sup>。另外,澳门极度缺乏能满足社会需要的合格的中文人才。部分中高层公务员会说粤语,通晓中文者却占极少数。

澳门法律本地化的进程有待加快。在澳门五大法典中,《民法典》、《民事诉讼法典》、《公司法典》尚未实现本地化。规范澳门司法体系的两个重要法规:《司法体系组织架构》及《法院法官及检察院法官通则》也未通过和颁布。在这些法典中,《公司法典》已提交中葡联合联络小组多年,但迟迟未能完成磋商。《行政程序法典》也于1998年4月提交到中葡联合联络小组。澳门司法政务司承诺在1999年内全部完成三大法典的本地化。这些极为重要的法典不能变为中文,对法律本地化自然会有重大影响。澳门三大法典本地化进展严重缓慢的主要原因是缺乏懂双语的法律专家,澳门法律翻译办公室仅有4名双语的法律专家负担草拟三大法典的中文文本,工作压力之重可想而知。

与三化问题相比,日益恶化的治安形势更加令人担忧。近年来,澳门的社会治安有日渐严峻的趋向。从统计数字看,1993年澳门发生的各类罪案共有5332宗,其中人身攻击1037宗,建筑物内抢劫159宗,街道上抢劫196宗,爆窃或使用百合匙982宗。到1996年,罪案总数增加到8576宗,比四年前增加了60.84%;其中人身攻击1464宗,同期增加了41.18%;建筑物内抢劫389宗,增加了1.45倍;街道上抢劫336宗,增加了71.43%;爆窃或使用百合匙1479宗,增加了50.61%。尤其是近年澳门经济一蹶不振,黑社会组织经济利益也受到影响,因此,利益重大的赌场就成为黑社会团体激烈争夺的对象。1997年开业的澳门新世纪酒店钻石厅(赌场)收入丰厚,引起黑社会的垂涎,澳门两大帮派——“水房”和“十四K”都想据为

已有,双方大打出手。先是黑社会之间互相打杀,其后发展到对执法人员使用暴力。1998年四、五月间,在一个月内发生多起严重枪杀、烧车、斩人、炸弹案和多起抢劫案,甚至澳门司警司白德安的汽车下也放置了炸弹。澳门警方随即开始了48小时的搜捕及打黑行动,逮捕了“十四K”大佬尹国驹等6名黑社会主要人物。据当时对澳门7个区140名居民所做的调查,有75.7%的人对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十分担心及担心,仅有8.6%的人表示不担心。80%的居民认为警方破案率是十分低及低的,认为一般的有19.3%,没有人认为破案率高。治安恶化严重影响到澳门的经济民生,如1997年上半年来澳门的游客比上年同期减少了4.72%,其中香港旅客减少14.28%<sup>⑦</sup>。1998年9月8日凶徒又在澳门制造连环炸弹案,导致10名港澳记者和5名司警受伤。澳门政府颁布惩治有组织犯罪的新法例,并从葡萄牙引入得力警探人员,但收效并不明显。1998年9月18日,国务院副总理兼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委会主任钱其琛在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委会第三次会议上宣布,1999澳门回归后,中央政府将在澳门驻军。这一决定受到澳门各界的普遍欢迎,认为对澳门的治安情况有正面作用<sup>⑧</sup>。

治安形势严峻再加上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澳门经济复苏更加困难。1993年后,澳门步入经济调整期,经济增长逐年放缓。按1989年市场固定价格计算,1995年澳门本地生产总值为349.15亿澳门元,仅比上年增长3.6%;1996、1997两年澳门经济居然出现连续两年的负增长,降幅分别为0.5%和0.1%。据澳门统计暨普查司截止1998年的统计,当年澳门出现3.3%的负增长,表明周边环境恶化致使澳门经济进一步下滑<sup>⑨</sup>。澳门四大支柱产业均面临严峻形势。

旅游博彩业困难重重,澳门经济主要支柱之一的博彩业的收益呈下降趋势。1996年来澳游客数量达815万人次,比1995年增加5.1%,但博彩业收益反而下降9%。1997年澳门博彩业面临一系列

不利因素：金融风暴猛烈冲击亚洲多个国家和地区，澳门的多数游客主要来源地受到影响；澳门治安情况恶化，使一些游客望而却步；周边地区赌博行业竞争激烈，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蒙古先后开设赌场，港澳附近海域也有赌船在活动。所有这些因素导致澳门游客数量大减，全年澳门入境旅客仅为700万人次，比1996年减少14.2%。据澳门旅游局统计，1997年上半年全澳门整体旅游收益减少32%。同年，酒楼、饭店、酒家等的营业额平均下降22.24%，百货零售业下降约20%。但由于政府修改博彩合约，当年博彩业收益包括了上年及当年提增博彩专营税率的追加收益，博彩收益在游客大幅减少的情况下不降反升<sup>⑩</sup>。到1998年，金融风暴的后遗症凸显出来，治安情况仍未根本好转，导致东南亚地区的客源几等于零，港客则宁愿到没有安全问题的赌船上去赌，结果全年游客数量仅为695万人次，比上年下跌0.7%；博彩业收益下降20%。1999年首三个月的情况仍不乐观，据澳门娱乐有限公司总经理何鸿燊透露，该公司的生产仍有15%的下滑<sup>⑪</sup>。

对外贸易增长乏力。1994年澳门进口额为169.25亿澳门元，此后数年澳门进口值再没有超过这一数字。出口情况稍好一些。从1994年到1997年，澳门出口额从148.53亿澳门元增加到171.29亿澳门元，年均递增4.87%。澳门依赖配额和普惠制的出口加工业发展模式受到挑战，美国是澳门最大的出口市场，对美国的出口通常占澳门总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1996年澳门与美国就纺织品及成衣出口问题发生贸易纠纷，继部分毛针织类产品被削减配额之后，美国海关对从澳门输入的成衣施加新的限制，并实施新的产地来源证规定。结果澳门输美货值从1995年的66.93亿澳门元降到1996年的64.11亿澳门元，降幅为4.21%。1997年澳美贸易较为顺畅，在澳门对香港、中国内地、日本等主要贸易对象的出口均出现下降的情况下，澳门对美出口值增长到77.47亿澳门元，增长了20.84%。

1998年美国海关又采取一系列措施，如对10个类别的产品的产地来源严加甄别等，亚洲金融危机也导致澳门出口市场全面缩小，1998年1-7月，澳门出口达94亿澳门元，比去年同期下降2.3%；进口约90亿澳门元，比去年同期下降8.1%<sup>⑫</sup>。

房地产市场长期在谷底徘徊。自1993年楼市急挫，澳门房地产市场迄今仍处于调整期，供求关系严重失衡。1996年新动工楼宇面积出现52%的下跌，但新建成楼宇面积则增加到190.83万平方米，增幅达56.3%。新建成单位共16866个，第一次买卖单位仅为6979个。1997年新建成楼宇面积减少39.7%（115万平方米），新建成单位9093个，第一次成交单位则上升到9514个。1998年上半年新建成楼宇单位及面积比上年同期增加104.5%及62.6%，但经济不景，利率与失业率高企，银行按揭贷款又趋于谨慎，市民买楼意欲大减，房地产业难以摆脱淡净闷局。澳门原来积压的楼宇单位未见减少，近年空置单位又有增加。目前楼宇价格已从九十年代初的高峰水平平均下跌五成左右，空置单位保守估计至少达5万余套，积压资金高达近千亿元<sup>⑬</sup>。

银行业经营压力增大。1997年底，澳门共有银行22家，分支行合计有110家。银行总资产1689.19亿澳门元，总存款766.61亿澳门元，对外净资产和本地信贷合共842.58亿澳门元。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下，银行业面临资金紧绌、同业息波动、竞争加剧、经营成本上涨、逾期呆滞放款增加等一系列问题。从1997年第三季度港元受冲击起，澳门银行业明显感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澳门币利率持续上升，储蓄存款利率从当年第二季度的3.75上升到1998年第一季度的5.00，澳门银行同业拆息三个月利率从6.2000上升到1997年第四季度的9.3875，1998年第一季度才回落到6.5375。由于存款利率上升，企业经营环境转差，银行放款风险增大，因此，从1997年第三季度到1998年第一季度，澳门银行总存款增加了6.64%，而本地



信贷仅增加了0.66%。从澳门各银行公布的1998年第二季经营结果显示,有9家银行的利润增长较1997年同期增长较1997年同期减少<sup>⑨</sup>。从1998年全年来说,银行业赢利总额为10.68亿澳门元,比1997年大幅下跌22.3%<sup>⑩</sup>。

上述情况无疑会对澳门回归造成一定影响,但中葡之间总体关系良好,平稳过渡也是澳门居民和中葡两国的共同愿望,中方为澳门回归做了大量准备工作,特区候任行政长官已经产生,筹组特区政府的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因此,即使有上述问题存在,澳门顺利回归也应该是有一定保证的。

#### 注释:

①澳门《华侨报》,1998年11月14日。据中葡联合联络小组属下的三大问题工作小组葡方组长区廷睿介绍,到1999年3月底,以中文为母语的司长占本地化司长的70%,副司长占80%,厅长和处长占82%。但还有10个司长和6个副司长尚待本地化。见《澳门日报》,1999年3月24日。

②澳门《华侨报》,1998年9月17日。

③何永安:《澳门公务员本地化进程》,载《澳门1997》,澳门基金会出版,1997年,第35-36页。

④Paulo Ferrira:《中文私校中葡语教学的需要》,载《行政》,1994年,第4期,第804页。

⑤《澳门日报》,1998年3月15日。

⑥《澳门日报》,1998年12月2日。

⑦陈欣欣:《当前澳门治安问题之社会学剖析》,见《当代港澳》1997年,第2期,第24-25、28页。

⑧在1999年5月19日于珠海召开的澳门驻军法咨询座谈会上,有关人士透露,澳门驻军法规

定,当驻军协助维持社会治安和救灾时,可行使当地执法人员的权力。这一点与香港驻军法明显不同,原因是澳门本身没有关于军队的法律,而香港回归前,英军驻扎在香港,香港已有规范军队的法律。这一规律对威胁澳门社会治安的不守分子有重要的震慑作用。

⑨参见李炳康:《澳门的投资环境与政府角色》,《澳门日报》,1999年3月21日。

⑩刘本立、李雁玲:《澳门经济九七回顾与九八展望》,见吴志良等编《澳门1998》,澳门基金会出版,1998年6月,第116页。

⑪《澳门日报》,1999年3月24日。

⑫澳门统计暨普查司:《澳门资料1998》,对外贸易部分;澳门经济司研究厅:《澳门经济》,1998年第1季,货物对外贸易部分;正扬:《澳门经济衰退的原因何在》,《澳门日报》,1998年10月11日。

⑬澳门经济司研究厅:《澳门经济》,1998年第1季,建筑及不动产市场部分;中国银行澳门分行经济研究部:《澳门经济金融情况及与内地关系》,《澳门日报》,1998年10月11日;澳门发展策略研究中心:《新时期澳门经济发展路向及对策的初步建议(撮要)》,《港澳经济月报》,1999年5月。

⑭澳门经济司研究厅:《澳门经济》,1998年第1季,货币及汇兑指标部分;中国银行澳门分行经济研究部:《澳门经济金融情况及与内地关系》,《澳门日报》,1998年10月11日。

⑮澳门发展策略研究中心:《新时期澳门经济发展路向及对策的初步建议(撮要)》,《港澳经济月报》,1999年5月。

【责任编辑:许锡挥】

# 澳门回归与内外合作发展研究

周运源

## 一、关于进一步拓展澳门与欧洲的交流与合作

处于世纪之交的澳门 1999 年 12 月 20 日回归祖国,将使她焕发新的活力,将使她与香港一样,为在新世纪提高中华民族在国际上的综合国力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1999 年 1 月 1 日欧盟实行的统一货币——欧元的正式启动,将在新时期进一步增强欧盟内部的竞争力,而这对澳门也无疑提供了拓展欧盟市场的发展机遇。随着近年来中欧高层领导的互访,相互关系的进一步密切,特别是欧盟已明智地不再把中国置于“非市场经济”国家,使新时期中欧经济关系呈现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在这发展态势下,澳门有着进一步拓展与欧洲(欧盟)经济关系的良好机遇,具体方面,我们认为应着手实施如下方面的对策。

### 1. 贸易桥梁、中介作用的进一步发挥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维系澳门与欧洲(欧盟)经济关系的极为重要的内容之一,是相互间的贸易往来,正是由于相互间经济贸易的互利互补,促进了各自整体社会经济全面发展。尽管近年来,澳门与欧洲(主要与欧盟成员国)的经贸进出口贸易出现小幅度的下滑。然而,我们应看到的是,这是经济发展中暂时难于避免的,关键在于我们必须充分注意到世纪之交的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格局,为澳门更好地开展与欧洲的经贸投资等活动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发展机遇。尤其是中国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后,仍然给予澳门高度自治、澳人治澳等“一国两制”的大政方针,使澳门可以以中国澳门的名义在

继续巩固与发展世界上 100 多个国家地区的经济联系和合作活动,这无疑为澳门在 21 世纪全面拓展与欧洲的经贸投资等提供了最为重要的保证。我们认为,无论是澳门还是欧洲,仍然可以在进一步发挥相互之间的桥梁、中介作用上做好新文章。以澳门来说,进一步完善欧洲工商企业在澳经营活动的投资环境,是世纪之交的重要环节,例如,如何根据“一国两制”既定方针、政策,尽快建立和完善符合澳门实际,又为中外投资者接受的政府架构,包括经济社会法律等管理系统,及其提高效率,中外企业在澳门的投资政策等软、硬环境,这是保持澳门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选择。欧洲(欧盟)方面,则根据中欧 21 世纪新的对华政策的要求,继续把澳门作为欧洲工商企业进军中国大陆(内地)的桥梁或中介点,仍然大有可为。正如欧盟主席桑塔尔、副主席兼贸易专家布里坦先生所表示的,欧盟与澳门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的发展所签订的贸易合作协议,对澳门、对欧盟都有积极的意义,并认为澳门无论现在和将来,对于沟通中国和欧盟都具有重要性。(参见《澳门》1999 年第 4 期)

### 2. 澳门既是欧洲投资中国内地的“窗口”,也是中国全面了解欧洲的“窗口”

近年来,随着中国与欧盟双边关系趋好发展,双方的经贸得到继续平稳的增长,据中国海关统计资料,1998 年 1—11 月份中国欧盟相互的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 423.26 亿美元,对此上年同期增长 13.9%,在相互投资方面也有一定的增长。例如 1997 年欧盟对中国的直接投资额达到 47.71 亿美元,对比上年的 27.40 亿美元增长 74.1%;另一方面,截止 1997 年底,中国批准的海外投资企业中国

对欧盟国家的有 114 家企业,投资额达到 4717.4 万美元。此外,同时期欧盟的 11 个成员国家对中 国提供的政府贷款额达到 7.3 亿美元,占同时期外 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向中国提供政府贷款的 27.4%。

事实上,无论是中国欧盟相互贸易的增长,还是双方相互投资的发展,都与澳门的“中介”、“窗口”作用分不开的,于 1992 年 9 月 26 日成立的澳门欧洲咨询中心,是欧盟在欧洲境外设立的第一个欧洲资讯中心,近年来在沟通中国与欧洲的经贸、投资等方面日益起着特殊的重要作用。正如澳门欧洲咨询中心主管罗伟度先生指出的,到 1997 年 12 月 31 日为止,澳门欧洲咨询中心共接受了 658 次咨询,并安排 102 次合作。主要的用户来自澳门、香港和中国,澳门使用最多,共有 263 次,其次是香港,共使用 220 次,中国使用居第三,共使用 213 次,而且中国的合作广东居多数,占了澳门欧洲咨询中心合作项目总数的 7 成。(参见《澳门》1999 年第 4 期 P19 页)

### 3. 联接欧亚旅游的国际通道

早在 20 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有经济学专家提出发挥澳门优势,构建粤港澳三地旅游大三角的思路。尔后的发展也证明粤港澳三地联手拓展旅游业是具卓有成效的,当然,距离真正实现粤港澳协调有序的大三角旅游区在事实上仍需进一步努力。姑且不论国际游客对旅游大三角是否有兴趣而来,而主要是中国内地潜力巨大的旅游群体,有的慕名而来,过去多数只能游广东境内的景点,而赴港澳地区难免碰上手续上的难题而举步维艰,只是近年来,国家松动港澳国际旅游的相关政策,不仅使广东人圆了新马泰等国际游的美梦,而且使更多的内地游客实现了跨境旅游。

澳门由于本身所处的重要位置,因此,她在沟通欧洲、亚洲国际旅游方面有着特殊的意义和作用。一方面对中国内地游客往欧洲地区旅游起着国际旅游通道;另一方面又为欧洲游客前来中国内地或亚洲其他国家、地区旅游提供通道。当然,澳门要从粤港澳旅游在大三角的重要支撑点,拓展为联结欧亚旅游的国际通道,除了必须进一步改善现有的旅游服务的硬件环境外,还必要强化旅游服务的

软件环境,包括与欧亚地区相互的旅游机构的联系和协调,加强与周边国家、地区旅游合作,开展类似“一日游”、“一站游”、“套餐游”等形式各异、花样层出的国际旅游模式,签订必要的国际旅游资源共享的协定。特别要考虑把握举世瞩目的澳门回归热潮的有利机遇,举办类似“澳门回归游”、“澳门观光游”等,努力促进和树立澳门在世纪之交的国际旅游城市的良好形象。

### 4. 金融、保险业进军中国内地的中介

1999 年 4 月,我国有关部门又根据国内外形势发展的新要求,颁布了进一步放宽境外金融、保险机构在内地设立分支机构的规定,这无疑为欧盟成员国家、香港、澳门等地区提供了在中国内地进行金融、保险业联系与合作的机遇。这方面,澳门比较其他的国家或地区又具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一方面,澳门与香港一样,最早享受中国内地改革开放所实施的一系列利用资本,引进技术设备和先进管理经验等优惠政策和措施,促进了社会经济整体的发展;另方面,澳门事实上在欧盟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或地区进军中国内地中却一直起着穿针引线的重要的中介作用。因此,今后,随着中国内地在金融、保险等外引政策上的松动,类似以澳门为中介,组建欧盟——澳门——中国内地合资形式,或其他形式的金融、保险业等机构,必然在中国内地更多的出现。

## 二、关于穗、澳交流与合作

处于中国改革开放先行点、试验区的广州,在新的条件下进一步增创发展新优势,加强穗、澳经济联系与合作,建设和发挥现代化中心城市的作用,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 1. 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加强广州与澳门甚至欧盟的经贸联系与合作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穗港澳的经济联系与合作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其中穗港联系与合作的范围、程度和绩效等,总的方面要比穗澳合作高出一筹,这是不争的事实。问题是,穗港合作与穗澳合作各有优势,各有特点,因此不能以穗港合作代替

穗澳合作,而且从一定的意义上讲,穗澳合作更具特殊性。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祖国后,澳门既是我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她又具有与拉丁语系国家或地区数百年联系的基础,广州不仅有着与澳门发展经济联系和合作的良好条件,而且与欧盟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合作也有广阔的前景。据1998年广州统计年鉴的有关资料显示,尽管1997年广州对澳门的进出口都有所下降,但是同时期广州对欧盟主要成员国英国、法国等的进出口贸易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例如,1997年广州对澳门的进口额为179万美元,对比上年的242万美元下降了26%;广州对澳门的出口额达到3497万美元,对比1996年的3848万美元下降9.1%。但是1997年广州对英国的进出口额达到2.87亿美元,对比1996年的2.41亿美元增长19.1%,同时期广州对法国的进出口额达到6.94亿美元,对比1996年的5.21亿美元增长33.2%。因此,应考虑进一步完善广州的营商环境,松动相关的政策,提高广州与澳门,欧盟等的经贸合作的层次和水平。也可以通过广州与欧盟国家所建立的友好城市的关系,(据1998年广州统计年鉴的资料,广州已与欧盟国家瑞士的林雪平市,法国的里昂市,德国的法兰克福,意大利的巴里结成友好城市)加强相互间的不同层次主要包括工商企业界的互访,增进共识,发展合作。

## 2. 切实改善投资环境,继续吸引更多的澳门资本和欧盟资本,来穗举办工商企业

经过多年的努力,广州的投资环境有了较大的改善,然而在新的形势下,要想增创广州发展新优势,建设广州现代化中心城市并发挥其重要的作用,就必须进一步加大改善广州投资环境的政策力度,完善相关的投资硬环境和软环境,特别是应当考虑以广州保税区、广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投资环境的改善为契机,全面带动广州整体投资环境的日臻完善。尤其要抓住澳门回归祖国的重要机遇,增加对吸引澳门资本甚至欧盟资本的力度。1997年尽管广州利用澳门资本的合同数,由1996年的16项下降到8项,然而,同期广州实际利用澳门资本额则由1996年的0.69亿美元增加到0.71亿美元。

1997年广州吸收欧盟主要成员英国、法国、德国、荷兰、西班牙和奥地利等的直接投资项目16项(合同数),实际利用外资额达到2.21亿美元。1999年初,我国政府作出了进一步松动境外资本投资内地金融(保险)业和旅游业的有关规定,因此,应结合广州建设现代化中心城市的要求,尽快制定和完善与这些规定相应的投资指南,以实现广州与澳门、欧盟成员国投资合作的新突破。

## 3. 拓宽金融(保险)业合作的领域,推动穗澳联系合作的进一步发展

近年来,穗澳金融保险业方面的联系与合作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过去一段时间难有新突破,因为穗澳两地实行的是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尽管我国实行改革开放20多年来,逐步扩大了对外开放的领域,然而我国对金融保险业境外开放一直比较审慎,加上1997年以来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更加说明一个国家的金融保险业既不能随便开放,也不能“一揽子”全面放开。当然,今天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只有继续坚持走改革开放之路,振兴中华才有希望。因此,我国政府在制定和完善防范金融危机的有关政策的措施的同时,仍然制定和实施金融保险业进一步扩大开放的重大决策,这无疑为我国跨世纪的全面发展注入的新的活力。这对广州来说,正是进一步拓展与境外金融保险业合作的大好时机。尽管到1997年底,广州市已有外资金融机构所设立的分公司或办事处38家,外资保险机构在广州设立的分公司或代表处也有21家,但是这与广州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建设现代化中心城市的要求,与把广州建设成为我国华南地区的区域金融中心的要求不相适应,因此,应当把握我国政府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和进一步松动开放金融保险业等的有利时机,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和措施,继续提高吸收境外金融保险业进军广州的力度,一方面,通过进一步强化穗澳联系与合作,吸引更多澳门的金融保险业来穗拓展业务;另一方面,通过澳门为中介,吸引欧盟成员国的金融保险业涉足穗城设立分公司或办事处,以广州金融保险业较高的外向度,带动广州整体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

(下转第27页)

# 澳门回归与穗澳高等教育合作

赵大英 罗干坤

## 一、穗澳两地高等教育的状况

广州地区有几十所高等院校，不仅有部属、省属的名牌大学，也有几所市属的已有相当知名度的大学，其中广州医学院、广州师范学院、广州大学、华南建设学院（西院）颇具规模，近年发展很快。

澳门的高等教育，或者说专上教育，开始很早，发展却是近年的事。澳门的高等教育历史可以追溯到1594年政府注册登记的圣保禄学院（华人称为大三巴书院），由耶稣会士 Alexandre Valignano 创办，被誉为远东区第一所欧洲式大学，这比香港早得多，香港是1911年才有了第一所大学——香港大学。此后几百年，澳葡政府“一方面不愿舍弃澳门，以免影响帝国的版图；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投入太多的资源在这片属地”，高等教育一直得不到发展。即使抗战前后还有一些华人知识分子在澳门办大学，但至60-70年代澳门终于没有了大学。

当代澳门的高等教育始于1981年，香港商人在澳门创办了东亚大学，1988年澳门政府收购东亚大学，1990年理工学院部分分出，成立澳门理工学院，1991年东亚大学易名澳门大学。现在澳门专上院校有五所，澳大、理工学院、澳门保安部队高等学校、亚洲（澳门）国际公开大学、澳门旅游学院等。

早期东亚大学，由于是私立大学，学费昂贵，86-87学年在校的6786名学生中，有5071人是香港生，占四分之三，还有少部分其它地方的，实际澳门学生只得一成。澳门学生来广州读书的不少，除就读于属华侨学校的暨南大学外，其他如中山大

学也招收一定数量的澳门生。临近澳门回归两地高等教育的交流更多，据了解，自80年代中期开始，华南师范大学就为澳门培养中文专业等合格的师资；1991-1992年间澳门理工学院也曾与广州大学联合培养酒店管理专业学生；中山大学近年连续在澳门招收了行政学、工商管理、会计学、法律等硕士生班，生源充足。还有，现在广州一些大学教师到澳门大学任教或访问。高层次的人才培养已有发展，情况如下表：

中国内地大学在澳门招收研究生情况

| 年份    | 硕士生 | 博士生 |
|-------|-----|-----|
| 94-95 | 44  | 4   |
| 95-96 | 59  | 5   |
| 96-97 | 82  | 4   |
| 97-98 | 114 | 11  |
| 总计    | 299 | 24  |

《澳门1998》，P24

近年澳门政府开始注意发展专上教育，且已得到一些成果，但发展仍然缓慢。据澳门政府的统计，1990-1991年度就读专上教育的学生总数为6857人，其中71.4%为日制学生、26.9%为夜制学生、1.7%为日夜制学生（《澳门总览》，1994）。1995-1996年专上学生在校人数为6418人，比1990-1991年下降了6.4%（《澳门1998》，P240）。

从澳门社会的人口素质看，澳门高等教育亟待发展。澳门虽然只有21.45平方公里，但居住了415850人口（《澳门1998》，P240），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地方。作为亚洲著名的国际自由港，经济曾一度繁荣。澳门七十年代开始工业化和城市化，80年代制造业一度比较发达，近十多年以发展旅游博彩业、出口加工业、金融服务业、房地产



业为主, 1995 年人均生产总值 18219 美元, 是全球 45 个高人均收入的国家和地区之一 (《澳门 1998》, P126)。

然而, 根据澳门劳工暨就业司调查统计资料显示, 在 1990 年底就业人口中持有大学本科学位者有 4.34%, 大专 (非学位) 有 1.47%, 合共约占就业人口总数的 6%。广州 1995 年人均生产总值 1.9 万元人民币, 据 1994 年统计, 广州市大专以上学历就业人口占劳动人口的 5.12% (广州市计委、中山大学编《社会可持续发展》, P91-93, 1996)。澳门三大工业的整体人力资源的学历结构远远落后于目前经济转型的发展需要, 其中的大学或理工学院毕业生仅占 0.4%。 (《澳门教育——抉择与自由》, P37, 1994)。从经济发展阶段水平与受高等教育的劳动人口比例看, 澳门人口素质低于广州。

## 二、穗澳高等教育合作的社会经济基础

教育是为经济发展服务的, 澳门的高等教育与它的经济地位不大相称。90 年代初, 美国麦健士顾问公司在其《澳门未来发展前景研究报告》中, 就把“本地工人平均技术素质相当低”视为产业升级三大障碍的第一个。1996 年始澳门经济连续三年负增长, 许多有识之士在某种程度上把它归咎于澳门高等教育发展的欠缺, 发展总离不开人才。他们认为澳门只有形成共识, 利用特殊有利条件, 加大经济结构中对先进科技的应用力度, 致力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澳门才能在 21 世纪的整体区域经济中占有一定的位置。

澳门走发展高科技道路才能实现其产业结构调整。1994 年中国国家科委专家组在《澳门高技术发展之路》的报告中提出, 澳门应通过发展高技术, 改造现有产业, 并营造新的高新技术产业, 以提高澳门产业的技术竞争力, 推进澳门的持续繁荣。

无论改造现有产业或营造高新技术产业, 人才都是澳门发展成多元化工业中心的关键问题之一。澳门科技、教育基础薄弱, 人才储备不足, 制约着

产业中对科技成果的应用。

另外, 解决平稳过渡三大问题: 公务员本地化、中文官方地位、法律本地化, 也需要内地高等院校因循澳门人才的需要和澳门政府的要求为澳门培训语言、法律、行政管理等方面人才。

有人建议, 澳门应利用内地有一百多万专业人才的条件, 及吸引中国数以十万计的海外留学生来澳门发展。政府需加强与国家劳动人事部的沟通, 探讨内地技术人才导入的可行性方案, 放宽澳门极需的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的输入限制, 为科技进步与发展方式的转变做好人才准备。 (《澳门 1998》, P145)

之所以要引进人才, 是因为高等教育非一朝一夕可以发展起来的, 大都要有几十年以上的积淀, 人才培养不会在短期内有很大收效, 所谓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是也。澳门要重振经济, 尽快改善人口素质, 单依赖澳门本地培养, 在人才数量与类型上都满足不了发展的需要, 况且根据澳门的财政状况, 政府难对高等教育作大量长线投资, 这就应鼓励青年人到外地进修。

穗澳之间语言、文化相属, 交通便利, 广州消费水平低, 澳门人在广州就读比去其他地方节省费用, 从这方面看广州应是首选之地。

从广州的自身发展来说, 不仅需要利用澳门的经贸条件, 也应争取参与澳门的教育科技发展。首先, 教育可以成为产业已逐步为人们所认识和接受, 华人在子女教育上的支出是非常慷慨的, 积极参与澳门的高等教育发展有利于吸纳资金帮助自身发展。其次, 广州把高新技术产业的开发作为自己的重要发展路向。广州先后设立了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广州保税区及云埔工业区, 目的都在于发挥它们的窗口龙头作用, 引进资金和新技术。但是, 经国家科委概括为当今世界新技术领域的就有信息技术、新材料、生物工程、宇航技术等 11 个门类, 广州只能选取其中一些领域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核心问题除了投资, 关键在于人才和信息。澳门在 1992 年成立了亚洲唯一的欧洲资讯中心, 广州可以透过与澳合作培养所需人才, 利用澳门资讯相对发达、科研条件先进等有利因素, 了解

和掌握国际领先科技,提高市属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和科研水平。我们看到,现在在澳门、香港的高校中有很多来自内地高校的科研人员,由于多种原因,广州高校在这方面已落后于内地高校,尽管广州在地理、人文条件上更为便利。

高等教育,尤其研究生教育与科技研究开发是一体的。事实上,发展高科技并非易事。高科技一要高风险的投资,二要有高水平的教育科研作支柱,澳门果真走发展高科技这一道路就需要政府做强有力的组织工作,进行长远的高等教育投资规划,而且只有吸收外地,包括内地的教育科研力量参与,才会起步快见效快。因为人才虽可引进,但关键性的人才并不易得,他们是各国争夺的对象,人才只能立足于自己培养。这是在现实经济资源的条件下的选择,穗澳高等教育合作有其客观的推动力。

### 三、穗澳高等教育合作的前景与广州的策略选择

穗澳合作的可行性,在于两地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的优势互补和发展取向相近。

澳门大学下设的学部有教育学院,人文及社会科学学院、科技学院、法学院、工商管理学院、葡文学院,公共行政课程等;澳门理工学院开设专业主要有酒店管理、旅游业管理、电脑专业,社工、商贸管理、翻译等课程。此外还有专门的师范及护理专业院校。现有学科还不齐全,主要倾向于培养政府部门、商贸及旅游业人才。

澳门的高等教育状况与本地经济发展结构关系密切,注重应用。1997-1998年,不包括师范及教育学院与护理训练学生,在校高等教育学生共7815人,其中澳门生4675人,占59.8%。大学、理工学院及同类型学院颁授了1672个学位、文凭及证书,比上年上升30.8%,其中工商管理类毕业生占27.0%。(澳门统计及普查司《教育调查》1997/1998, P89) 澳门教育的特点是政府采取自由不干预政策,由市场力量带导教育发展,所以其专业设置、教育层次都以实用为主。现在其迫切需要

的是支持其经济转型,发展创新技术产业的,有创新能力的人才。

广州市属高校在其发展战略及现有的学科结构上都可与澳门高等教育互补有无、发展合作。广州医学院发展40年,“每一步都与时代同行,与社会经济发展同步”,以本科教育为主体,适应地方需求开办一定的专科教育,也发展研究生教育,争取博士点。现有在校生3000人,设有四系两部:临床医学一系、临床医学二系、医学检验系、医学影像学系、基础医学部和社会科学部。有15个硕士专业点,10个研究所和2个研究中心;有1个省级重点学科、2个省重点扶持学科和2个市重点学科;有1个省重点和3个市重点实验室;有3位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40多位省市级优秀专家和享受国家特别津贴的专家,教学科研力量并不弱。至今已培养1.3万名毕业生,不少在海外、港澳地区。(《广州医学院建校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广医有实力参与回归后的澳门的发展建设,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办学效益,符合学院原有的发展方向。

广州师范学院虽于1978年才复办,但1998年在校生已有9407人,其中研究生9人,本科生3789人,专科生892人,成人教育学生4717人。共有12个系,16个研究所,5个研究中心。其中除传统上的师范类专业外,还开设有当前社会发展需求较多的政治经济管理、新闻传播、艺术等系,及现代管理、系统工程研究、环境应用化学、比较文化研究、工艺美术、自然灾害与防治工程等应用型专业。成人教育学生占据半壁江山,反映该校重视面向社会办学和职业教育的特点。

广州市另一所1983年创办的大学——广州大学,是全日制综合性职业大学,其中有中文、外语、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电子工程、轻化工、艺术设计等9个学系。在校生近4000人,广大以“面向广州、服务广州”为办学宗旨,根据广州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市场需求,及时进行专业调整和设置新专业,使专业设置具地方性、职业性和应用性的特色。积极开展以应用技术为主的科研活动,为社会提供科技咨询和技术服务。广大重视对外交流,与意大利院校合作协会联合创办了“广州维修

工程技术学部”，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和中山大学合作开办国际会计专业研究生课程班。此外与新西兰、英、美、加等国高校都建立有协作关系。

以培养建造业专业人才为主的华南建设学院(西院)更属于专业技术型的院校。

纵观市属高校的特点，都适于培养符合港澳社会需要的应用型、职业性人才。市属高校只要发挥自己的长处，在澳门经济转型、产业结构调整中提供应用型、技术型的人才培训，参与其创新科技产业开发，即可找到合作的机会。创新科技产业主要是指高增值的产业，高增值的产业不一定是高科技的产业。主要在于把创造性的想法、新的管理概念、新的生产程序、新的销售观念输送到工业里面，使它变成高增值的产业。这方面人才的培养在中国大陆以至亚洲地区的教育中都比较欠缺，原因可能在于传统的教育模式、教育理念，不重视应用或没有有效的机制实现科技向生产力的转化。市属高校似乎更易于适应向这种教育模式转变。

市属高校在与澳门的高等教育合作中不仅会获得发展的资源与契机，还可以利用澳门的特殊文化环境培养广州走向国际化所需的人才。澳门社会的多元文化是独一无二的，各种文化相容而自存，是文化研究的好地方。澳门是葡萄牙在东方最后一块“管治之地”，由于种种原因，东方的其他“管治地”，如东帝汶、果阿、马六甲等都未能有意识地保留葡国文化，因此，葡萄牙政府把在东方保留葡国文化影响的希望寄托在澳门，目的是保存葡萄牙文化和葡萄牙民族主义的影响。前任澳督文礼治说要“将东亚大学(现澳门大学前身)建成二十一世纪的葡国文化灯塔”。虽然葡国文化的保留出于对殖民主义的留恋，但也为我们留下一个了解欧洲文化的窗口，葡语属拉丁语系，在欧洲和南美洲有广泛使用，“葡语国家共同体”(成立于1996年6月，《澳门1998》，P165)有超过2亿人口。以法国、意大利为首的拉丁语国家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3，GNP占全世界1/6，经济技术实力雄厚，但现在与东亚经济联系不多，对华贸易仅占中国外贸总额的7.8%，发展空间还很大(赵大英：《从澳门面临的

内外经济环境看澳门经济出路》，地理学报，1999(4))。目前懂拉丁语的人才在广州很少，但中国与南美国家，尤其与欧洲的贸易往来正迅速发展。市属高校在经贸人才、外语人才的培养上应可充分利用澳门的条件。

广州几所市属高校在与澳门开展交流合作中，存在自身的长处和短处，因此各校要扬长避短，抓住“特色”做文章。

市属高校虽然在个别学科领域也存在优势，但整体上与部、省属高校是有差距的，市属高校在合作中应明确自己的定位。目前部、省属高校为了大学排名、学科建设的工作侧重于高层次的研究生教育，强调向研究型大学发展。从国家教育部的部署和国际研究型大学的条件看，国内能达到要求的大学其实是少数的，社会发展并不要求大学都搞“研究型”。市属高校从现有条件出发无须强调向研究型发展，至少目前还不适宜作这种战略部署，除了个别重点学科可以把发展目标定得高点，整体发展应以本科教育和技术应用为主。如果这样，市属高校就与澳门，乃至香港的社会发展需要相吻合。

市属高校与澳门的高等教育交流合作，一方面要在可能的范围内适当调整专业方向，另一方面要注意课程设置及课程内容符合澳门学生实际，至于办学方式可以采取几种：

1. 直接招收澳门学生，这一方式已为许多学校使用。
2. 选取澳门人才需求量大的专业在澳门开设教学点，开班面授。广州地区有些高校已采用了这种方式。
3. 与澳门高校合作，互派学生交流培养。
4. 与澳门高校联合招生。

合作方式是灵活多样的，关键市属高校要加强对本校的宣传，在当地建立一定的知名度，让澳门人了解本校的特点、学科专业。澳门回归后，政府应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主动为市属高校铺路搭桥。我们对穗澳高等教育的合作前景是看好的。

【责任编辑：周运源】

# 澳门社会价值观之特点

李 萍

以当代的尺度,澳门没有香港在国际地位中的显赫位置,但以历史的眼光,澳门却有比香港更长的开埠史。早在十六世纪中叶至十七世纪前期的近百年中,当时的澳门已是欧洲至远东航线的中转站,这使得澳门成为盛极一时的国际贸易中心。虽然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澳门的管治权才真正在葡萄牙政府的控制下,但葡人据居澳门则有数百年历史,中西文化交汇很早便已开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与香港相比,澳门社会的价值观具有协调、中度,和相对稳固的特点。

第一,协调性。所谓协调即指主体与主体、客体与客体、主体与客体之间关系的协合。在价值观系统的意义上,它既是不同文化传统互动的结果,又是多元价值观相互融合的历史过程。在澳门,这种协调性主要表现为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我们可以从公务员和青少年两个不同群体的层面来分析这个特点。根据社会学的理论,任何文化存在都包含“正式文化”与“实际文化”,“正式文化”亦即“规范文化”,它占居核心地位,与社会的主导文化相联系;“实际文化”常常存在于社会心理层面,与社会的亚文化相关联。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公务员与青少年群体分别反映不同的文化价值系统,但在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上,二者却是一致的。如有论者把澳门公务员的价值观概括为四个方面:价值理想是公仆;价值信念是廉洁;价值选择是效率;价值标准是法律。显然,公仆与廉洁,典型地反映了中国传统价值观强调“以民为本”、“立身为正”、“德为治本”、“为政以德”的思想;而效率与法律是现代社会的价值特征,二者的统一确实把传统与现代有机地融合起来了。有学人从择业、消费、金钱、性、社会、人生等方面研究澳门青少年

的价值观,认为从总体上看,澳门青少年的价值取向既具有传统的深厚印记,又有明显的现代表征。如在金钱价值观上,对“如果你突然得到100万元,你最想做什么”问题的回答,在“做善事、升学读书、把钱存起来、买喜欢的东西、环游世界、开创事业、尽情享受、结婚成家”等8项选择中,澳门青少年首选的三项分别是“升学读书”、“把钱存起来”、“做善事”。“升学读书”——反映澳门青少年对学历社会的积极认同,具有鲜明的现代取向;“把钱存起来”——是中国勤俭节约的金钱观;“做善事”——既反映中华民族“厚德载物”“崇仁尚义”的传统,又有西方文化中博爱的精神。如关于性价值观,在“婚前性行为”的测度中,一方面,最近二、三十年来,澳门青年人的婚前性行为发生的比率上升较快,但在性观念上所持的价值态度要比行为本身更为宽容与开放。有关的调查显示:26.5%的青少年认为恋人在婚前发生性行为是“完全可以”、“可以”的;48.3%则表示“不太可以”、“不可以”;25.2%则保持中性态度。正是“现代为表、传统为本”,它充分表现了在性价值观上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澳门青少年问题专家陈欣欣在对澳门中学生关于闲暇活动、与他人相处的态度、及人生观等方面的调查与分析中,亦得到许多不谋而合的结论。这种传统与现代相协调的价值观,在澳门物质文明的发展中亦留下了鲜明的印记。大凡到过澳门的人,都对澳门的城市建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有明代建筑的古庙,有巍峨的葡式教堂,有中国式的厅堂大厦,有西式的洋房别墅,正可谓古今俱备,东西合璧。

诚然,协调的事物总是给人一种美的感受;协调的关系总是给人愉悦的感觉;价值观的协调,能

减少发展的冲突。所以“协调”常常是人们向往的结果。但“协调”必须以科学的理性辨析为前提，基于此的协调伴随的是一个创造的过程。离开这个前提，“协调”容易是拼凑，是外在偶然性的联系。这种具有假像性的“协调”，事实上掩盖了不协调的矛盾，反倒会给社会和个人带来问题。澳门所处的弱势文化境地，其协调性是否包含一定的非理性、虚假性的成分呢？无疑，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第二，中度性。所谓“中度”，即在价值判断、选择上的不偏倚和适度性。在某种意义上，这既是传统与现代以及东西方文化相协调的逻辑结果，又是二者统一的外部表征。在价值选择中，“中度”主要是指在回答个人与社会、物质与精神、享受与发展等人所面临的基本关系和问题时所持的中庸取向。上海青少年研究所扬雄先生曾对香港、澳门与内地青少年关于人生价值观的取向作过比较，认为，澳门青少年的人生观，比较实际和中度。如在“你向往的人生目标”重要性的选择中，“有成就的一生”、“舒适、富足的一生”占四至六成，如果前者代表一种社会取向的话，后者则反映一种个人取向，显然，在个人与社会两极取向中，澳门青少年的价值取向呈居中状态。香港青年协会曾在八十年代中，对香港青少年进行过一次题为“金钱与人生”的大型问卷抽样调查，其中关于涉及“人生目标”部分的回答，与澳门、内地相比，香港青少年在“温馨的小家庭”、“自由自在”、“刺激与快感”等选项上明显地高于其他两地，即香港青少年的人生观在个人与社会两极取向上，明显地偏向个人取向，而内地青少年在社会取向上又高于香港、澳门。陈欣欣女士的研究亦得到非常相似的结论。如对澳门中学生关于“人生目的”的问卷调查中，回答为“服务社群”的占43.3%，为“享乐”、“追求名利”及“人格锻炼”（偏向个人取向方面）的占49.4%，总体表现出平衡、适中的倾向。

“度”是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表征事物保持自己质的量的限度、幅度和范围，是和事物特定的质相统一的数量界限。“中度”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中和”、“中庸”、“中道”在基本意义上

是一致的。“中庸”作为儒家提出的一条重要伦理原则和基本道德规范，它要求人们的喜怒哀乐之情感和欲望应保持适当的限度，行为要中正不偏，和而不同。要防止情欲失和，行为偏激，背离人道。既不能“矫枉过正”，亦不能“过犹不及”这些内容在现代社会仍然是有积极价值的。有人认为，澳门与香港相比，政治冲突比较少，社会矛盾也较和缓，这种善于“共处”的社会哲学是它的珍贵财富。但是，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传统中庸之学所未能阐明的最大问题就是中庸与极的关系，看不到“极”在相互制衡中的作用，甚至夸大中庸的合理性，把它变成一种绝对的价值原则，在这个意义上，“中庸”就可能成为束缚人的发展、压抑人的创造性的精神枷锁。所以，我们既要看到人在进行价值选择时，能达到“中度”境界的合理性，又要看到它同时潜藏着保守的因素。这个看法似乎也可解释澳门社会现状。

第三，稳固性。所谓“稳固”是相对“变化”、“改变”而言的。人的观念意识作为社会存在的反映，不可能一成不变，尤其是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它必然要随着这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变化而变化，在某种意义上，观念的变化与社会的变化是成正比的。因此，当我们说澳门社会价值观具有稳固性的特点时，是指其受传统的拉力影响较大，变化的速度比较缓慢、渐进、温和。

从历史上看，澳门是一个典型的移民社会，其人口的升降取决于大陆移民的迁入与迁出。据1991年的人口普查统计显示，澳门人口中有86.3%是以广州话为日常用语、1.1%用普通话、9.2%用其他的中国方言，用中国方言合计有96.6%，而用葡语的则占1.8%。据粗略估计，中国人占澳门人口的95%，葡国人占3%，还有2%是其他国家的人。其实，就移民社会、中国人口占大多数而言，与香港的情况并没有多少区别，但澳门的移民人口不仅年青，而且文化程度偏低，这就使得传统价值观的传承具有相当的基础。它主要表现为，对传统价值观的移植带有很强的直接性和复演性，而传统价值观一旦根深蒂固为人的文化本能时，就有相当的稳固性。因此，尽管近二十年来，

澳门社会也正在经历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传统价值观念受到明显的挑战,然而,人们对传统价值观的认同程度依然很高,如有学人对澳门青少年的人生目标选择作调查,统计发现:本人出生香港的本澳青少年比较注重个人的独立、自由与享受,同时也比较关注人类和平与社会平等;本人出生地为澳门的青少年,在许多方面与大陆出生的青少年观念比较接近,他们较注重内心协调、小家庭生活、以及个人的经济成功。在与人相处的态度上,有六成以上的被调查对象认为对父母要孝顺,对师长要尊重,对朋友要彼此帮助。这些都与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是相一致的。

的确,与香港相比,澳门是一个年轻的工商社会,它没有象香港那样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也没有象香港那样高度开放的国际地位,这就使其价值

观念基本可以循着社会的有序变化而变化,与传统维持自然的“亲合力”,与现代保持相当的拉力。正是基于这样的情形,有论者认为,澳门人形成一种特殊的国民心态:对香港有自卑感、对葡萄牙政府有隔离感、对大陆人有自信心、对中国传统有认同感。这些相互制衡的心态,既是构成相对稳定价值观的基础,又是这种稳固性的表现和结果。

稳定与变化是事物运动过程的两种状态,只有绝对的变化,没有相对的稳定,事物则失去质的规定性而不可思议;若只有绝对的稳定,没有变化,事物就失去生命力,社会也就陷入僵化。因此,澳门价值观的稳固性特点对其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具有二重性的。

【责任编辑:许锡挥】

(上接第20页)

#### 4. 拓展具有穗澳特色的现代化旅游业

素有“无烟工业”之称的现代旅游业,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对生活水平今天日益提高的广州人来说,已不满足于国内旅游,因此发展境外旅游是我国旅游业的进一步拓展的大势所趋。1999年初,我国为着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又颁布了境外资本可以与内地合资举办旅行社的规定,这无疑为广州拓展与澳门的旅游合作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据统计资料显示,1997年广州市主要宾馆接待过夜的国际旅客数达到228万人次,港澳旅客为131万人次,国际旅客中欧盟成员国家的旅客,美国(2.0万人次)、法国(1.86万人次)、德国(1.64万人次)、意大利(0.76万人次)。随着中国大陆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对外开放度进一步提高,以及广州环境的进一步改善,前来广州投资、经商、观光旅游的人数呈增长态势。因此,可

以考虑选择如下方面进一步推动穗澳旅游联系与合作。

方案1:进一步松动出境游的审批手续,可考虑利用广州、澳门不同的旅游景点、项目及特色,开通穗澳旅游专线(可称为一线式或一票式旅游)内地游客购一票既可在广州领略岭南城市的美好风光,又可以直接进入澳门旅游,使有的旅客尽管无法亲临美国拉斯维加斯和摩洛哥的蒙地卡罗,但可以在澳门领略东方的赌城博彩的风采。

方案2:联手珠海,实施穗、珠、澳连环旅游,内地游客第一站到广州旅游、观光(或购物),第二站到珠海的景点旅游,最后以澳门为旅游的终点站。通过拓展“一票式”或“一票三站式”的旅游格局,以此逐步实现穗珠澳的旅游资源共享和三地旅游的融合,带动各自社会经济等的全面发展。

【责任编辑:郭天武】



# 论澳门经济增长的外生性与内生性

陈广汉

本文将一个国家或地区内部生产要素的积累、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所导致的经济增长定义为内生经济增长。一般来讲,现代经济增长都具有这种内生性,它是一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条件。如果导致一个社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来自于外部,那么这种增长就具有外生性。这种外生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主要取决于外部条件变化。澳门从 60 年代开始的经济增长和经济起飞具有很明显的外生性特点,实现经济增长的内生化是保证澳门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

## 经济增长的阶段

澳门经济增长从 60 年代开始启动,70 年代开始经济起飞。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1971—1981 年间,澳门经济每年的平均增长率高达 16.7%,大大高于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时期的经济增长率。1982—1990 年澳门 GDP 的年均增长率为 7.7%,在亚洲四小龙中仅低于韩国和台湾。但是 1990—1996 年期间澳门的年均增长率下降到 4.8%,特别是从 1996 年开始连续出现了 3 年负增长。<sup>①</sup>

如果仅仅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澳门在从 60 年开始的近 30 年时间里,取得了比亚洲四小龙毫不逊色的增长记录。将澳门称之为东亚的“第五小龙”也不为过。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澳门在 80 年代后期已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1995 年以当年价格计算的人均 GDP 达到 18181 美元。从产业结构的演进看,澳门的经济增长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 劳动密集型加工业推动经济起飞。在澳门经济的起飞阶段中,经济增长的主导部门是制衣和纺织业,其中制衣业的地位尤为重要。50 年代是澳门制衣业的起步时期,并有产品出口葡萄牙或前葡属的非州地区。60 年代澳门制衣业生产规模扩大。由于欧美等国相继实行纺织品进口限制,这些国家的纺织品订单陆续从香港转到澳门,使澳门的制衣业开始扩展到欧美市场。70 年代是澳门制

衣业发展的全盛时期,1978 年制衣业的就业和产值在工业就业和产值中的比重分别为 67% 和 60%。进入 80 年代后,虽然澳门制衣业和纺织业的绝对值仍在增长,但其相对地位开始下降。制衣业面临劳工短缺、技术工人不足、工资上涨的困难,加上中国内地的开放,使澳门劳动密集型的服装和纺织产品的竞争力下降。这预示着澳门制衣和纺织业发展的颠峰时期已经过去。

2. 产业结构调整与机遇的丧失。80 年代,澳门的整体工业试图向多元化方向推进。电子和塑料工业出现了较快的增长,二者在工业中的比重由 1980 年的 2.4%,上升到 1983 年的 12.4%。当时澳门的电子工业主要包括收音机、收录机,也有生产计算机、电脑等电子原件的企业。1982—1984 年是澳门电子工业发展最快的时期。此间,澳门电子产品的出口值占工业产品出口总值的比重上升到第四位。但是,从 1985 年开始澳门电子产品出口开始大幅度回落。一个很有希望的,具有较高科技含量的新兴产业的发展很快陷入了困境,澳门的产业升级失去了一次历史机遇。

3. 制造业的萎缩和向服务型经济的迅速转型。劳动密集型制衣和纺织业比较优势的丧失,产业升级的失效,使澳门的经济增长愈来愈依赖于博彩旅游业为主体的服务业。澳门制造业的萎缩趋势 80 年代后期开始显露,90 年代加速推进。1989 年制造业占 GDP 的比重从 21.4% 下降到 1996 年的 8.3%;而以博彩和旅游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公共行政、社会服务和个人服务业的比重从 39.2% 上升到 49.8%。从 80 年代中期开始,澳门的博彩旅游业开始取代制衣和纺织业成为澳门经济增长的主导部门,1984 年博彩旅游业的收入占澳门 GDP 的比重已达到 25%。

澳门、香港和新加坡均属于城市经济体系。1989 年新加坡、香港和 1990 年的澳门的人均 GDP 水平大约分别为:10450、10350 和 10593 美元,但是它们服务业在 GDP 中的比重分别为 63%、72%

和75%。<sup>②</sup>经济结构的过度软化是香港和澳门经济面临的共同问题,而澳门比香港更为严重。澳门、香港与新加坡在相同发展水平上产业结构的差别是殖民主义者夕阳心态在经济发展上的反映,也是澳门和香港放任自由的经济政策在产业升级上导致的不利影响。香港和澳门产业结构的过度软化和空心化产生的对外部经济的依赖性和脆弱性的弊病,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充分暴露出来。

### 经济增长的外生性

澳门并不是一个转口贸易的城市,但其对外经济的依存度相当高。1982年-1990年期间对外经济依存度年平均为157%,1991-1997年为113%。这表明澳门经济的发展与进出口规模密切相关。从对外经济关系看,澳门是一种两头在外的“飞地式”经济,其经济增长具有很强的外生性。这种外生性体现在两方面:第一,外部因素构成经济增长的主要条件,反映出澳门经济的对外依附性质。第二;主导部门增长的产业联系效应缺乏,又导致了澳门产业结构的单一性。

首先,从经济起飞和工业化时期看澳门经济增长的外生性。以制造业和纺织业为主体的经济增长,推动了澳门经济起飞和工业化。从产出和投入两方面看,这种增长均具有很强的外生性。第一,从产出和市场看,澳门制衣和纺织业的增长依赖于70年代欧美各国对纺织进口的限制和对澳门纺织品进口的配额制度。正是这种纺织品的国际贸易保护体制,保障和增强了澳门服装和纺织品在欧美市场的竞争力。澳门利用60年代发展的制衣与纺织业基础,依赖欧美国家的纺织品配额,通过该产业产品出口的迅速扩展,推动了70年代的经济起飞。在1970-1982年之间,澳门制衣业的产品出口增长了27倍,平均每年递增31.7%。<sup>③</sup>大约有80%的服装和纺织品是出口到同澳门签有纺织品贸易协议配额的市场中。如果没有欧美国家纺织品进口配额制度的保护,澳门制衣和纺织业的高速增长是不可能的。第二,从投入和生产要素看这种增长的外生性。劳动密集型制衣和纺织业的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60年代和70年代初,大量东南亚、美洲华侨和内地居民移居澳门,为制衣和纺织业的发展提供了廉价劳动力。同时欧美的配额制度和较低的成本吸引了大量香港资本,许多港商纷纷到澳门设厂。如果说纺织品配额制度为70年代澳门制衣业的高速增长提供了市场和可能,那么廉价的华人劳工和

香港资本的结合,则使这种增长变为了现实。直到90年代,在澳门货物出口中占绝对优势的仍然是制衣和纺织业。1997年纺织品和成衣占货物出口的比重约为85.6%。

其次,当澳门经济从劳动密集性的制衣与纺织业转向博彩旅游业为主体的服务型经济后,澳门经济对外部的依赖性并没有减弱。在80年代中后期,澳门的博彩旅游业超过制造业成为澳门经济的第一大产业。以当年价格计算,1991年澳门服务出口首次超过货物出口。1997年服务出口占出口总值近60%,而非本地居民在澳门市场的消费所形成的服务出口占整个服务出口的91.4%,其中在博彩业中的消费占服务出口的62.1%。<sup>④</sup>这充分表明了澳门服务业结构的单一性和对外的依赖性。

货物和服务贸易构成澳门对外贸易的两大支柱,货物贸易由制衣和纺织为主导,而服务贸易几乎完全由博彩旅游业构成。前者依赖于配额制度,并集中于欧美市场;后者有赖于外部需求,市场集中在与澳门相邻的亚洲国家和地区。澳门对外贸易的这种性质和格局也表明了其经济的脆弱性和经济增长的外生性。

### 经济增长内生化的选择

如果说本地市场狭小和资源贫乏是澳门经济增长外生化的客观条件,那么高素质人力资本不足和政府产业发展上的“随波逐流”政策则是经济增长外生化的主观原因。资源贫乏和市场狭小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增长的外生化,亚洲四小龙中韩国、台湾和新加坡就是很好例子。与新加坡、韩国和台湾相比,澳门经济增长缺乏的重要条件是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和具有预见性的政府产业政策的引导和协助。这是80年代初澳门产业升级失败的主要原因。

第一,提升人力资本的素质是促进澳门经济增长内生化的物质基础。一国的人力资源是国民财富的最终基础,对于物质资源贫乏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人力资本形成和人力资源开发的主要形式是教育和培训。澳门教育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是导致人力资本形成不足,经济增长难以持续增长的重要原因。韩国和台湾在经济起飞时期都经历过一个教育高速发展,即所谓教育爆炸(educational explosion)时期。在1953-1963年韩国的识字率从30%上升80%以上,普及初等教育不仅在城市,而且在农村成为法规,中等和高等教育发展更为迅速。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在1963年人均收入大约只

有 100 美元的韩国, 人力资源的发展超过了一个当时具有中等人均 GNP 水平的国家的三倍。<sup>⑤</sup> 韩国在 60 年初基本普及了小学教育, 1985 年入学人数占各入学年龄组的百分比分别为: 小学 96%、中学 94%、大学为 32%。台湾的人力资源开发与教育的发展毫不亚于韩国。从 60 年初开始, 台湾将人力资源作为经济发展的最主要资源来认识, 并将人力资源开发列入经济发展的计划之中。实现教育与训练的双轨式人力开发制度。在正规教育中, 重视技术和工业教育。1964 年普通高中与职业高中的比例为 6:4, 到 1989 年调整到 3:7。台湾 60 年初实现 6 年国家义务教育, 1968 年起提高到 9 年。韩国和台湾的教育普及与发展属于一种人力资本的再分配, 它不仅推动了经济的增长, 而且使劳动人口具备了参与经济发展和获取收入的能力, 导致了收入的均等分配。从人均 GNP 水平看, 澳门早已超过韩国和台湾。但是, 1997 年澳门劳动人口中具有大学学历的只有 6.6%, 受过专业教育的占 30.4%, 文盲占 20%。澳门成人识字率只相当于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与韩国 60 年初的水平相当。澳门只是在 1995 年开始实现 7 年免费教育, 1997 年开始实施初中 3 年免费教育。澳门教育发展落后不仅表现在数量上, 而且体现在质量上。目前澳门各学校的在职教师接受师范教育训练的只占三成。政府对私营学校教师的学历、师资和升职制度一直采取自由放任的不干预政策。由于对教师的权益和福利关注不够, 导致教师流失。因此, 澳门要实行经济增长的内生化, 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是一个必须优先解决的问题。

第二, 政府适当的产业政策的引导与协助是经济增长内生化的重要条件。对于一个后发性的经济来讲, 政府的产业政策在推动产业升级和调整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台湾和新加坡以及香港和澳门的经济发展从正反两方面证明了这一点。在经济发展初期, 新加坡的经济与香港相比更偏重于服务业。1950 - 1960 年香港工业和服务占 GDP 的比重为 40.7% 和 55.6%, 新加坡为 31.2% 和 65.2%, 但 1995 年香港的上述比重分别为 18% 和 82%, 新加坡则为 36% 和 64%。在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 新加坡的服务业的比重基本稳定, 并略有下降, 工业的比重是稳步上升; 而香港的工业的比重不断下降, 经济越来越偏向服务业。实物经济活动萎缩, 产业结构过度软化对香港和澳门经济的发展产生了

不利的影响, 也是它们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经济迟迟难以复苏的一个重要原因。香港回归之后, 特区政府大力扶持和推进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政策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举措。澳门回归后, 如何实行制造业的振兴也是摆在澳门政府面前的重要课题。

第三, 引入竞争机制, 减少垄断, 增强经济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从市场的竞争和政府经济的管理程度看, 澳门的经济表现出特有的二元结构性质: 处于自由放任与市场竞争比较充分的制造业和属于授权经营与垄断程度很高的服务业。政府专营行业包括了博彩业、公用事业和运输等行业。据估计专营行业的产值在澳门经济中的比重超过了 60%, 专营税收在政府财政收入中的比重达到 54% 左右。澳门由于本地市场较小, 出于规模经济的需要, 对于某些公用事业实现专营是难免的。但是对于在服务业中占主导地位的博彩旅游业也实行高度的垄断经营则是不利该行业发展的。澳门政府对制造业的放任自由和服务业的专营体制, 一方面使制造业的产业升级得不到政府支持, 制造业结构单一, 且严重依赖于欧美国家的贸易配额; 另一方面导致了服务业的低效率, 博彩业经营中的利益冲突, 还影响社会治安与稳定。笔者认为, 未来特区政府应该对制造业中的升级和调整予以支持和协助, 推进澳门高附加值制造业的发展和传统产业的技术进步; 同时在服务业中缩小专营权的范围, 引入竞争机制, 建立市场秩序, 推进服务业的多元发展, 提高服务业的竞争能力。

#### 注释:

①澳门统计暨普查司:《1997: 本地生产总值》, 黄汉强主编:《澳门经济年鉴》, 华侨报出版社, 1984/1986 年, 第 23 页。

②1997 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澳门统计暨普查司:《1997: 本地生产总值》

③黄汉强主编:《澳门经济年鉴》, 华侨报出版, 1983 年, 第 118 页。

④澳门统计暨普查司:《本地生产总值》, 1997 年, 第 124 页。

⑤哈比逊:《F. Harbison》:《教育、人力和经济增长》, 1964 年英文版, 第 31 - 48 页。

【责任编辑: 周运源】

# 粤澳经济合作发展新阶段

李华杰 李永杰

澳门回归祖国后, 粤澳两地将携手共同迈入 21 世纪, 繁荣经济任重道远。因此, 如何采取有效措施, 使澳门的独特优势与广东广大腹地的优势整合, 既使澳门成为粤港澳经济区域中有特殊作用的增长极, 又有利于推动粤港澳区域经济整体实力的增强, 提高区域经济的竞争力, 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 一、澳门经济定位与粤澳经济合作新阶段的发展目标

在区域经济中, 通过合作发挥区域中相对独立的微型经济体系的优势, 明确其经济定位和区域分工, 对于形成区域经济优势, 取得区域经济合作的显著成效, 是至关重要的。因此, 在新时期的粤澳经济合作中, 根据澳门自身的经济优势和发展潜力, 以及区域经济分工需要, 合理进行经济定位, 是有效推进粤澳经济合作的首要问题。

澳门的经济定位问题, 不仅涉及澳门经济重建, 摆脱自 1996 年以来的经济衰退的困扰, 提升国际竞争力等问题, 而且关系到澳门在区域经中所扮演的经济角色, 承担区域经济分工职能, 发挥区域经济增长极的积极作用, 形成分工互补, 避免恶性竞争的良好合作关系。只有从这两方面出发, 并结合澳门客观存在的竞争优势和发展潜力来进行经济定位, 才是理智和合理的。

自 1997 年以来, 关于澳门经济定位问题的讨论, 不少论者已有一个比较一致的认识, 各种表述虽不尽相同, 但大致上将澳门的经济发展路向定位

为: 发展成为现代化的以博彩业为特色的国际性综合旅游和商贸服务城市, 以旅游博彩业和商贸服务业为主导, 带动整体经济的持续发展。笔者对澳门经济定位也持上述看法。

这个目标定位是要分步走的。从短、中期看, 首先是发展以博彩业为主导的旅游业, 即博彩旅游, 在此基础上, 拓展观光旅游和包括商务、会议、渡假、文化旅游的非观光旅游, 最终形成综合性的旅游业。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两点: 一是选择以博彩为特色的综合性旅游业为支柱产业, 是根据该产业在澳门经济中的竞争优势和潜在优势, 以及在区域经济中的分工优势来选择的。澳门博彩业历史悠久,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 博彩旅游一直是澳门经济最具特色的、最重要的支柱产业, 政府财政收入约 50% 来自博彩税。由博彩业带动旅游及其他服务业发展对解决社会就业约占 70%。博彩旅游业稳定和发展对澳门经济的重建和繁荣至关重要。况且, 澳门数百年来积淀下来的丰富历史、人文等旅游资源远未得到系统的开发, 资源潜力巨大。发挥旅游资源的潜在优势, 是澳门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二是澳门综合性旅游业的发展, 从结构上说, 是全方位的、多元化旅游的发展, 而从特色来说, 则必须长期保持博彩这一显著特色。不管过去说的“东方蒙地卡罗”, 或是将来的“东方拉斯维加斯”, 都离不开博彩业。澳门博彩业的存在与发展, 正是周边国家与地区所不具备的竞争优势, 也是澳门经济长期得以发展的根本原因之一。因此, 综合性旅游业发展必须以博彩旅游为主导, 这是不容争辩的。

从中、长期看, 澳门经济发展则要在发展以博

彩旅游为主导的综合性旅游业的同时,逐渐发展成为国际性商贸服务城市。亦即商贸服务业要作为澳门中、长期经济发展的另一支柱产业。这一选择,既考虑了澳门的区位优势、自由港优势、国际商贸关系优势,以及某些潜在的比较优势,也反映了粤澳经济区域分工的客观要求。从澳门自身的独特优势来看,首先,具有区位优势。澳门地处珠江入海口西侧,靠近国际主航道,与香港仅一水之隔,背后有宽广的、经济日益强劲的珠江三角洲腹地,地处亚太经济区中高速增长带的中心,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增长极,战略性区位优势十分明显,澳门国际机场的建成和深水港的建设,将更呈现这种区位优势。第二,具有自由港优势。澳门实行自由贸易制度已有150年历史,资金、货物、人员进出自由,税制简单、税率低。澳门也是一个独立关税区,在许多西方国家享有特惠关税待遇,这对澳门开拓发展对外贸易之利不言自明。第三,具有广泛而又独特的国际联系。澳门作为一个高度开放的经济体系,已与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济贸易联系。澳门是关贸总协定第101个缔约成员,是20多个国际经济组织的正式成员和准成员。与香港在金融、贸易和工业等领域的关系密不可分,与珠江三角洲亦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的经济合作关系。更为独特的在于,澳门与世界上30个拉丁语系国家以及欧盟建立了特殊关系,在发展经贸合作方面,具有独特的优越条件。从某些潜在的比较优势来看,也为澳门发展商贸服务提供了机会和条件。一是澳门与香港同是自由港经济和独立关税区,但澳门的商贸服务运营成本较之香港更为节省,地价与租金只为香港的17%,雇员工资及生活费用均只为香港的40%左右。在香港商贸服务运营成本日见上涨的趋势下,澳门这一优势将日益显现,只要刻意改善商贸服务的软硬环境,不仅港商,就是台商及外商,也会日趋选择澳门作为后勤服务基地。二是自澳门国际机场建成启用以后,澳台的经贸关系发展很快,台商已逐渐认识到澳门是一个投资中国内地尤其是珠江三角洲的便捷的桥梁。

从粤澳经济区域分工的客观要求来看,珠江三角洲,尤其是富裕的西部地区,工业和服务业将在长期内处于一种迅猛发展的态势。对外贸易活动总量不断扩大,为谋求更高的经济收益,需要寻找一个更为便捷,运输成本相对较低深水港。这一点,澳门与珠海联合可以达致这一目标。其次,珠江三角洲西部地区工业发展所需的大量的进口物料,需要一个便于出口,运营成本相对较低的、大型综合的输入物料后勤服务基地,澳门较之香港更具优越性。再次,广东乃至珠江三角洲对外经贸活动的发展,必然要拓展市场,在市场多元化发展中,也需要利用澳门的优势发展与欧盟及拉丁语系的国家与地区的贸易。

诚然,需要指出的是,澳门经济定位以上述两大产业为主导,并不排斥产业多元化发展,出口加工业、房地产业及金融业等,都应顺应澳门经济发展所需,适应华南经济区域发展要求,进行创新和技术改造,以推动澳门经济发展。

澳门经济发展有了明确的路向,新时期粤澳经济合作的发展目标就可以围绕澳门的经济定位和广东的发展战略来确定。即粤澳两地在“一国两制”基本框架下,整合两地的优势,形成分工协调,经济规模和综合实力强大的区域竞争优势,推动区域内现代化快速发展。

在旅游方面,围绕澳门发展以博彩旅游为主导的综合性旅游业的目标,广东积极进行配合,形成多层次的旅游协作区。第一层次是澳门本土的以博彩旅游为主的旅游区;第二层次是澳门与珠海整合的综合性旅游区;第三层次是粤港澳联合的大规模的旅游区。使粤澳合作的游旅游协作区成为亚洲最具吸引力和竞争优势的旅游热线。

在商贸服务方面,通过两地合作,将澳门建成珠江三角洲西部地区的工业后勤服务基地,提升其对这一地区的工业后勤支援服务能力,推动工业化进展。并通过强化基础设施建设的合作与协调,加快海、陆、空交通运输网络、信息网络等建设,拓展澳门的经济活动空间,为其早日成为区域商贸服务中心奠定基础。与此同时,不断加强贸易、金

融、工业、技术、信息、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合作,不断扩大粤澳两地资金流、信息流、物流、人流等往来,使澳门最终成为区域商贸服务中心,推动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

## 二、粤澳经济合作新阶段的发展的策略

推进新时期粤澳两地经济合作的发展,需要围绕既定的目标,根据两地目前合作中及各自经济发展中急待解决问题,采取相应的策略。我们的建议有如下几个主要方面。

### (一) 加强两地政府之间的沟通协调,推动合作的顺利发展

新时期粤澳经济合作的发展,需要两地的政府和民间两个层面的共同努力,政府的协调与政策引导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回归后的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与广东省政府,是“一国两制”条件下的两个地方政府,应本着平等、协商的原则,在中央政府的指导下,就区域合作与发展的各项重大事项进行沟通与协调,共同进退、共同繁荣。为此,需要组建相应的协调机构,有效地开展协调工作。这些机构至少应有三个层次。一是最高协调机构。可由两地共同组建经济合作协调委员会,其职能主要是解决两地合作过程中的指导原则、政策取向、重大事项决策等问题。二是半官方机构。根据合作的发展需要,在旅游、贸易、工业、科技、信息网络、教育与人才等方面设立相应的机构。其职能主要是解决具体合作领域的协调问题,提出各个领域合作指引,处理具体的合作事务等等,以推动各个领域的合作发展。目前,澳门已经部分设有这些机构,还应适当增加,但广东方面还缺乏这类机构,应根据需要来构建。三是由政府机构指导的行业性协会。目前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加强两地行业性协会的沟通与协调,发挥其促进合作发展的积极作用。

### (二) 以推动旅游合作为契机,扩大澳

## 门经济发展空间,带动两地经济稳健发展

粤澳两地的旅游合作,已有良好的基础,也取得一定的成效。但如何进一步充分利用两地旅游资源潜力巨大和互补性强的优势,推动两地旅游合作迈上新台阶,带动两地经济发展,尤其是与旅游相关的服务业的发展,大有可为之处。

首先,以推进两地综合性旅游业发展目标,将澳门以博彩旅游为主的旅游资源与广东以自然风光、历史、人文旅游资源进行优势互补,在此基础上,在已有的旅游热点基础上,开发新的旅游热点,拓展商务、会议、渡假等旅游,使旅游业向多元化发展。

其次,两地合作开发横琴岛,将其建成以旅游业为主导,综合发展商贸饮食、房地产等产业的“国际旅游区”。近几年来,这一设想得到两地许多论者的共鸣。在功能上,可将其设定为渡假、休闲、购物、会展,以配合澳门发展博彩旅游为主导,观光与非观光旅游的全面发展。在特色上,突出“中西文化交流”的主题,以吸引海内外广大的游客。横琴岛“国际旅游区”的开发,不仅能有效地拓展澳门经济发展空间,特别是综合性旅游业的发展空间,而且能提升两地经济合作的层次。

第三,建立旅游业发展协调机构,组建大型的旅游集团。下世纪初,粤港澳地区将成为世界三大旅游热点之一,面对这一机遇,仅有一般的“联合推广机构”不能适应这一挑战。必须在区域中长期旅游发展规划、发展策略、景区景点布局与投资建、利益协调等方面进行高层次的协调与合作。因此,需要建立具有决策、协调职能的机构,以统筹全区旅游业的综合发展,并配合以组建大型的旅游集团,直接推动旅游业的发展。

### (三) 继续加强两地基础设施建设的协调与合作,为两地经济发展增创良好的硬环境

自90年代以来,粤澳两地的基础设施已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目前的主要制约在于粤澳的陆路



(包括高速公路与铁路)未能联结及澳门缺乏深水港。同时,沟通粤港澳三地的便捷的交通运输网络建设问题,具体来说就是跨越珠港澳三地的跨海大桥的建设问题,也是未来三地经济合作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有关跨海大桥及深水港的建设方案,三地政府及学者都有不同想法,提出过多个方案。这涉及投资成本、经济效益与三地各自的经济利益问题。需要在中央政府协助下,三地通过充分协商和合作,不以一时一地之利益争长短,而以三地共同的长远的利益去考虑问题,在多个方案的比较、论证的基础上进行选择,才能成功。

#### **(四) 充分利用澳门的特殊优势,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推动两地经济国际化发展**

澳门未来发展成为国际性的商贸服务城市的经济定位,目的就是为了推动澳门经济与广东经济的国际化,扩大对外经济活动的舞台。因此,必须充分利用澳门的自由港、独立关税区,以及与台湾、欧盟和拉丁语系国家、地区的具有广泛联系的特殊优势,以澳门为中介,两地联手发展与台湾、欧盟及拉丁语系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关系,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

在发展广东与台湾的经贸关系方面,充分利用澳台通航及澳台关系日益密切的机遇,在澳门设立台商投资促进机构,着重做好咨询服务、招商引资等工作,吸引更多的台商到澳门、广东投资与贸易,使澳门成为广东台商的总部集结地和生活、后勤服务基地,使广东成为台商投资与贸易的热点。

在发展粤澳与欧盟和拉丁语系的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关系方面,要充分利用澳门欧洲资讯中心所提供的关于欧洲的投资、贸易、法律等方面的信息,进行市场分析,寻找机会,引进外资和输出产品,逐步扩大经济贸易的往来。对拉丁语系的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关系发展,目前应主要进行市场调查,寻

找市场突破口,为拓展东西非洲和南美洲的市场开辟道路。

#### **(五) 创造各种有利条件,促进两地人才、技术交流、促进产业的升级转型**

澳门经济发展路向以综合性旅游业和商贸服务业为两大支柱,但并不排斥出口加工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等产业的发展。这些产业的发展都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和科学技术。澳门素来严重缺乏专业人才和科学技术,而广东经济20年改革开放的发展,相对于澳门具有比较优势。因此,澳门完全可以借鉴香港积极引进内地高级人才的方法,采取积极措施,从广东以至内地引进高中级人才,以丰富自身的人才资源。在科学技术引进方面,亦可向广东以至内地引进应用科技,用以改造传统的加工业,推动产业升级转型。而广东的科技机构、高等院校以及厂商也应运用市场机制积极向澳门厂商推介,相得益彰。

#### **(六) 支援澳门人才资源开发,努力提高澳门人才资源的整体素质**

澳门回归后的经济重建和制度创新都需要大量的各种类型和各种层次的人才。只靠人才引进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关键还要靠培养本地的专业人才和提高本地人力资源的整体素质。这不仅需要澳门特区政府下大力气改革教育体制,调整教育结构,增大教育投资,积极开展普通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而且需要广东以至内地的高等院校给予大力支援。因为澳门的高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资源有限,需要利用广东以至内地的教育资源,通过合作办学、合作培训,或输送人员到广东及内地高等院校学习等形式,加快人力资源开发的步伐,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多高素质的人才。

**【责任编辑:周运源】**

# 依靠科技振兴澳门经济的策略思考

(文摘)

郑佩玉

## 一、科技兴澳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经济全球化和以知识为本经济的发展, 中国“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 亚洲经济复苏以及澳门

回归祖国都为澳门以科技创新带动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机遇与严峻的挑战。

澳门虽已失去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发展的原有优势。但是高新技术的出现为澳门依靠科技, 甚至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制造业提供了可能。

澳门是一个高度开放的自由港, 与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贸往来关系。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固然增加了澳门在国际竞争中的风险, 但是, 只要抓住机遇, 通过制度创新, 科技创新, 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 并充分利用国际协调机制, 澳门是有可能在日益广泛和更高层次的国际经济合作中, 促进经济发展。

澳门虽然技术力量薄弱, 但它面对着“技术全球化”国际环境。世界各国争夺技术的竞争, 一方面强化了技术的保护, 另一方面又加快了技术转移和扩散的进程, 以及新技术的形成。澳门可以抓住这个机遇, 根据自身的条件, 以“拿来主义”的方式获得某些高新技术以促进产业的发展, 亦发挥作为中国对外进行技术合作的桥梁作用。

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 80 年代以来高新技术产业已成为它们全球范围直接投资的热点。澳门与其它国家、地区一样面对着通过直接投资引进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和先进产业的有利条件, 问题在于自身的投资环境是否具有吸引外资的条件。长期以来, 澳门制造业的投资主要来自香港。今后能否吸引世界著名跨国公司特别是欧洲跨国公司来澳投资甚至作为进入中国的基地, 便视乎澳门的经济发展状况及投资环境的改善状况。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盛和跨国公司的的发展, 高新技术研究开发呈现出国际化的发展态势, 为澳门参与研究与开发合作提供了发展的机遇。近年, 中国已成为跨国公司研究开发投资的热点, 澳门应充分发挥其自由港和便于与国际接轨, 以及与欧盟国家关系密切等优势, 努力适应研究与开发的需要, 改善投资环境, 为积极参与该领域的国际合作创造条件。

为推动科技进步, 加快经济发展, 中国政府在

“863”计划和“火炬计划”的基础上，于 1995 年提出实施“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中国科学技术在世界排名已从 1994 年的 28 位上升到 1997 年的 20 位。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认为，在下个世纪中国科学技术有望实现跳跃式发展，力争 2010 年进入世界前 10 强，从发展中国家水平提高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内地科技及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为澳门依靠科技振兴经济提供了条件，它可以内地为依托，通过扩大引进内地人才的规模，加快内地技术转移和产业转移，和共同合作进行科技开发等途径来提升本地的科技能力，加快培育新兴产业，改造传统产业的发展步伐。

长期以来，澳门与香港两地经济联系十分紧密，两地之间的货物、资金、技术和人员流动畅顺。香港是澳门的最大贸易伙伴，进出口贸易的中转站，境外最大投资来源地，不少澳门公司实际上是香港公司的分支机构，业务的境外延伸。生产与经营管理技术多来自香港，主要制造业由香港转移过来。港澳回归祖国以后，作为中国的两个特别行政区，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联系将更加紧密，各个领域的合作将从民间层面扩展到政府层面上来。把创新科技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已列入去年香港特首的施政报告中，依靠创新与科技提高传统产业的生产力，把香港建成世界一流的设计和时装中心，发展及应用资讯科技的全球首要城市和国际中药中心。中医药和资讯产业已被香港与内地两地政府列入合作发展的重点产业，并已起步。台商对参与两地上述产业的合作亦表示出浓厚的兴趣。这无疑会给澳门创造很好的机会，积极推动与香港的合作势必有助于澳门上述产业的发展。

澳门回归祖国对依靠科技，增创新优势，促进经济发展提供了许多有利的条件：①“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的贯彻执行，有利于发挥广大澳门各界人士的积极性，有利于特区政府集中大家的智慧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②澳门回归祖国为建立一个廉洁、公正而有效率的特区政府

提供了条件，从而促进澳门的原有优势的充分发挥，新优势的形成；③形成“一国两制”条件下，澳门与内地、香港开展全面合作的新优势；④澳门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将会得到中央政府各个方面切实而有效的支持。以上各个方面将为澳门改善投资环境，促进科技与创新的发展，推动经济结构升级带来重大的影响。

上述机遇为澳门依靠科技振兴经济带来许多有利条件，也带来严峻的挑战。关键是要不失时机地从本地区的实际出发，选择正确的发展方向，实施因地制宜、扬长避短的方针和政策。在产业的选择上笔者认为对旅游博彩业和制造业今后的发展路向很有必要进行深入的探讨。这两个产业的命运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现有的金融、贸易和房地产等支柱产业的发展，甚至左右着下个世纪澳门经济的发展。

## 二、从旅游博彩业向休闲产业转变

传统的赌业在澳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演变，今天已发展成为旅游博彩业，并成为澳门经济的主要支撑点，对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澳门回归之后，旅游博彩业将仍然合法经营。然而它的进一步发展已遇到实质性的障碍。

### 1. 旅游博彩业的局限性日益凸显

博彩业收益下滑在亚洲金融风暴发生之前已经出现，究其原因并不完全是受到短暂性因素的冲击，而是其自身发展已形成了根本性的障碍。

一是，博彩业垄断优势弱化。博彩是澳门博彩旅游的重点，它是一项所谓“人弃我取”的特殊旅游资源。进入 90 年代以来，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相继逐步在特定的区域内开放赌博业，吸引了不少旅游者，使澳门博彩业的垄断优势弱化，国际竞争加剧，客源减少。

二是，澳门旅游博彩业滞后于现代科技的发

展。众所周知,澳门旅游博彩的设施、项目、内容、手段以及经营管理保守、陈旧,更新变化迟缓。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文化素养不断提高,外出旅游的人数增加、时间延长,对旅游观光、博彩的项目、内容、素质也要求越来越高。现由于澳门旅游博彩业跟不上需求偏好的变化,吸引力下降。所以,澳门旅游博彩业急切依靠创新和科技再造辉煌。

三是,市场开发的局限性。澳门博彩业务素以香港、台湾、日本和东南亚国家客源为主,现在有的东南亚国家已开展博彩业务,令澳门部分客源流失。因此,市场潜力不足已制约着博彩业生存发展的空间。

要突破这三大因素的制约,根本的出路是顺应经济知识化的潮流,发挥澳门自由港的优势和“东方蒙地卡罗”的品牌优势,推动旅游博彩业向休闲产业过渡,实现主导产业从旅游博彩业向休闲产业转换,把澳门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休闲产业中心。

## 2. 努力建设世界一流水平的休闲产业

休闲产业是21世纪热门产业。目前,大致可以将休闲定义为:个人从工作岗位、家庭和社会义务中摆脱出来,为了休息、消遣、娱乐、体育、保健,或培养与谋生无关的智能、智力的总称。具体地说,就是进行观光游览、度假、娱乐、智能和健身、疗养等活动。

随着科学技术革命的深入发展,知识经济的到来,世界人口结构和工作方式、生活方式都发生巨大的变化。弹性工作制,在家工作制的出现,工作时间的缩短,有薪假期的增加,工作机构组织的柔性化,休闲时间的灵活性增加以及人们寿命的延长,老年人群体的不断扩大,都使人们休闲时间日益增大。人们对休闲活动的内容、形式的要求越来越多样化、个性化,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休闲生活也随之成为人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已进入大众休闲的时代,休闲娱乐消费迅速增长。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收入迅速增长,小康型以上的家庭已占家庭总数的60%以上。在大城市中现代休闲已被不少居民所接受,向往高格调的休闲生活已成为时尚,尤其在富裕型和富豪型的家庭中,休闲消费支出占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正不断提高,而这些类型的家庭已占全国家庭总数的7%以上。再有,中国老年人口已达1.2亿,其中一些已具休闲消费的需求和能力。可见,内地是一个休闲产业的巨大市场。

日本、亚洲“四小龙”是高收入国家和地区,居民消闲消费远远高于中国内地,是休闲产业重点开发的市场。

可见,澳门面对的是庞大的休闲消费市场,无论是现有的规模还是消费潜力都比旅游博彩业大得多。同时,澳门还具有发展休闲产业的其它优越条件:①“东方蒙地卡罗”的独特形象吸引着不少的游客;②澳门是中西文化交汇、多种宗教并存,包容性极强的国际性城市;③到处弥漫着“欧陆小镇”的休闲情调,是亚洲仅次于新加坡的环境健康城市;④是高度开放的自由港,人员、资金进出自由,便捷;⑤相对于日本、香港等亚洲“四小龙”,澳门具有休闲服务的成本优势,且有较好的服务素质;⑥可提供各种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体育、音乐、书画、饮食、中医药和保健等休闲娱乐健康服务。因此,澳门千万不能错失时机,应从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利益考虑,在现有旅游博彩业的基础上快步向休闲产业延伸,逐步把休闲产业建设成为主导性产业,将澳门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休闲活动中心。

## 三、澳门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路向

如前所述,澳门面对着许多依靠科技进步推动经济振兴的有利因素,但自身却存在人所共知的根本性缺陷,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由于劳动成本上升已失去发展的优势。因此,它必须根据实际情况,既

顺应知识经济的发展潮流,走依靠科技发展经济的道路,又不能脱离实际而操之过急,或作出不适当的选择。对制造业升级转型要从目前的技术水平较低向中等技术水平过渡大体不会有太大的争论,但能不能发展高科技产业和应建立什么样的高科技产业便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

从现阶段来说,澳门自身尚缺乏自主开发创立高科技产业的基础。但这并不是说,澳门与高科技产业无缘。澳门现有科技力量匮乏,高科技产业发展应以内地和发达国家的科技、资金和人才为依托,以境外技术移植为主,以与内地、香港、台湾和发达国家合作为主要形式,积极参与高技术产品的国际分工与合作,以及技术研究开发,以开拓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为目标。

以目前来看,宜创造条件推动以下产业的发展:

### 1. 电子商务

澳门电讯业有一定的基础,但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条件下,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发展已满足不了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澳门要巩固提高区域经济合作的枢纽地位,促进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一定要为经济全面走向数码化奠定良好的基础。

### 2. 生物医药产业

生物医药产业是目前世界五大支柱产业之一,其中的中医药现代化和国际化是我国国家科委“九五”重大项目之一,是民族医药产业参与国际竞争,中药走向世界的重要步骤。澳门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参与内地、香港中医药的跨境合作:①凭借其自由港的优势和与欧盟的特殊关系,以及对外经贸联系的广泛渠道,参与中药工程技术集成化研究。②参与产品创新。中国正在选择一批疗效确切的中

药产品,率先按国际标准规范进入国际医药市场。澳门可以参与国际规范化的研究,帮助这些产品在葡萄牙等欧洲国家或其它发达国家注册上市,打入国际市场。③选择一些已在内地注册上市的中成药,根据欧盟国家的相关要求,与内地合作进行二次开发和全面包装,以推向欧洲市场;④根据国际上通行的非处方药物(OTC)的市场需求,结合传统中药的优势,开发满足人们自疗需要的传统中药非处方药;⑤根据传统中医药在医疗保健方面的优势和市场的需要,与内地、香港合作开发传统中药保健品推向欧美、东南亚国家等国际市场;⑥与内地合作共同在澳门建立国家级的中医诊疗中心及中药连锁店,与澳门休闲产业发展相互配合。

### 3. 信息产业

信息产业是新一代生产力的代表,澳门发展信息产业面临着信息产业全球改革开放的机遇与挑战,面临内地、香港把信息产业作为今后重点扶持产业的大好时机。澳门电子产业有一定基础,今后发展应加强与内地、欧盟国家的合作,跟上信息技术革命的潮流,积极参与这一领域的国际分工与合作,强化研究与开发的力度,推动技术进步,提高产品档次,增加产品品种,扩大行业规模,提倡管理创新,以提高全行业的素质。

综上所述,澳门经济发展路向,应是以旅游博彩业向休闲产业过渡,形成以休闲产业为主导,中等技术与高科技制造业并存,金融业、贸易和房地产繁荣发展的多元化经济结构。

(全文载《澳门日报》1999年9月12、19、26日)

【责任编辑:许锡挥】

# 澳门旅游博彩业发展路向与对策

雷 强      李 郁

自 95 年澳门经济出现增长放缓时起, 澳门一直在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从近几年的实践来看, 可以较清晰地看出以下几点:

(1) 澳门制造业的外迁是经济规律的必然现象, 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澳门的衰退已不可挽回。而在工业中寻求高科技发展路线, 由于基础薄弱、人才奇缺、投资意愿不强、外部竞争激烈和起步太晚等原因, 在短期内很难见效, 只能作为一个中长期发展策略, 逐步发展。澳门制造业在短期内不可能发生大的变化。

(2) 房地产业及建筑业, 由于空置楼宇数量庞大, 至 1999 年最少都超过 4 万个空置单位, 积压资金可能高达近千亿元澳门币, (杨允中:《新世纪澳门经济发展路向与策略》, 1999.6) 而人口增长缓慢, 房地产业的衰退仍将持续。随着国际机场的建成和填海造地需求的减少, 通过固定资产投资来带动经济发展的作用已十分小。

(3) 金融业仍将继续维持一个为本地市场服务的格局。

事实上在澳门经济中只有旅游博彩业仍具有一定的活力。虽然周边地区经济都有放缓的现象, 但每年到澳门的游客数仍在不断增加, 1998 年到澳门游客数仍有 695 人。另外, 澳门从事旅游博彩业的人员比例也是很大的, 1996 年在澳门就业人口中直接从事旅游博彩业的人口约有 4 万人, 占就业人数的 20% 和总人口的 12%, 从事旅游博彩业及相关行业的人口则更多, 占就业人数的 30%。因此, 旅游博彩业几乎已涉及到澳门的每个家庭, 关系到他们的民生。如何在现时环境下保持和发展旅游博彩业, 是保证澳门经济平稳过渡与近期发展的最现实的问题。针对以上问题, 我们给跟不上形势、陈旧落后的澳门旅游博彩业发展提出三个新的概念和一些对策, 在改革与创新澳门旅游博彩业时参与。

1. 给澳门旅游博彩业整体建立起一个概念——一个以中西文化、娱乐、景观为主要内容的大型主题公园。

这个主题公园包括中西博彩方式结合的博彩方式、博彩场馆及相应的酒店和服务设施, 一个具有

亚热带海边风光的天然景色, 若干个具有东西方特色的建筑群落, 多种具有中国各地特色、欧洲各款式的餐饮文化及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资源条件。建立起这个概念, 目的在于彻底摆脱澳门只有“赌与色”的形象, 为澳门旅游博彩业注入新的内容, 并把这些内容形成一个体系, 共同构成“主题公园”这个大旅游概念, 同时也把博彩业重新进行包装, 并把它作为这个体系的一个重要有机部分来推广宣传, 以期充分发挥澳门旅游博彩业中“两条腿”的作用。

2. 第二个概念是否可以将旅游业与博彩业分为两个有密切联系而又独立发展产业来认识与运作。

这样会有利于两者的发展以及澳门整体经济发展。博彩业与旅游业是两个性质不同的行业。前者是一个古老而亟具诱惑性的行业, 在国际上是个特殊行业, 而后者是个朝阳行业。两者无论是从内容到形式上都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行业。而在澳门旅游博彩业中, 博彩业占主导地位, 旅游业是依赖博彩业发展的。由于历史上的原因, 澳门博彩业仍然保留着浓厚的古旧经营方式并由兹引发和增添许多治安和腐败的社会问题。近几年来澳门旅游博彩业有较大幅度下滑, 其陈旧体制与经营管理方式落后已成为社会上众矢之的的改革焦点。同样, 落后的博彩业严重影响了旅游业的发展。如果博彩业与旅游业分开来考虑问题, 就不会有以谁为主, 发展谁, “淡化谁”的问题。两个不同行业, 可按照不同行业发展规律, 惯例放开手脚大力发展。

3. 第三个概念是博彩业和旅游业的现代化。

针对上述弊端, 澳门的博彩业和旅游业要现代化改造。首先要解决的是人们思想观念上的现代化。对这两个行业是否需要进行现代化改造, 继而这个行业要按照现代产业企业经营。博彩业要按照产业来经营和发展, 就必须引入竞争机制。澳门博彩业专营权在 2001 年底届满后, 如何改革, 什么时候以什么形式来改革, 在合约期届满后需不需要有个过渡期, 做好准备再改革等等可另文讨论。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博彩业引入竞争机制是不可避免



免。否则一潭死水,缺乏国际竞争力。严重妨碍博彩业本身的发展。关于对博彩业服务人员工资制度改革方面,对低层服务人员应采取底薪及花红制,而不应采取现时的备金制。这样可避免服务人员经常向客人“抽备”而影响客源的现象。在经营方针和策略方面改变单打一发展赌业,而是团结博彩业,在酒店、餐饮、娱乐业、购物……方面努力创造一个服务一流的,物超所值的环境,配合赌城的发展。至于在硬件方面的改革,主要是对博彩场所的各种设施进行更新改造,在博彩业上引进新技术新设备。现在澳门赌场,香港客人特别是年青客人有日趋减少之势,这是与澳门财业场所设施陈旧,技术落后,花式品种单调有很大关系。至于旅游业则缺乏长远规划;大型现代化景点设置不足;欠缺有特色的主题公园;培养高级旅游业人材滞后,市民旅游意识淡薄,需要认真培养与提高等等与现代化国际化旅游城市相去甚远,亟需改革。

在振兴澳门旅游博彩业的具体策略中,有三条是值得思考的:

(1) 重新确定目标市场,有针对性加大宣传力度,合理利用旅游基金资源,为澳门旅游业创造最大的客源。

根据目前客源情况,澳门旅游市场仍应依香港、台湾、内地、西方国家、日本及东南亚的次序争取客源。针对不同市场,采取不同的宣传策略,对香港、台湾市场、突出东、西方文化,以吸引文化层次较高的游客,并希望能利用这两地来回澳门时间较短的特点,开展短期度假旅游;对内地游客应突出主权回归为主题以及澳门西方风情与文化;对西方国家市场突出东方文化的神秘,西方宗教在澳门的传奇。在澳门政府的旅游基金的使用上,首先要压缩对外办事处机构,让旅行社去市场上竞争。其次加大对目标市场的媒体宣传力度,并建立起推广——反馈的调查系统,使推广部门可相对调整推广策略,亦可以把现在的推广活动由政府行为改变为半官方行为。

(2) 开发澳门具有中西方文化特点的景点,改变只重保护、不注重经济开发的现象。

澳门400多年历史留下了许多具有历史价值的文化遗产,如欧式建筑群、哥特式教堂、中国寺庙以及传统华南民居,但这些景点分散,不成系统,大都只可以在外观上游览,无法深入参观了解,而无论是政府还是旅行社从参观游览中获得的收益甚少,因此建议:①开发欧式风景一条街,可选择在荷兰园地段较为集中的欧式建筑群中进行一次统一

的规划、欧洲文化广场等具有鲜明欧洲风情的项目,并通过这些项目的经营获得收益,使游客来到此街可完全感受欧洲的风情。这特别能加大对内地游客的吸引力,使他们能产生到澳门如到了欧洲一样的感受。②开发建设中国风情一条街,可考虑在大三巴附近中国传统街道建设,同样可设置澳门优质产品购物街,让澳门商家在此处设点经销推广,还可以搞中国食品广场等项目。③设立迷你星星公园度假区。对现在的住宅博物馆的七幢葡式别墅进行翻新,使其从内到外更具葡式风格,并且适当加以扩充,使其成为葡式高级别墅式酒店。可吸引相当的客户。④发展黑沙湾已有威斯汀高级酒店。但黑沙湾是一个普罗大众的海边泳区,海边有较多的空置楼宇,可考虑把这些楼宇变成度假公寓,以适应多层次的游客需要。

(3) 加强粤港澳旅游合作,促进三地旅游业的整体繁荣。

粤港澳三地地域紧密相连,地区风情各异,随着三地间基础设施的日益完善,为三地共同发展旅游业提供了基础。对澳门而言,澳门地域范围较小,但有发展多元化旅游的基础。建立三地合作,建立起粤港澳旅游体系,若澳门纳入这个体系中具有中西文化特色的一个部分,不仅对澳门旅游业发展有促进,而且对三地旅游增加新的内容。

首先为发展三地共同旅游体系,应尽早成立一个由三地半官方组织成的旅游协调小组。这个协调小组的职能应该是:其一,摸清三地的旅游资源,充分发挥三地资源的互补作用,并对三地旅游资源进行一个统一,调整设资策略,避免资金浪费,做到三地旅游各具特色并构成一个完整体系。从澳门拟建项目的计划来看,海洋公园形成资源的浪费。其次,对三地旅游之间的手续问题进行协调以达到三地之间过境的快速方便。粤港澳三地旅游联线“引导旅行社组织与推广,如仿效新、马、泰游,建立粤澳二地游及珠澳游,建立粤港澳大三角旅游热线,并使这条旅游热线在世界旅游中顺有一定地位。

在景点建设方面,有学者提出的在珠澳边境建设一个大型跨境旅游景点或主题公园,是一个小澳门的缩影,同时,把有特色购物、餐饮结合在一起。随着珠港澳大桥的建设以及和内地铁路、公路的衔接,可考虑在路环—横琴之间建设这样一个大型景点或主题公园。并把这个主题公园纳入粤港澳旅游体系中去。

【责任编辑:许锡挥】

# 澳门旅游博彩业的发展方向

黎熙元

旅游业在国际上被称为朝阳工业，澳门在其今后的发展策略中也把旅游业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但澳门的旅游业具有结构特殊性，以博彩业为主，其收入占旅游业总收入的七成以上；结构的不平衡以及博彩业本身存在的问题，越来越明显地影响到旅游业以至整体经济的发展。

许多文章对此作过探讨，其中大多数认为澳门旅游业的主要缺陷是：旅游业发展过于偏重博彩，而博彩业发展的桎梏是博彩专营权的延续；因此取消专营权成为各界争论的焦点。笔者认为，澳门旅游业发展的局限，是长期以来政府对旅游博彩业缺乏必要监管、缺乏长远发展规划的结果。由于长期以来，政府与旅游博彩业的关系是通过《幸运博彩专营批给合约》来体现和执行的，本文试从这一角度分析澳门旅游博彩业的发展。

自1961年起，葡国政府批准在澳门设立公开赌场，以专营权方式批给私人企业经营，旅游博彩业从此成为澳门合法的经济行业。1962年，澳门政府与专营公司（澳门旅游娱乐股份有限公司）签定第一份专营合约，按政府规定，专营合约每6年重签一次，合约条款根据以前所定的经营合约的条款作出调整。

60年代初，澳门经济陷于低谷，而博彩业是特殊行业，澳门政府期望通过以专营方式发展博彩业，带动其它行业发展；在六七十年代，这种发展方式对澳门、尤其是基础设施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推动作用。但如同其它垄断发展方式一样，专营有

其不可避免的弊病，随着澳门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而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博彩专营的废存问题也成为有关人士热烈讲座的问题。1999年12月澳门回归祖国，考虑各种因素，澳门政府决定把专营合约延续至2001年，之后再作检讨。

根据澳门政府与专营公司在1997年签定的幸运博彩专营批给合约”，其内容可分为五个部分：（一）税收，包括：承批人须向政府支付签约金13亿7千5百万元，须按合同规定上的日期支付；按收入营业额交纳税率为31.8%的博彩特别税；但无论博彩经营收益如何变化，每年向政府支付的博彩特别税额不得少于11亿港元；（二）承批人须承担基本建设项目，包括：确保港澳之间的海路交通，每周最少开通客轮20班、水翼船84班，免费满足政府所要求的因公务而来往港澳之间的载客要求，全部船只的维修必须在政府船坞进行；与政府共同承担建设新港澳码头的费用，上限为澳元1亿；承担新氹仔计划的建设和开发。（三）公共服务，包括：疏浚指定的航道及其它海上工作；完成新口岸新填海区的都市化及卫生整治工作；按与政府协定的年度计划，赞助在澳门举行具国际水平或具葡国色彩的综合性表演节目；与承担对外宣传澳门、以及“澳门经济及旅游信息局”驻外办事处的运作费用；分担购置一艘观光用的中国帆船的费用（一百万澳元）。（四）福利与文化活动的，在指定地域上建设1500一定数量的经济房屋单位；一次性给予社会保障基金5000万澳元；分担澳门文化中

心的建设费用不少于4亿港元;拨款(相当于每年毛收入1.6%)资助从事学术研究活动的东方基金会;另一次性拨款1.8%亿港元。(五)监管,政府指定专门机构或人员监督基本建设的施工或博彩经营情况。(六)豁免,豁免专营公司的其它税项以及设备和财货的进口间接税。

在一般市场经济体系中,政府的行为范围主要是公共服务、基础建设、文化教育和社会福利;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是,政府通过一系列明确的法规、投资和收税政策来规范企业行为,引导投资方向,并征收相应的税赋。与其它行业一样,博彩业在澳门是一个合法经营的行业,由于它具有比较特殊的行业性质,在60年代初澳门比较特殊的社会经济环境下开始发展的,因此它也具有与其他行业不同的特点,它是政府特许由一家公司专门经营的,作为代价,政府要求专营公司负担一些公共建设的责任。从上述一般与特殊两个方面看,澳门政府与专营公司签定合约的方式发展博彩业,具有以下优点;(1)管理方便。合约的条款当中,利益分配只涉及政府和专营公司两部分,只要专营公司完成合约规定上的特别责任,其他一般行业企业需要承担的责任(例如关税等)就可以获得豁免。可见合约条款是从政府官员方便管理、并按其意图进行资源调配来制订的,执行起来也比较简单。(2)保证政府收入。合同规定专业公司除必须缴付13.75亿港元的溢价金(即承租租金)外,还需要每年缴付不少于某一金额(11亿)的博彩税,不管当年经营状况如何。这样,无论其它行业经营或整体经济环境好坏,政府都能够确保一定额度的收入,近年澳门整体经济不景,来自博彩业的收入在年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已近5成,可见其重要性。(3)政府负担轻。一般来说,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是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而澳门政府把其中的相当部分作为合约条款转移给专营公司承担,这样不但开支减少,而且投资风险和管理成本也减轻。

但是,这种发展方式也存在一些比较明显的缺陷:

(1)政府与企业的角色或职能混淆。一般来

说,在市场体系中政府与企业的角色及关系是裁判员和运动员,在专营的情况下,政府裁判员的角色及职能已经不完全;而澳门政府还要将部分的政府职能转由专营公司承担,在自身负担减轻的同时,监督管理的权力也相应失去了。

(2)造成专营公司在多个行业的垄断。由于专营公司承担了多项基建和公共服务项目,作为回报,政府给予专营公司这些项目的优先经营权。例如新港澳码头和新渔仔计划,专营公司拥有其上盖物业的优先承租权,并可以转租他人。经过30多年的积累,澳门娱乐有限公司拥有澳门许多黄金地段的地产经营权,成为大地产商之一。又如港澳海上客运由娱乐公司建设和经营,许多旅行社反映它们所组织的旅游团在使用这些设施时需付出比娱乐公司所组织的旅游团更高的票价;而客运设施的不足,炒船、车票的现象一度猖獗;而娱乐公司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对旅游项目的设计、或旅游设施的建设,都围绕赌博来进行,形成不平等竞争,压抑其他旅游业发展。根据合约,专营公司属下的分公司也可以利用关税豁免条款降低其在相关行业经营的成本。

(3)造成利益分配不平衡。由于专营公司即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在多个行业有发展优势,因此在项目公开竞投时、尤其是博彩项目的竞投时,其它公司很难与娱乐公司竞争,因此博彩业便形成一家独占。博彩专营者所承担的责任都具刚性,基本上都不能够随经营收入的变化而改变的或中止。为了保证收入,赌场必须运用各种办法来保证客源。特别是80年代后,亚洲区的赌场、或赌船增多,竞争加剧,澳门的赌场为了转移风险,刺激下属积极扩大客源,分厅承包经营逐渐演变成为一种促销方式,以“回佣”的方法计算报酬,俗称“叠码”制。(见注)“回佣”制度也是一种特殊的利益分配制度,早年亚洲区的合法赌场很少,博彩是利润丰厚而且稳定,厅主都是与娱乐公司所有者有特殊交情的人。“叠码”制度形成以后,更多的利益集团加入这种利益分配中,当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黑社会组织的渗入。黑社会组织从事高利贷活动,刺激

赌客投入更多金钱,有助赌场收入的增加;但同时“叠码”的回佣有一部分也因此落入黑社会组织手中,这种衍生的边缘利益近来成为黑社会追逐的对象,引发社会治安问题。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为“叠码”式回佣制度的泛滥。

(4) 监察不足,管理不善,打击不力。在专营合约的制约下,博彩业的发展尤其是赌场内部运作属于娱乐公司的内政,政府也可以以此为理由长期以来不重视有关监察和规范的立法。博彩监察暨协调司长万雪龙就指出,现在监察司对赌场的监察仍然沿用1961年制订的有关法例,不能有效监察90年代赌场的动作方式,而且在赌场发生罪案时也无权召唤司法警察到场。后来司法警察派出人员进驻赌场,同样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使有关岗位设置更为重复和权责不清。目前赌场内有三种隶属关系不同的监察与维持治安队伍,一种是博彩监察暨协调司派出监察赌场收入的人员,称为稽查,稽查同进有权决定报请法院宣布谁人为不受欢迎之人,不得进入赌场。第二种是司法警察,负责处理赌场内发生的刑事案件,逮捕犯罪分子。第三种是赌场本身所雇佣、以维持秩序的人员,称为纠察,而治安警察则只能负责赌场以外范围的治安。这种设置大大限制了对赌场非法活动和衍生罪案的处理和侦查的效率,使黑社会有空可钻。

执法方面也存在积弊,刑事侦辑与维持治安分属司法警察和治安警察负责,存在互相协调问题,警队内贪污严重士气低落等等。监察制度也不完善,合约当中的监察条款非常简单,不能适应复杂的结构;同时,极少的参与者和没有透明度的运作极易造成官员贪污、赌场利益转移和黑社会渗透等问题。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无论未来博彩专营权的延续与否,更为迫切的工作,是全面检讨原有制度中政府与博彩经营者的角色与关系,建立规范的、有效的、具透明度的监察管理制度,否则,即使开放专营权,引入竞争机制,其结果只是在某种工程度上进行利益在各相关集团中重新分配,而不能从根本上理顺各种关系,引导旅游博彩业健康发展,

反而可能引起更多的问题。为此,笔者提出几点对策建议:

### 1、调整专营合约条款,重新确定政府、专营公司对澳门建设发展所负有的责任与权利。

城市的基本建设这种本应由澳门政府承担的责任,一直以来由娱乐公司承担,有意无意之中,许多具有悠久历史及丰富文化意蕴的遗迹被浪费或破坏,新的旅游点和基础设施得不到建设。而获得专营权的旅游娱乐公司则必须进行多个不同方面的投资经营管理,既不利于自身向专业化发展,及是更新博彩设施和提高行业素质;也容易造成它在其他行业的垄断。针对这种状况,澳门政府或未来特区政府应该考虑调整或改变专营合约的条款。

首先,重新确定政府与专营公司之间的责任与利益关系。现行合约当中,娱乐公司需要承担基本建设、旅游业推广以及福利性市政建设,政府把这些应负的责任推给经营性公司进行,虽然财政负担减轻,但却无法控制这些工程的进度和质量,对建成后的经营也无法监管,例如疏浚河道,行内人士反映娱乐公司所派出的工程船并不认真施工,敷衍了事;又如港澳之间的海上交通,娱乐公司以垄断形式经营,早几年由于班次不足,出现大量“黄牛党”炒票现象,特别是在假日及赛车日,船票价格被从75—100元被炒高至400—500元,这样由合约建设产生的垄断经营后果,对其他旅游行业的发展非常不利,而且也为黑社会活动提供了大量空间。因此,合约当中那些属于公共建设性质的项目,应改变为由政府负责建设和经营,娱乐公司及其顾客在使用这些设施时,要付出同样的费用,使博彩业与其它旅游业在成本方面的负担能够较为公平;对吸引更多外来游客创造有利条件。福利性市政建设和旅游业推广也应由政府负责具体工作,娱乐公司的责任可以转化为税收形式履行。

其次,在加强对博彩业营业状况的监管的前提下,可以考虑减少合约中的专项财政负担相应增加定额付款和赋税,或者彻底变专项负担为赋税,从

经济原理来看,这种特别的设置是没有太多理由的,殖民政府从行政或资产转移处理方面的考虑可能更多。

## 2、加强立法监察,打击黑社会活动。

博彩业的特殊性在于,它与非法活动和有组织犯罪的关系非常密切,若不加强立法和执法,它必将成为罪恶的温床。美国各州对规范博彩业发展的立法工作就非常重视,设有专门部门监察赌场活动,由州长委任5人委员会负责,这些委员不能与赌场有任何关系,也不能是联邦或州政府的官员,委员会发现问题,就场的运作方式,执法部门不能入场维持秩序等;同时,极少的参与者和没有透明度的运作极易造成官员贪污、赌场利益转移和黑社会渗透等问题。因此澳门政府今后应加强对博彩业经营及相关活动的立法监管工作,同时逐步建立一个独立、公正、具工作透明度的监察架构,引导博彩业向健康方向发展。政府可以参考国际上的博彩法,以及美国各州填补法律漏洞,管制与博彩相关的非法活动的做法。例如,委任独立监察委员会,赌场由政府纪律部队维持秩序,赌场内禁止伙计拉客、引诱赌客借高利贷、卖淫等行为,保证把犯罪活动驱逐出赌城范围以外。大力加强对有组织犯罪的打击,肃清黑社会在纪律部队和政府管理层的渗透,才能有效地阻遏黑社会的成长,改善澳门的治安。

## 3、发展大旅游业,扶持非博彩旅游的发展。

澳门政府应该扶持非博彩旅游的成长,发展大旅游业;而不是任由旅游业畸形发展,只局限于博彩项目。美国拉斯维加斯的发展方式值得借鉴。除博彩外,拉斯维加还建有生动的博物馆、游乐场适应青少年消费,大型购物中心适应主妇消费,以及许多其他、文化、康乐、体育运动甚至举办展览、

会议的设施,形成适应不同年龄、不同品味、不同消费水平的立体旅游业,现在,拉斯维加斯的非博彩收益已占其旅游总收益的6成以上,而澳门,博彩业收益占旅游总收益的8成。澳门有丰富的文化历史旅游资源、有自由港优势、回归之后又实行“一国两制”,有充分的条件发展大旅游业。而大旅游业的发展,也能为赌场带来更多的客源。而且,当资源有更多的增值机会、居民有更多的就业机会时,过度集中于对赌场利益的争夺而导致社会治安问题、过于依赖赌场谋生而导致社会意识和道德堕落的问题都将逐步得以扭转。

### 注:

在赌场内,最基本的纵向利益关系是由本地人称为“叠码”的制度来维系的,其实质是一种类似层压推销自上而下、自大而小层层承包的、风险与利益相连的分销制度。

赌场划分为许多个赌厅,其日常经营是通过这些赌厅来进行的。赌厅分别由不同的经营者管理,称为“厅主”,厅主以大赌客的身份向博彩专营机构(娱乐公司)承包每年兑换一定额度的泥码(不可兑换现金的筹码),专营机构给予厅主促销回佣。由此构成了“叠码”制度的第一层次。厅主再以相同的方式转包给帮助拉来客人的中介人(称为“叠码仔”);码仔再转包给下一层帮助拉客的中介人(称为“艇仔”),娱乐公司给予厅主的回佣,据报每月约四亿元(《华侨报》1998.5.26),循此一层层分配给各层次的承包分销者。利益结构的最后一个层次是赌客,他们不在赌场柜台兑换筹码,而是通过“叠码仔”,可以用较少的现金兑换较多的筹码。

【责任编辑:周运源】

# 粤澳工业合作探讨

陈丽君

## 一、粤澳工业面临严峻挑战

广东工业经历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工业总产值从1978年的199.65亿元,猛增至1995年的9330亿元。年均递增21.9%,其中85-88年,年均递增27.6%,88年更高达35%。在全国居于首位或领先地位。但97年开始,工业生产增速下滑,97年广东工业总产值只有7532亿元,已低于江苏省,98、99年继续下滑。广东工业之所以开始走下坡路,其中的原因除了广东不再享受特殊优惠政策外,就是广东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产业和产品结构层次低。1997年珠江三角洲地区劳动生产率与人均工资比已由1980年的1:0.22上升为1:0.41。如服装生产行业,广东服装价格要比东南亚国家高出二至三成。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使产品在国际国内市场竞争力大大削弱,产品出口明显下降,以服装出口来看,广东99年1-4月服装出口比98年同期已下降52.5%。广东产业和产品结构仍以耗料型、粗加工、低加工和劳动密集型为主,高新技术比重仅占工业总产值10%左右。在当今世界经济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发达国家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0%以上,广东只有30%水平。

澳门经济从93年起大幅度下滑。92年本地生产总值实质增幅还高达13.3%,之后93、94、95和96年分别为5.2%、4.6%、3.8%和-0.3%,97年也仅为0.8%,98年估计为-3.5%以上。工业(或制造业)是下滑最快最惨重的产业之一。澳门工业是澳门传统产业,早于16、17世纪澳门已有日用品及食品工业,本世纪五、六十年代澳门的纺织业已发展起来,成为最主要的工业行业。七、八十年代由于香港厂商的大量进入,使澳门纺织制衣、玩具、人造花、电子等业迅速发展壮大,工业成为澳门经济最大产业,其在澳门本地生产总值中

的比重于84年时达到35.9%。但80年代后期开始逐渐走下坡路,87年工业在澳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降为29%,到89年降为21.4%。90年代,随着澳门整体经济衰退,工业的下滑也更为迅速,到96年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跌至8.3%,已失去主导产业的地位。

澳门制造业大幅下滑主要原因也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及产品结构层次低。1985年-1987年澳门制造业劳工工资升幅分别为9.04%、9.98%和7.01%。90年代后,澳门劳动力成本进一步上升。劳动力成本上升不仅使香港厂商将在澳门的投资转向广东珠三角地区,且澳门本地资本厂商也大量迁移珠三角,到90年代澳门仅存1000多家小型工厂,且大部分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成衣和针织品生产厂家占了70%。这些厂家现主要是靠配额维持生存。但2005年全部纺织品配额将取消,届时,澳门工业原有优势将基本消失殆尽。澳门工业面临的形势比广东更为严峻。

很明显,粤澳两地工业均面临巨大压力和挑战,此种情况下,相互毗邻的粤澳很有必要加强工业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促进双方工业早日重上台阶。

## 二、目前粤澳工业优劣势互补分析

粤澳工业方面原有互补性优势多已丧失,或即将丧失,但粤澳两地工业方面新优势已逐渐形成,互补性仍然明显。

一是广东生产要素资源丰富、工业已形成一定基础和规模及内需市场广大,正好弥补了澳门这方面的劣势。

澳门人口少且素质偏低,更缺乏科技人才和科研机构。澳门总人口40多万,3岁以上常住人口



中,小学以下学历人口占总人口 66%,而且有大中专或大专的仅占 4.4%,广东人口达 7000 多万,人口素质日益提高。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口就达 14 万多。科研单位众多,在农林、海洋、医药、物理、化学等方面,有较好的研究基础。广东还有 45 所高校,800 多家科技开发机构,且多数集中在珠三角地区。

澳门本地市场狭小,产品基本依赖海外市场,因此增加了市场的不稳定性。且市场狭小的限制使其难于进行产品批量生产,因而难以发展大工业。因此澳门工业基础薄弱,技术落后,缺乏名牌产品。广东不仅本省人口众多,且邻近省份人口众多,经济相对落后。广东正是利用了国内市场广大及中央给予的特殊政策,使广东产品占领了国内广大市场。不仅如此,广东产品在海外市场也占有份额。广东产品销售在省内占 25.3%,省外占 43%,境外占 31.7%。其中六大产业更是产销两旺,电子通讯设备制造业已成为销售最大工业行业,97 年总产值占全省工业总值 11.9%,占全国电子工业总值三分之一。家电、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总产值 97 年占全省工业总值 6.4%,占全国同行五分之一,纺织制衣业占全省工业总值 13.1%。经过近二、三十年的发展,广东工业已成为三次产业中最大产业,工业门类齐全,并形成 800 多家名优企业。此外高新技术产值近年每年以 50% 速度增长,97 年达 1200 亿元,居全国首位。

二是澳门的政策、制度及广泛海外联系则正好弥补了广东这方面的劣势。

澳门实行低税率及自由经济政策。企业或个人所得税税率仅为 2%—15%,高科技产业则享受减免税,工业投资更减免市区房屋税、全部减免营业税、5 至 10 年所得税减半、物业转移税全免或减半。商品、资金、人员进出自由,货币自由兑换,且对进出口货物免征关税。广东企业和个人所得税税率远高于澳门,工业企业税率并没有优惠,且没有自由经济政策,资金、人员、商品均不能自由进出。

澳门是独立关税地区,已与世界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贸联系。其中与欧盟关系最为密切和特殊。欧盟给予澳门四项优惠政策,一是给予澳门 28 类纺织品配额,使带有配额出口到欧盟成员

国市场的纺织品免缴关税(此项优惠 2005 年后将取消),二是给予澳门出口欧盟成员国的产品特定数量上的免税或低税优惠。三是将澳门纳入了欧盟的国际投资伙伴计划内。凡于澳门成立的由欧盟企业和澳门企业联合经营的企业可通过该计划申请欧盟的津贴、优惠或无息贷款。四是在澳门开办了欧洲资讯中心,其可与欧洲 250 多个信息中心直接联网,可向各类企业提供有关欧洲的信息。澳门还与拉丁语系国家有着较密切的联系。澳门作为葡国管治了几百年的地区,由于葡语属拉丁语系的缘故,澳门与世界 80 多个同属拉丁语系的国家和地区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其中与葡语系国家和地区之间还建立了一定的经济协作关系。而广东不是独立关税地区,只是中国海关总署管辖下的一分支机构,且广东与世界经贸联系历史短且也不广泛。

### 三、加强粤澳工业合作对策

加强粤澳工业合作应在原有合作的基础上,根据现有互补优势选择双方合作模式。由于广东工业方面优势相对更多些,且主要是生产资源方面优势更多,因此合作模式仍宜选择在广东设工厂,即生产环节主要放在广东,澳门优势主要在对外联系方面,因此了解海外市场信息,海外市场策略研究,开发海外尤其是欧洲、拉丁语系国家市场以及原料和设备的进口及产品的出口应主要放在澳门。合作的层次上应当既包括低层次的劳动密集型工业,也应有高层次的科技工业,合作范围也应当是既包括珠三角地区,也包括粤北、粤东、粤西地区。具体合作建议如下:

(一) 澳门在广东投资的仍有市场潜力的劳动密集型工业行业(如制衣业及电子业)应当继续进行。可以通过多招外省或本省山区劳动力方式,以使劳动力成本尽可能降低,也可将工厂由珠三角地区迁至粤北、粤东或粤西地区。同时在市场方面,不仅要设法维持原有市场占有率,且应开拓新市场。澳门厂商应充分利用澳门的优势,积极拓展拉丁语系国家的产品市场,广东合作方则负责拓展国内市场。为使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还需不断提高产品质量,不断更新技术,提高生产率,降低成本,并要根据市场需要,不断改良产品和开发新产

品,从而促使双方的合作能长期继续下去。

(二) 无论广东在澳门还是澳门在广东的工业企业,只要是失去竞争力和市场发展潜力的劳动密集型的工业行业,均应利用先进技术、先进管理进行改造,提高产品附加值,使产品向高档次,高性能、高效率、多用途、低消耗转化。使之发展为具有中等技术水平的行业。根据广东与澳门目前的工业水平及其他条件,今后一段时期内粤澳工业合作应重点放在这个中等技术层次工业行业上。澳门商人在广东的投资宜选择在欧洲或拉丁语系国家有市场潜力在广东又有基础的中等技术工业行业。广东在澳门的投资也宜选择在海外有市场潜力的中等技术工业。

### (三) 应逐渐加强高新技术工业的合作

澳门应加强在广东尤其是珠三角地区科技产业的投资,广东不仅具有土地、人才、科技力量及内部需求市场方面优势,且广东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已建立起一定基础,已建立深圳、广州、中山、佛山、惠州、珠海六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江门、汕头、东莞三个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及珠三角高新技术产业带,认定高新技术企业 559 家,其中广州 265 家,深圳 135 家,珠海 39 家。广东科技产业对经济的贡献率为 30%,珠三角则达到 40% 左右。广东省委省政府 97 年颁发了《关于进一步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并出台《广东省技术创新工程》方案。显然广东尤其珠三角的科技产业前景看好,澳门厂商可以合资或合作形式参与。由于澳门具有自由港及与世界联系广泛的条件,因此科技产业的合作仍可以采用类似前店后厂的形式,在澳门设分公司,负责了解国际市场尤其是欧盟、拉丁语系国家信息,研究拓展海外市场对策,还可以通过分公司在澳门筹集资金。

广东也可到澳门进行少量科技产业的投资。澳门的低税率、与欧盟关系密切等方面的优势对于科技产业投资是有利的。由于澳门已建立起联生工业村,广东的高科技企业,尤其是大型科技企业,可以考虑在澳门联生工业村设分厂或分公司,以便于拓展欧洲及拉丁语系国家市场。

### (四) 今后澳门对广东的投资在珠三角应以中

高级技术工业为主,在其他地区则侧重于劳动密集型工业。粤北、粤东、粤西地区仍保持着土地及劳动力低廉优势,且交通、通讯、能源也已大大改善,因此澳门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可以向这些地区转移。

(五) 广东国营、集体和私营工业企业均应充分利用澳门与海外联系的中介作用。为了充分发挥和利用澳门的优势,广东尤其是珠三角地区的工业企业应当在澳门设市场开发部,以便于了解欧盟及拉丁语系国家市场信息并拓展这些国家的市场,且应利用澳门的自由港条件及港口条件的改善,引进海外技术设备及出口产品。

(六) 澳门工业企业也应利用广东的优势条件,如引进广东的人才与技术,改造澳门劳动密集型工业,提高产品附加值。澳门厂商还可考虑拓展广东及广东邻近省份的产品市场,以使澳门通过扩大市场而扩大规模。澳门也可以利用本身具有的自由经济政策等条件,积极与广东科研机构合作,如可以买下他们的科技成果,在澳门投入生产,并请广东科研机构任技术指导。

粤澳工业合作要取得突破性进展,关键性的因素,一是将民间合作上升为官方合作。澳门即将回归祖国,将为官方合作提供有利条件。届时双方政府负责工业事务部门官员应加强沟通与联络。双方政府部门要为企业界的合作提供更好的条件和服务,甚至于为双方企业合作牵线搭桥,并为合作工业企业技术改造与升级提供必要的协助与支持。二是要加强宣传力度,为双方工业合作造声势。澳门官方、企业界要多在广东宣传澳门税率、自由港、与世界广泛联系之优势,广东官方、企业界也应在澳门大力宣传广东之优势。两地的厂商联合会、同业商会应多开展联谊等活动,方便双方企业界交流,增进彼此的认识与了解。

只要粤澳官方与企业界共同努力,粤澳工业合作定能上一新台阶,从而必将对推动两地工业克服面临的困难产生积极作用,且可以带动粤澳贸易、金融、房地产等方面合作的扩大与加强。

【责任编辑:周运源】

# 澳门现代教育的发展

王季云 吴福光

澳门开埠几百年间,经济落后,澳葡政府长期以来没有统一的教育政策、教育目标,几乎放弃了对教育的领导,仅办几所专收葡裔和公务员子女的公立学校,造成澳门的教育发展缓慢、涣散、落后,呈无政府状态,一直没有形成一个本地化的教育制度。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也使澳门的教育实践走向自给自足和多元化,教会、民间和个人能够充分发挥自主性,实践各自的教育理念,兼收并蓄。

70年代以后,澳门经济快速发展,急需各类人才,有力地促进了教育的发展。1987年4月30日中葡签署《联合声明》,澳门进入回归前的过渡时期,培养“治澳人才”迫在眉睫,必须改革现状,把发展教育作为战略环节。1989年,政府任命“教育改革技术委员会”开始对澳门教育进行反省,致力澳门教育纲要法出台,并召开“澳门教育改革研讨会”,就教育制度、学校管理、普及教育、教师技能等专题作了深入的探讨,被誉为“澳门历史上第一次由本澳教育界人士广泛参与的大型教育研讨会”,“对于加速澳门教育改革的步伐,提高教育素质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1991年至1998年间,澳门出台了有关澳门教育制度、课程计划及教师培训的法例,共16部,其中,1991年8月26日《澳门教育制度纲要法》作为政府教育制度和政策的指引性文件,开创澳门教育的新历史。该部法律提倡以葡语或华语作为教学语言,逐渐实行免费基础教育,学校可自由制定部分教学计划,校长以专职制度担任制等。1995年6月26日,澳督韦奇立颁布《教育和倾向免费教育》法令,从1995年9月开始,把只局限于葡人葡语的免费教育普及到全体居民(包括特临时逗留证者),迈出倾向性的第一步,推行小学预备年级及小学6年共7年的免费教育。澳门华人在葡人

管治澳门146年后,才获得倾向平等的第一步,因此,人们比喻它是迟来的春天,在澳门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目前,从经费来源和监管来看,澳门学校有三类:(1)官立学校,全部由政府拨款开办,执行官方的教学计划及教育程序;(2)官制学校,由实体开办,接受政府一部分财政支持,并执行官立学校的教学计划及教育程序;(3)私立学校,由社会团体或私人开办,自筹经费,自负盈亏,各自定教学计划,政府不予干预。至1995年8月,官校有22所,私立学校有151所。

澳门中小学教育存在三个体系,四种学制:中文体系、葡文体系和英文体系;中国学制、中葡学制(其中,中葡学制是澳葡政府开设的官校给中国学生就读的,强迫学生学葡文而不学英文。这种学校将随着澳门的回归而消失)、港英学制、葡国学制。不同的学制时间安排各有不同,中学有5年和6年不同长度,从课程设置到教学大纲、教科书都极大地依赖于外界——中国内地、香港、葡萄牙。不同的学校教学对象和教学语言也不相同,如中文体系学校,均为私立,收华人子弟,用华语教学;英文体系也均为私立学校,以华人子弟为主,用英语教学;葡文体系学校,均为官立,收葡籍儿童,用葡语教学。

上述多元化的教育体系,一个消极后果是各校毕业生知识水平悬殊,转校困难。众多私校经费拮据,校舍、设备、师资短缺,合格教师少,教师负担重,严重妨碍教育的发展。而且,由于长期以来澳葡政府只承认葡文为唯一的官方语言,因此,没有学习葡文的华人就不可能在政府部门供职,难以公平竞争,带有明显的殖民主义色彩。这种情形到1992年2月葡萄牙共和国立法确认中文的官方语

育地位,才有所改变。

## 各级教育状况:

### 1. 学前教育

目前,澳门有学前教育机构 104 所,入读幼儿有 80812 人,其中,幼稚园 65 所,幼儿有 20814 人。1996 适龄幼儿学前教育接受率为 78.7%,年龄组在学率为 98.7%,平均班额 1996 年为 42.1 人,师生比为 1:26,师资格格率为 86.7%。进入 90 年代后,政府重视幼师培训,1991 年澳门颁布官立中文幼稚园合格师资资格的法令,1997 年颁布培训幼稚园教师的法律制度。目前,澳门大学教育学院分别开办职前和职后学前教育文凭和教育科学等专科学位课程。

### 2. 小学教育

目前,澳门有 71 所小学,1996 年度在校生有 47279 人,教师 1578 人,适龄儿童在学率 83.4%,年龄组在学率 95%,表明 6-11 岁的儿童几乎全部在不同的教育机构接受教育,而入小学的比例却比较低。

1996 年教师学历合格率为 81.9%,每班平均人数 47.5 人,师生比例 1:30,教师每周授课时数为 20.8。1998 年政府向所有小学生发放一年 500 元学费补助,相当于平均学费的四成,作为推行免费教育的第一步。

### 3. 中学教育

目前,澳门有中学 33 所,1996 年度有学生 25237 人,教师 1262 人,适龄少年入读中学率为 61.7%,年龄组在学率为 94%,可见,澳门人接受中学教育仅过半,中学教育的筛选率很高,离普及中学教育还有一大段距离。

1996 年中学教师合格率为 89.5%,每班平均人数 41 人,师生比为 1:20,每周有 19.1 节课,教师合格率比 5 年前有较大提高,但教师的工作压力仍然较大。

### 4. 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

由于澳门居民受教育程度较低,80 年代初 800 多名公务员有近 1/3 是小学程度,为了适应澳门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提高劳动者和公务员的素质,

从 80 年代开始,成人教育发展迅速。1983 年政府经济司设立职业培训中心,开设多种课程,参训青年必需年满 15 岁,学历不低于初中三年级。此外,澳门教区、慈善机构、私企、经济文化组织也积极开办各种培训机构,培训实用人才。澳门成人教育于 1982 年-1984 年进入高潮,学员人数急升,近年来趋于稳定,每年大约有 300 名学员,早期以低学历者和新移民居多,现在,许多生活稳定、有较高学历的人士也积极参与,课程水平也随之提高。至 1991 年,全澳共有 98 所成人学校,在校生 38399 人,为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也推动澳门教育走向多元化。但政府对成教的投入很不够,成教机构基本没有资助,教师没有津贴,影响了教学质量。

### 5. 高等教育

长期以来,澳门高等教育十分落后,本地中学毕业生只有到外国或外地求学,学成后不愿回来,造成人才流失。

1981 年 3 月由市政府当局与私人财团合办的东亚大学正式成立,翻开了澳门高教史上的新一页。开办时设有本科学院、公开学院、预科学院和进修学院。1984 年开办研究院,进修学院在 1985 年发展成理工学院。东亚大学用英语授课,60% 的学生来自香港,从学制到课程设置完全不适合澳门的需要,因此人们评论它不是一所澳门的大学。1988 年 2 月,东亚大学公开学院成立,统一办理原公开学院和研究院课程。为了推动大学的发展,东亚大学由澳门基金会具体负责,在保持国际大学的特色、招收海外学生同时,东亚大学开始了解澳门的需求,把澳门在过渡期的利益放在首位,按澳门需要设立有关课程,1991 年更名为澳门大学。

目前,澳门有 4 所高等院校,即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学院(1992 年成立)、澳门国际公开大学(1992 年成立)、澳门高等警官学校(1989 年成立),其中 3 所是公立 1 所是私立,在校生 6857 人。澳门的高等教育改革适应了过渡时期的需要,有利于实现“澳人治澳”。

【责任编辑:许锡挥】

# 澳门文学的发展

栖 媛

对澳门文学可分成两类作一分析。

## 一、澳门华人文学

澳门作者黄晓峰在其《澳门世纪末的文学幻想》中这样评论澳门文学：“澳门这个地方太小了，如果把‘澳门文学’随便拿去跟‘香港文学’、‘台湾文学’、‘海外华人文学’比较，那非得弄出天大笑柄不可。然而，澳门人也不该妄自菲薄，因为澳门这个‘小地方大文化’的独特景观是有希望产生感人肺腑震撼人心的警世作品的，‘澳门文学’或者准确地说，‘20世纪末的澳门文学’，除了‘澳门华人文学’以外，还理应包括‘澳门土生葡人创作’的重要部分。”（《文化》第23期）

以上评述较为明确地指出了澳门文学的特点及其构成。澳门的华人文学的发展始于50年代，由爱国人士支持的《新园地》非常重视刊登文学作品，是澳门本土的第一块文学园地。此外还有后来易名为《学联报》的《澳门学生》。1958年《澳门日报》创办，由《新园地》的原班人马主办其文学副刊，并保留“新园地”的名称。到70年代，澳门本地的文学作者逐渐增多。由于港澳两地相邻，有不少作家来往于两地写作，例如阮朗；也有不少澳门的作者投稿于香港的报刊，所以许多澳门作者写的文学作品，本地人反而读不到。1994年才由作家凌钝铨编为《澳门离岸文学拾遗》出版，收录有新诗、诗评、散文和小说。

鲁茂和周桐是澳门本地的著名作家。鲁茂擅长写长篇连载小说，从1968年至1996年前期，共写了20多部小说，作家陶里评论其作品的风格是：“命题立意严肃，但为了迎合小市民读者的兴趣，

它采用通俗、流行的风格，没有纯艺术的气息。”然而，具有明确的道德倾向。（见“澳门小说发展概略”载于《澳门短篇小说选》澳门基金会1996年出版）周桐也以长篇小说见长，从70-90年代，她写了13部长篇连载小说，陶里在同一篇文章中评论其小说风格是人物形象鲜明，视野较开阔。其他在澳门较有重要的作家还有陶里，林中英、梁荔玲、梯亚、梁淑琪、剑莹等。新诗方面，较突出的作者有韩牧、汪浩瀚等。

## 二、土生葡人文学

澳门作者汪春在《论澳门土生文学及其文化价值》（载于《文化》第23期）中地土生葡人文学作出这样的评述：

澳门土生葡人是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个特殊族群，有必要和有条件为土生文学建立独立的文学形象。依据是：（1）“土生葡人”Macaense/Os Filhos da Terra这一称谓的葡文和中文译文，与Portugues这一名称的葡文中文在形式和内涵上显然都不相同，Macaense由Macau一词加后缀转化而来，直译应该是“澳门人”。Os Filhos da Terra的中文对等词为“本地人”，可见，两词的含义均为“澳门人”，但显然不同于澳门的“中国人”，因此，土生人写的文学作品也只能称为“土生文学”。（2）从人类生物学的角度看，土生人为一遗传本底十分丰富的欧亚人群体；从文化角度看，作为不同文化交流的典范，土生族群保持着东西合璧或完全别具一格的文化模式。从这群体中产生的作品，尽管使用的是葡语，但表现出来的思想感情、思维方式、心态特征、价值取向、审美情趣都带着他们的特殊

身份、特殊生存环境和历史文化背景的影响,表现出与本地华人或大西洋彼岸的葡国人明显不同的特点,是独具一格的作家群。(3)土生文学作品虽然数量不多,但却历史悠久,姿色独具。自19世纪末土生葡人诗人A.J.Ruas、Jose Baptista de Miranda Lima所作“土生歌谣”,至今已有一百多年。土生文学作品的题材、语言、创作风格,都有无可取代的鲜明个性,强烈地显示着他们土生人的典型身份特点。

土生人生活在两种文化的边缘,两种文化的渗透/交融、矛盾冲突在他们的生活中和精神上都形成了深刻的影响,他们往往以两种文化视角交替审视世界,观察人生,因此他们的感觉是独特的。

### 1. 土生文学题材的文化魅力

在《施舍》的故事里,可以看到东西两种文化的碰撞:私生子的父亲吃饭时用刀叉,母亲则用筷子,生病时父亲主张看西医,母亲主张看中医。也有两种文化的互相影响:儿子从父母双方毫不费力地学会了葡语和粤语。故事中的这些细节,展示了“土生人”的特殊生存环境。《承诺》写一个中国姑娘与一个葡国青年建筑师相爱,因遭到姑娘家庭的反对,最终扼杀了这段美丽的爱情,姑娘为此付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在这个故事里,中葡青年的相爱,正表现了两种文化在相遇后彼此吸引,互相认同,而姑娘的死可以说是两种文化的差异和冲突导致不幸的结果。因此整个故事成为中西文化互为吸引又互相冲突的生动例证。

### 2. 反映复杂的社会背景和多层次的生活状况

从葡中联姻反映出两个民族之间的冲突和认同的矛盾关系。《承诺》的女主人公的家庭是澳门社会中维护传统的中国文化的名门世家,他们视一切外国人为外夷,所以当女儿爱上葡国青年时,悲剧因素就产生了。这段爱情的失败,反映了早期葡人难以与一般中国女子正式通婚的历史事实。葡国学者安娜赫顿指出:“尽管目前葡中联姻十分普遍,但这种情况不是一开始就中规中矩。天朝王子们对我们不信任且不善待(因怕我们就此定居在中国南部,)起初禁止这样的婚姻,尽管后来认可了,但

从来没有鼓励过这样的婚姻。”(施白蒂(土生葡人——一个身份的问题《澳门研究》页129)《爱情与大脚趾》则通过混血儿土生主人公从葡人上流社会遭挫,众叛亲离而转入华人下层社会的经历描写,贯穿两个社会阶层,充分显示了澳门当时的社会风貌:殖民者优越的身份、华人低下的地位、土生世家的富有、社会风气的虚伪、葡人、土生人与中国人的商业关系等,都在作品中得到真实的反映。

土生文学还反映了对澳门未来的思考。1987年4月13日中葡签署联合声明,这对于长期以来因特殊身份而在澳门社会政治、经济占优势的土生一族,带来了强烈的震荡。诗人若瑟的许多诗篇便反映了土生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失落、困惑和迷茫。《未来》、《一个母亲有许多孩子》、《我们心中的澳门》等便成为这类作品的代表。

### 3. 对中国文化的亲和性

土生人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感情,不同于一般的西方局外人,许多土生人拜关公、吃中药,李安乐的《知道我是谁》一诗,云:“我的心是葡国的也是中国的、我的人格是中国的也是葡国的”“我发起脾气来就像个葡国人,但也能自我抑制,以中国人所有的平和”。

凝重的历史感,关于土生的起源,缺乏十分确凿的历史及人类生物学方面的资料,其起源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学者对其血统有不同的见解,因此土生人的作品便贯注着一种对自我历史的观照,无论他们从哪一个角度来表现生活、抒发感情,总可以看到他们透过不同的艺术思维,折射出心灵深处对“我是谁”的沉思。这种历史感也反映到他们和澳门这块土地的情绪上——对澳门的无比热爱和眷恋之情。

1999年葡国人管治澳门的历史结束,澳门历史地位的变化,使土生族群生命面临转折。土生人因其葡国血统和技能而在政治上、经济上、心理上优于华人,但是又因其具有华人血统而感到自卑,充满矛盾的文化心理。贾渊的作品《风中之竹》反映了这种对过去和未来的矛盾心态。

### 4. 中西文化互相渗透的艺术风貌

(下转第58页)



# 澳门与内地司法协助问题论析<sup>①</sup>

李启欣

《澳门基本法》第九十三条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可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司法机关通过协商依法进行司法方面的联系和相互提供协助。随着中国政府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和《澳门基本法》的实施,澳门特别行政区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司法机关进行司法协助的问题,便提上了议事日程。本文就澳门特别行政区与全国其他地区之间司法互助的内容、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途径作如下的论析。

## 一

澳门特别行政区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司法机关,其中一方应另一方的请求,代为或者协助履行与诉讼有关的一定的司法协助,便是澳门特别行政区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司法协助。这是双方司法机关之间相互进行的与诉讼有关的合作行为,包括民商事案件中的送达文书、调查取证、赃款赃物移交、抓捕移交罪犯、诉讼移管、被判刑人移管、承认与执行对方法院的刑事判决,等等,都属于双方的司法协助的范围。这些范围涉及到主要的法律部门和诉讼、诉讼的各个环节,涉及到与之相联系的法学理论和实践的问题。<sup>②</sup>

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后,由于贯彻“一国两制”的方针,保持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同时依据《澳门基本法》的规定,实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制度和政策。在司法方面,澳门特别行政区成为中国的一个单独的司法区域,和全国其他地区在司法上互不隶属,而是一种平等的互相联系和相互提供协助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应以什么为指导思想呢?应依据什么基本原则呢?

我们认为,澳门特别行政区与全国其他地区进行司法协助的指导思想,便是以“一国两制”方针为指导,以《澳门基本法》的各项规定为依据。<sup>③</sup>这个指导思想表现为以下的基本原则。

第一,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原则。《澳门基本法》第一条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这一规定,体现了维护我国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基本原则。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全国其他地区的司法协助,这是中国一国内部不同法域之间的司法协助,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内政问题、内部司法事务问题。在这两个法域之上有共同的国家主权和中央政府。这种司法协助与国际司法协助是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无论在程序上还是在实施条件上都各有不同的特点。因此,澳门特别行政区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司法协助,绝不能同国际司法协助混为一谈。例如适用于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全国其他地区的国际协议,不能直接成为双方之间进行司法协助的依据(但是,这并不排斥在例如两地民商事司法协助的某些方面参照有关国际协议和国际惯例)。澳门特别行政区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司法协助,其进行、实施必须依据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基本原则,维护国家根本利益,绝不能借口两地法律体系、法律传统与惯例、司法体制的不同,而损及这个基本原则。

第二,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高度自治的原则。根据“一国两制”的方针和《澳门基本法》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澳门特别行政区依照《澳门基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据此,澳

门特别行政区在法院组织、审判程序和司法行政事务等方面都有自己的、不同于全国其他地区的一套规定和办法,自成体系。澳门特别行政区是一个单独的司法区域,这是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高度自治的原则在司法方面的表现。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法院组织、审判程序和司法行政事务等方面是一个整体,而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是这个整体的部分,它们的法院组织、审判程序和司法行政事务都是统一规定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可以不分畛域互相为对方办理事务。也可以直接到对方地区去办理事务,而澳门特别行政区与全国其他地区是两个不同的司法区域,如前所述,它们在法院组织、审判程序和司法行政事务等方面彼此各异,互不相隶。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都不能直接到澳门特别行政区去履行司法行为,因为其司法权不能及于澳门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法院也不能直接到全国其他地区去履行司法行为,因为其司法权不能及于全国其他地区。双方必须相互尊重对方制度的自主权,不可以将本法域的法律规则强加给对方。因此,在解决跨法域的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时,就需要双方依法协商进行司法方面的联系和相互提供协助。

**第三,澳门特别行政区与全国其他地区司法协助的自愿协商与平等的原则。**根据“一国两制”的方针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原则,澳门特别行政区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司法协助只能也必然按照自愿协商的原则和方式进行。澳门特别行政区既然是在中央人民政府直属下享有高度自治权的特别行政区,当然可以在中央授权的范围内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司法机关进行协商,解决相互间的司法方面的联系和相互提供协助等问题。按照法理解释,《澳门基本法》第九十三条,从整个条款来说,是属于授权性规范。表明中央人民政府不仅同意并授权澳门特别行政区,而且也同意并授权全国其他地区的司法机关,可以双方直接协商,协商的结果,它们之间可以达成协议,规定彼此之间对司法方面的联系和相互提供司法协助的内容。既然是通

过协商的原则和方式来进行,便必然是以平等互利为出发点,达成平等互利的结局,这是不言而喻的。否则便无所谓协商可言了。还要强调指出,这里所讲的平等,乃是指澳门特别行政区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司法机关进行司法方面的联系和相互提供协助时法律地位的平等。

**第四,澳门特别行政区与全国其他地区依法进行司法协助的原则。**《澳门基本法》第九十三条,不仅是授权性规范,而且包含义务性规范,是授权性规范和义务性规范相结合的法律规范,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司法机关的司法方面的联系和相互提供协助,通过协商依法进行。这表明,澳门特别行政区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司法机关的司法协助,不仅是协商而且是依法进行的。“协商依法”,这是一个整体。在司法协助关系中,请求方在何种情况下提出请求,被请求方在何种情况下执行请求以及如何执行请求,往往与案件的性质和司法协助的内容有密切关系,这便有适用法律的问题。<sup>④</sup>一般地说,在两个法域的司法协助过程中,不论有关诉讼的性质如何,被请求方在提供司法协助时适用自己方法律,请求方提出的司法协助请求,也应符合被请求方法律所规定的实质条件和形式要求。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全国其他地区是两个不同的法域。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的法律已由《澳门基本法》第十八条予以规定。全国其他地区实行的法律是统一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体系的法律。两者是有区别的。因而由此产生的法律冲突问题应依冲突法的原理和原则来解决。但有一点是必须明确的,即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全国其他地区在司法协助过程中,在适用法律上,双方都必须与“一国两制”方针和《澳门基本法》的有关规定相一致,并且是实现这个方针的保障。

对于上述各项原则,我们应视为一个整体,它们是互相依存和互相制约的。应视为以“一国两制”为指导方针、以《澳门基本法》的各项规定为依据的指导思想的体现,而不应片面强调某一原则,忽视其他原则的贯彻执行。



澳门特别行政区与全国其他地区进行司法协助,最终要通过一定的途径和方式来建立,这是司法协助运行的组织管理保证。

对此,法学界和法律界提出了各种建议和方案,概括起来有这样四大类:

一、立法。制定有关司法协助的法律。有两种方案:

1. 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征求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意见并充分讨论后,制定一部同时适用于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全国其他地区的关于司法协助的单行法律,列入《澳门基本法》附件三的法律文件中。

2. 由公认的、有权威的学术研究机构通过广泛征求意见,拟订出法案,通过立法程序制定一部适用于全国各法域(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和全国其他地区)之间的区际司法协助的“示范法”。

二、澳门特别行政区司法机关与全国其他地区司法机关签订司法协助协议。有两种方案:

1.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签订司法协助协议,同时适用于澳门和全国其他地区。

2. 由中央授权内地某个地区代表内地法域与澳门终审法院签订司法协助协议。

三、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以其名义指导、协调澳门和内地各地区之间的司法协助。<sup>⑤</sup>

四、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全国其他地区同时相应设立官方性质的“区际司法协助委员会”,其主要职责为就两地的区际司法协助事宜进行协商并签订协议等。<sup>⑥</sup>

对上列建议和方案的论析,见仁见智。本文不拟置评。

我认为,澳门特别行政区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司法机关进行司法方面的联系和相互提供协助,最适当和切实可行的方案,乃是借鉴和参照香港特别行

政区和内地在最近就相互委托送达民商事司法文书、相互执行仲裁裁决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并签署有关文件的做法和经验。<sup>⑦</sup>

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之后,澳门和全国其他地区的司法协助,即可着手进行。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代表有计划、有步骤地分别就内地与澳门法院相互送达民商事司法文书的安排,内地与澳门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刑事方面的司法协助等进行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并签署有关文件依法实施。经过实践并不断总结经验,在各方面条件具备和成熟时,再签订全面的司法协助协议。鉴于澳门在过渡时期,许多重大罪案接二连三地发生,为保证回归后的稳定繁荣,应该把内地和澳门关于刑事方面的司法协助问题首先摆上议事日程,尽早予以解决,以便有效地打击和遏制严重的跨境犯罪,保证“一国两制”、“澳人治澳”和“高度自治”方针在澳门的有效实施。

注释:

①此文的澳门与内地分别为澳门特别行政区与全国其他地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简称

②参阅费宗祯、唐承元主编:《中国司法协助的理论与实践》,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4页。

③参见李启欣为杨贤坤主编:《澳门法律概论》所写的《序》,中山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

④同②,第22页。

⑤曲新久:《澳门与内地司法协助问题研究》,《法域纵横》,1996年第一册,澳门。

⑥《赵国强博士谈内地与澳门特区开展区际司法协助模式》,《法制日报》1999年2月11日、2月25日、3月4日第8版。

⑦《法制日报》1999年1月21日第4版,6月24日第8版。

【责任编辑:孟庆顺】

# 论澳门民法的渊源和效力

邓伟平

澳门民法是调整澳门地区一定的财产关系和人身非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澳门民法因追随葡萄牙民法而归属于大陆法系,具有大陆法系传统民法的特征。澳门本身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决定了澳门民法的渊源较一般大陆法系的国家和地区为复杂。总体而言,澳门民法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葡萄牙的民事法律,二是澳门本地立法机关制定的民事法律和法规。其中,葡萄牙的民事法律又可以分为适用于葡萄牙本土但延伸适用于澳门的民事法律,以及葡萄牙为其海外殖民地或专门为澳门制定的民事法律。而澳门本地立法机关制定的民事法律和法规包括澳门立法会制定的民事法律,以及澳门总督制定的民事法规。葡萄牙和澳门法学把民法的法律渊源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法律确认的渊源,称为法定渊源;另一类则未经法律确认,只是些学者认为其属于民法的渊源,该类渊源称为学理渊源。

## 一、法理渊源

《澳门民法典》还进一步把法定渊源分为直接渊源和间接渊源。

### (一) 直接渊源

直接渊源是由成文立法直接赋予其法律效力的渊源。该等渊源的法律效力,直接来源于法律的规定,而不必借助于其他法律条文。《澳门民法典》第1条第1款规定:“法律及同业公会的规定,均为法之直接渊源”。据此,澳门民法的直接渊源包括:

#### 1. 《葡萄牙共和国宪法》

《葡萄牙共和国宪法》于1976年4月2日由葡萄牙制宪大会通过,并先后于1982年、1989年、1992年和1997年作过四次修改。《葡萄牙共和国宪法》并不能全盘、自动、直接地适用于澳门,只有在《澳门组织章程》明示或暗示适用,以及宪法的具体条款已指明适用于澳门时,宪法的具体条款才能在澳门适用,例如第137条第9款、第164条第3款和第292条等。此外,所有不抵触《澳门组织章程》及澳门经济、财政及行政自治的宪法规范,亦适用于澳门。

#### 2. 《澳门组织章程》

《澳门组织章程》是规范澳门的政治、法律、行政、经济和财政等各个方面的基本法,在澳门法律体系中占有最重要地位,具有较高的法律效力。章程由葡萄牙共和国议会于1976年2月10日颁布施行,并分别于1979年、1990年和1996年作了三次修改。章程只适用于澳门,并适用至1999年12月19日止。《澳门组织章程》包括总则、本身管理机构、司法、财政、当地行政和补充及过渡规定6章,共72条。章程是澳门立法会和澳门总督制定民事法律和法规的权力来源和法律依据,其本身也自然成为澳门民法的渊源,但《澳门组织章程》直接调整民事活动的条款并不多。

#### 3. 《葡萄牙民法典》即《澳门法典》

《葡萄牙民法典》于1966年11月25日正式颁布,并自1967年6月1日起生效。1967年9月4日,葡萄牙颁布第22869号法令,决定自1968年1月1日起,该民法典延伸到澳门施行。它是澳门民法的核心,是澳门民法最重要、最集中的法律渊源,根据第32/91/M号法令<sup>①</sup>,自1991年5月6日起在澳门实施的《葡萄牙民法典》,改称《澳门民

法典》。

《澳门民法典》深受德国百科全书派法学的影响,以《德国民法典》为模式,采用五分法,除总则外,分成债、物、家庭和继承四大部分。因此,《澳门民法典》共有5卷,每卷再划分为编、分编、章、节、分节、条、款、项,共2334条。自实施之日起,根据葡萄牙经济的发展以及适应民事法律理论的进步,葡萄牙立法机关对民法典作了多次修订:(1)在离婚制度方面。1975年,葡萄牙颁布法令,废除民法典第1790条,该条法律禁止1940年8月1日以后订立的天主教婚姻离婚。1976年,该项法令延伸到澳门生效。(2)在不动产租赁制度方面。1976年《葡萄牙宪法》颁布后,为与新宪法的精神及规定达到一致,葡萄牙对民法典的不动产租赁制度作了修订,并于1977年11月25日第496/77号法令公布,这次修改于1978年延伸到澳门适用。(3)在永佃权制度方面。1976年,葡萄牙以第196-A号法令废除民法典中的永佃权制度,但这一法令未延伸至澳门适用<sup>②</sup>。对民法典的修订还包括成年的年龄界限改为18岁,未亡配偶则取得了特留份继承人的地位等。

#### 4. 国际公约和双边条约

葡萄牙参加的国际公约和双边条约,有部分涉及民事活动的调整,延伸适用于澳门后,亦成为澳门民法的渊源。例如,《公路交通公约》、《取消要求外国公文书的认证公约》、《关于巴西人与葡萄牙人的权利与义务平等的条约》,以及《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权利国际公约》等。

#### 5. 单行的民事法律和法规

除《澳门民法典》外,葡萄牙为其海外殖民地或专门为澳门制定了一些民事法律,澳门立法会和澳门总督也制定了不少民事法律和法规。这些单行的民事法律和法规一般以特定的民事法律关系为对象,只调整特定领域的民事活动。作为澳门民法的重要渊源,这些民事法律和法规是《澳门民法典》的必要的补充。适用于澳门的单行民事法律和法规数量较大,种类繁多,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 合同方面。主要有《制定合同的一般条款的法律制度》、《重整及调整有关发展房屋合同规范》、《分配裁判合同形式》和《预约合同》等。

(2) 民事登记方面。主要有《民事登记法典》、《强制民事登记法典》、《出生和结婚强制登记法》、《汽车及商业登记法》等。

(3) 租赁和借贷方面。主要有《租税法》、《订定有关法定利率、高利、复利及贷款的措施》等。

(4) 物业方面。主要有《物业登记法》、《土地法》、《经济房屋条例》、《分层楼宇法例》、《房屋兴建发展合同条例》等。

(5) 婚姻、家庭方面。主要有《家庭政策纲要法》、《海外未成年人法律援助通则》等。

#### 6. 同业公会的规定

由代表不同道德、文化、经济或职业的机构按其职责而制定的规则,以及与其有关的章程及内部规章,均视为同业公会的规定。《澳门民法典》确认;同业公会的规定也是澳门民法的渊源之一,具有法律效力,但同业公会的规定不能违背法律的禁止性规定。

#### (二) 间接渊源

间接渊源本身并无法律效力,而需依赖法律的其他规定才能作为法律渊源。该等渊源发生法律效力具有特殊性,即必须以有法律的明确规定为前提。《澳门民法典》确认的间接渊源有判例、习惯和平衡原则。

##### 1. 判例

判例是法院可以援引作为审理同类案件的法律依据的判决和裁定。判例作为法律渊源是英美法系的传统,在英美法系各国和地区,判例是重要的法律渊源,但在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法院的判决和裁定只对当事人有效,而不构成规范性的指引,作为其他法院审理同类案件的法律依据。原则上,判例在隶属于大陆法系传统的葡萄牙和澳门,也没有规范性文件的效力。数十年来,由于各国法律学者交流的增多,互相理解的加深,而带来两大法系逐步靠拢。这种情况自然也反映到葡萄牙民法典的制

定当中。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葡萄牙民法典》肯定了判例作为民法渊源的可能性,在第2条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法院得通过判例确定具有普遍约束的学说”,在拒绝判例作为法律渊源的国家,法官在解释和填补法律的空白时,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由于不同的法官对同一或同类案件及其适用的法律有不同的理解,而往往出现不同的裁判的情况。为了解决这一弊端,《葡萄牙民事诉讼法典》规定遇类似情况,须向最高司法法院全会上诉,并由该院4/5以上的法官参与审判。最高司法法院除对案件作出判决外,还将其裁判的论据概括成普遍的规范,载于判决的最后部分,称为最高司法法院判例指引,这些判例,对所有其他法院审理同类案件有普遍约束力。在葡萄牙,最高司法法院已经制定了许多判例,这些判例有些也延伸到澳门适用。根据法律的规定,成立于1993年4月的澳门高等法院也可以制定判例,并以此规范澳门各级法院的审判活动。

## 2. 习惯

习惯是在社会生活水平中经过长期实践而形成的为人们共同信守的行为规则,时至今日,习惯早已不是法律的直接渊源。《澳门民法典》第3条第1款明确:“法律有规定时,不违背善意原则的习惯均可视为在法律上可接纳。”据此,习惯亦成为澳门民法的间接渊源。

## 3. 衡平原则

源于英国的衡平原则,早已成为英美法系法律的传统渊源,也是历来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区别点之一。衡平原则的功能就在于允许法官考虑各个具体案件的特殊因素,以理性和公正为依归,在不完全按照法律具体条文规定的情况下,自由地作出裁判,而不只是机械地死板地引用法律条文,毫无弹性。大陆法系各国则强调这一做法容易引致任意性,进而牺牲法律的准确性和权威性。秉承葡萄牙的大陆法系传统,《澳门民法典》第8条第2款明文规定法官“不得借口法律所规定的内容不公正或不道德而不履行遵从法律的义务。”但是,最近数十年来两大法系互相学习的潮流同样影响了葡萄牙

和澳门对衡平原则的观念。衡平原则的运用已不象以往那样绝对不可接受。正是受这种新的观念影响,《澳门民法典》在强调法官即使认为某法律条文对某具体案件有不当之处亦必须彻底引用法律的前提下,在第4条明确规定:“在下列情况下,法院得按衡平原则解决纠纷:(1)法律规定容许的;(2)当事人有合意,且法律关系非为不可处分的;(3)当事人按可适用于仲裁条款的规定,预先约定采用衡平原则的。”

## 二、学理渊源

除由《澳门民法典》明文规定的直接渊源和间接渊源外,一些学者认为学说和法律基本原则也是民法的渊源<sup>③</sup>。学说即法学专家的研究成果。虽然法官在法律上不受学说的约束,但学说在司法实践中的重要性及其对法官在思维方面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在一些学者看来,法律不是许多毫无关联的规则之汇集,法律条文之间具有有机的联系,并可以从中推出一些原则来。法律的这些基本原则,对法官审理案件具有指导意义,甚至可以直接作为法律渊源,据此对案件作出处理。这种观念,在西班牙已为成文立法所接受。但学说和法律基本原则的法律渊源地位至今仍未被澳门的成文法确认。

澳门民法的渊源很多,不同的渊源具有不同的法律效力,它们并不在同一效力平面,而是各自处于不同的等级之中。

### (一) 宪法性法律

在澳门地区的民事法律渊源中,《葡萄牙共和国宪法》仍然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其他民事法律不能与之相违背,否则即为违宪,将失去法律效力。

鉴于澳门所处的特殊地位,《葡萄牙共和国宪法》既是澳门具有最高效力的法律,但其条文又不能全部适用澳门。为此,《澳门组织章程》应运而生,作为澳门地区的基本法,《澳门组织章程》具有仅次于《葡萄牙共和国宪法》的法律地位,而从



实际影响和作用看,《澳门组织章程》还要更大一些。

## (二) 法律

由立法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为狭义的法律,其效力仅次于宪法和宪法性法律。除《葡萄牙民法典》外,延伸适用于澳门的其他由葡萄牙立法机关制定的民事法律,均属此类。1976年,澳门立法会成立,并享有独立的立法权,有权在经济、行政、财政、司法等自治权范围内立法。澳门立法会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称为法律。总督与澳门立法会分享立法权,得以法令的形式立法。因此,澳门本地立法机关和总督制定的法律和法令,其地位亦仅次于宪法和宪法性法律。

## (三) 规章

规章的效力,低于法律。在澳门适用的规章分别由葡萄牙政府、澳门总督、澳门市政机构和澳门政府有关部门制定。

## (四) 同业公会的规定

同业公会的规定的法律效力,处在宪法、法律和规章之后,位居第四。《澳门民法典》第3条第2款明确规定:“同业公会的规定,优于习惯。”因

此,其法律效力高于习惯。

## (五) 习惯、判例和衡平原则

习惯、判例和衡平原则也可以作为处理民事纠纷的依据,但其适用必须以一定的法律规定为前提,且各有一定的适用条件和范围,因此,习惯、判例和衡平原则的法律效力等级较低。

注:

①该法令共3条,其中,第1条修订,《葡萄牙民法典》第31条,将法律适用的属人主义改为属地主义;第2条废除1948年的第36987号法令;第3条则规定:凡《民法典》中所指的葡萄牙,均改为指澳门。

②葡萄牙法律及其修订延伸到澳门适用并是必然的,它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法律或修订本身载明经《澳门政府公报》公布后适用于澳门;二是在《澳门政府公报》上实际公布。参见《澳门组织章程》第69条。

③参见范高祖、贾辉南、欧文道、官宝龙:《民法概要I》,澳门法律出版社,1993年,第28-32页。

(责任编辑:孟庆顺)

(上接第51页)

土生作家作品如《爱情与大脚趾》、《迷人的辫子》两部长篇小说,带有中国传统美学精神的影响,以大团圆结局结尾,类似中国传统的叙事文学,异于西方小说的悲剧式结局。当然,他们的作品更多表现西方文学的特点。如《蛋家女阿张》中蒙太奇式的画面描写:“那隐没在三角洲灰蒙蒙的桑梓,小山背上耸立着一座庙宇,光头和尚在那里诵念佛。”玛尔丁尼的《废墟的风》中许多地方采用了“意象”、“暗示”等西方象征主义的艺术手法。

在语言上,土生文学中的“澳门土语”早引起

国外语言学家的注意。

土生葡人作为葡萄牙人的后裔,是葡国文化的天然继承者,同时他们又在地域上、血缘上和中国人有分不开的联系。因此他们的心理结构、思维方式、审美情趣、价值观念都不是单一的。土生作家作品的特点反映出他们身上双重文化的影响,他们在作品中所表达的欢乐、痛苦、迷惘、失落,无不体现出他们在特殊的历史条件、文化背景和生活环境所形成的特殊心态和感情。

【责任编辑:许锡挥】

# 戴裔煊先生与澳门史研究

章文钦

1998 年 9 月 12 日, 是中山大学历史系戴裔煊教授逝世十周年; 12 月 28 日, 又逢戴先生诞辰九十周年。蔡鸿生教授编的《澳门史与中西交通研究——戴裔煊教授九十诞辰纪念文集》已于同年由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戴裔煊先生是我国历史学界、民族学界知名的前辈学者, 在民族学的西方民族学史、中国西南民族文化史, 历史学的宋代盐制史、世界史、中外关系史和澳门史等学术领域, 都曾进行过艰苦的探索, 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果。1999 年, 我国人民迎来澳门回归祖国的盛事, 中国人民收回澳门的正义事业将获得圆满成功。作者谨将载入纪念文集的《戴裔煊先生传略》中有关澳门史研究一节排比成文, 以纪念这位曾在这一学术领域进行开创性的探索, 为中国人民收回澳门的正义事业作出贡献的前辈学者。

澳门史的研究, 是戴先生后半生倾注最多心力的一个学术领域。他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始于 1956 年, 当时的葡萄牙独裁政府和澳葡当局策划在 1957 年举行澳门开埠 400 周年的纪念活动, 并将澳门作为其海外殖民地的“澳门省”, 遭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反对, 国内史学界因之掀起澳门史研究的热潮, 他正是在这个热潮中开始研究澳门史的。

戴先生认为, 广东是祖国的南大门, 毗邻港澳。香港是在鸦片战争后, 英国政府通过道光二十

年 (1842) 的《南京条约》强迫清政府割让的, 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但澳门怎样被葡萄牙占领, 则鲜为人们所了解。国际上所谓汉学家诸多猜测考订, 反而越考越糊涂, 越使人迷惑。在这样的重大问题上, 存在着这样的糊涂情况, 确实是中国学者的耻辱。他激于义愤, 考校中外文献, 驳斥荒谬言论, 实事求是, 辨明真相。他晚年常对作者说: “我们研究澳门史, 就是为了证明: 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中国完全有权收回澳门。”

戴先生还认为, 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中国的早期侵略活动是从葡萄牙殖民者开始的。十六、十七世纪的葡萄牙殖民者闯入了中国沿海, 在当时的中西关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 明清时期中葡关系和葡萄牙殖民者占据中国领土澳门的历史, 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有其特殊的地位, 是中西交通史与近代中外关系史的转折点。因此, 研究澳门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学以致用治学原则和深邃敏锐的学术眼光, 促使戴先生投身于这项重要的学术研究。按照他历史的治学路数, 这一领域的研究仍从专题研究做起。

1957 年, 戴先生在《中山大学学报》第 3 期发表长达 25000 字的论文《关于澳门历史上所谓赶走海盗问题》。日本学者藤田丰八认为, 这一问题是在澳门历史上, 以至中葡关系史上最为重大而有趣的问题。十七世纪以来, 葡萄牙殖民者与耶稣会士

狼狈为奸，无中生有地宣传葡人为中国政府赶走海盗，中国政府把澳门给他们作为酬劳的谬论，以掩盖其占据中国领土澳门的实质。近代葡萄牙的澳门史学者蒙塔尔托（Montalto de Jesus）、布拉加（J.M.Braga）和法国汉学家高第（Henri Cordier）、伯希和（Paul Pelliot）等人，则推波助澜，把这说成是信史。文中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根据确实可靠的史料，就澳门历史上的所谓赶走海盗问题，对它有什么原始资料根据？所根据的资料是怎样来的？是否可靠？海盗首领是谁？究竟是怎样一回事？谁代表中国政府把澳门给了葡人？有什么凭证？等问题进行严密的逻辑论证，揭露葡萄牙殖民者和耶稣会士企图以嘉靖四十三年（1564）葡人协助广东当局镇压柘林海兵起义事件，作为其在嘉靖三十六年（1557）入据澳门的理由，结果演成事迹、时间、人物方面矛盾百出。从而澄清史实，阐明真相。发表以来，引起学术界的重视。1987年，曾由澳门星光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1958年，戴先生在广东史学界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提交了另一篇专题论文《关于葡人入据澳门的年代问题》。关于葡人入据澳门的年代，是西方殖民主义的先驱者开始占据中国领土的一个年代，也是中外学者长期以来各执一词，众讼纷纭，未能确定的年代。确定葡人入据澳门的年代，不但可以解决中外学者争论多年，悬而未决的问题，而且围绕这一中心问题展开讨论，还可以阐明葡萄牙殖民者最初入据澳门的真相，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因此，无论在中国史或世界史方面都有重大的意义。

关于这个问题，《明史·佛郎机传》根据《天启实录》卷六天启元年（1621）六月丙子条按语，说正德年间，广州市舶司移于高州电白县，“嘉靖十四年，指挥黄庆纳贿，请于上官，移之濠镜，岁输课二万金，佛郎机遂得混入。”此文根据葡萄牙方面的记载，证明葡人在嘉靖十四年（1535）和二十一年（1542）一再来中国做买卖，仍然遭到拒绝。明代广东市舶司向来设在广州，并没有移至电白或濠镜。明政府允许葡人每岁缴纳船税26000两，听

其船舶载货来澳门贸易，乃是隆庆五年（1571）以后的事情。至于所谓指挥黄庆，嘉靖间澳门历史上从来未出现有这样一个有之，是万历五年（1577）以后才移镇澳门的王绰。从而证明嘉靖十四年说不能成立。

关于葡人入据澳门年代的可靠记载，应当是嘉靖三十二年（1553）和三十六（1557）。嘉靖三十二年说的主要根据是郭棐万历《广东通志》卷六九《外志·澳门》条的说法：“嘉靖三十二年，夷船趋濠镜者，托言舟触风涛缝裂，水湿贡物，原借地晾晒，海道副使汪柏徇贿许之。时仅蓬累数十间，后工商牟奸利者，始渐运砖瓦木石为屋，若聚落然。自是诸澳俱废，濠镜为舶藪矣。”嘉靖三十六年说的主要根据是十六世纪来过中国的葡萄牙海盗商人平托（F.M.Pinto）的《旅行记》（Peregrinação）第221章的说法，谓1557年，广州官吏因本地商人的请求，将澳门给与葡人。然而，嘉靖三十二年说与嘉靖三十六年说在时间上相差四年，是什么缘故呢？文中认为，嘉靖三十二年葡人贿赂海道副使汪柏，被允许入濠镜澳居住的开始，葡人由蓬累数十间，至用砖瓦木石建成永久性的房屋，中间经历了四年的过程。从嘉靖三十二年起算，着眼点放在事情的开始，从嘉靖三十六年起算，着眼点放在事情的归宿，两说都没有错误。如今，在学术界，这种观点已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

可是，在以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由于受到“左”的思潮的影响，一些在政治上比较敏感的学术领域被视为禁区，戴先生对澳门史的研究，受到不应有的冷遇，甚至到80年代初期，北京一家学术刊物仍以“涉外文章”为理由，拒绝刊载《年代问题》这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现由蔡鸿生先生将此文载入纪念文集，始首次公开发表。然而，戴先生始终坚信澳门史的研究，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对中国人民收回神圣领土澳门的正义事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这种重要性还未被人们所认识的时候，他不为外界因素所干扰，继续潜心研究澳门史，坐了二十多年的“冷板凳”。

1963年,戴先生撰成另一篇论文《一五五七至一五八〇年间的澳门》(未刊稿)。此文的重点在探讨葡人如何由最初入据澳门转变为长期磐踞澳门的问题。

戴先生把葡萄牙占据澳门的历史分为入据、磐踞、强占三个阶段。从嘉靖三十二年(1553)葡人利用贿赂入据澳门起到隆庆五年(1571)为入据阶段;从隆庆五年殷正茂任两广总督起到道光二十九年(1849)为磐踞阶段;道光二十九年以后为强占阶段。在葡人入据、磐踞澳门的阶段,中国对澳门拥有完整的主权;葡人强占澳门以后,中国的主权受到严重损害,但澳门的主权仍然属于中国,中国完全有权收回澳门。此文认为,从隆庆五年至万历三年(1575)殷正茂任两广总督时,是葡人由入据澳门到长期磐踞澳门的转折点。在这个时期,明政府对澳葡采取了征收船税、地租和建立关闸三项措施;为了获得对外贸易的利益,对澳葡采取容忍姑息政策,容许他们居留澳门,同时加以防范约束。从此以后,直到道光二十九年,明清政府对澳门的方针、政策和措施都基本定型了。至此,戴先生关于澳门史的研究已基本形成体系。

“文化大革命”期间,先生的澳门史研究被迫中断。幸好原来搜集的资料被保存下来。

1970年,戴先生从干校返回中山大学,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重新开始澳门史的研究。利用手头仅存的资料撰成《〈明史·佛郎机传〉笺正》一书。书稿的题目曾加上副题《葡萄牙殖民者占据中国领土澳门史料》。当时,此书根本没有出版的希望,但先生坚信,书中所考订的史实和提供的资料,对日后收回祖国领土澳门的正义事业有参考价值。

《明史》在前人著述的基础上几经删订写成,一贯以佳史著称。《佛郎机传》是《明史》中关于明代中葡关系和澳门历史的重要著述。先生正是将《明史·佛郎机传》作为明代中葡关系和澳门历史的一个重要课题来研究。他发现传文由于时代的局限、语言文字的隔阂和误信误据错误的记载,以致

在牵涉重大问题的史实本身,疏漏舛讹百出。遂重新探索考据,裱阙正误。除订正嘉靖十四年(1535)葡人入据澳门之说的错误外,又如传文误信误据何乔远《名山藏》的《王享记·东南夷·佛郎机》条约说法,妄称嘉靖八年(1529)广东巡抚林富的请通市舶疏内说“今许佛郎机互市有四利”,遂武断地说“自是佛郎机得入香山澳为市。”《笺正》从黄佐《泰泉集》中找出由黄佐代作的林富原疏,疏中明明主张,许通市舶的仅限于《皇明祖训》和《大明会典》所载的国家,“其《祖训》、《会典》之所不载如佛郎机者,即驱逐出境,如敢抗拒不服,即督发官军擒捕。”可见疏中不但没有主张许佛郎机互市,而且主张严行拒绝。传文竟增改了原作,完全与林富的愿意相反。

书中除根据《海盗问题》和《年代问题》两文的研究成果,阐明葡人什么时候和怎样入据中国领土澳门的问题之外,还参考中外文资料近百种,以《明史·佛郎机传》为纲,就明代葡萄牙殖民者占据中国领土澳门的经过,以及他们掠买人口,擅自修筑城垣炮垒,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种种罪行,中国人民反对葡萄牙殖民者的斗争等等问题,根据史实,加以阐明。

中国学术界关于《明史·佛郎机传》的研究著作,除戴先生此书之外,还有梁嘉彬先生的《〈明史·佛郎机传〉考证》和张维华先生的《明史·佛郎机传》注释,<sup>①</sup>梁、张二先生亦为研究中西交通史的知名前辈学者,然二书撰成于三十年代初期,为二先生的早期作品,虽亦皆具见功力,有所创获。而戴先生此书成于晚年,积中西交通史与澳门史之学养,蕴藉既厚,功力益深,可谓后出转精。198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后,被誉为考证缜密,说理透彻,叙述清晰的一部有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的著作。曾获得广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然而,有些研究澳门史的朋友或认为书中存在着“左”的倾向,颇不以为然。据作者所知,戴先生在1970年撰成此书时,却被视为观点太“右”。

如果我们能体会当年他从事这一研究的处境；以及社会上极“左”思潮泛滥，形而上学猖獗，澳门史的研究仍被列为禁区；当年在国内能坚持这一研究者除戴先生之外并无第二人，种种情形，便不会苛求于前人了。

戴先生撰写《笺正》的过程中，在考察嘉靖年间葡萄牙殖民者在中国东南沿海活动情形的同时，还注意到当时活跃在中国东南沿海，与葡人有密切关系的所谓倭寇海盗。把倭寇海盗的活动，同当时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封建政府推行的海禁政策联系起来，进行分析研究，就嘉靖年间倭寇发生的原因及其特点、阶级成份等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在此基础上，于1976年写成《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一书，作为澳门史研究的副产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术界逐渐恢复了生机。随着许多学术禁区的打破和澳门回归祖国被提上议事日程，澳门史的研究，也逐渐由“冷门”变成“热门”，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戴先生以他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为中国人民收回澳门的正义事业作出宝贵的贡献。然而，他对此并不自满，虽然进入晚年，犹壮心不已。他借助一本法文本的葡文语法，自习葡语，以期能直接利用葡文资料。又由他的女婿、原《红旗》杂志编辑钟国豪先生和作者协助整理，力争写成一部贯通明清两代的《葡萄牙占据澳门史》，再将所搜集的资料编辑成册。由于种种原因，这项工作先生在去世后陷于停顿，成为一件憾事。

戴先生在去世的前一年，在1987年3月26日《中葡联合声明》草签之际，曾应《学术研究》杂志的邀请，谈了对澳门史研究的看法。该刊同年第3期发表署名史能的学术专访《戴裔煊教授谈澳门

史研究》载，戴先生指出，“澳门史的研究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有许多问题尚未解决。比如研究的领域和课题要进一步扩展。他说，我本人主要从政治史的角度来分析和弄清葡人何时入据澳门和怎样入据澳门的问题，从而在重大原则方面论证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在时间范围上则侧重于明代。而作为一个整体性的研究，澳门史应当包括政治史、经济史、交通史（按：指对外关系史）和宗教文化史等等。但这些互相联系、不可或缺的课题，现在还研究得很不够，究其原因，主要是这方面的研究力量薄弱。……戴先生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加入澳门史研究的队伍中来。鉴于目前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 and 欧美、日本等国家都有从事澳门史研究的学者，所以，戴先生建议加强国内不同地区以及中外学者的学术交流，互为补充，从各个不同角度来对澳门史作综合性的研究。”

学术是天下的公器，也是一种世代相传的事业。对十余年来澳门史研究所取得的进展作回顾与前瞻，不能不佩服这位前驱学者的高度预见性。而戴先生在澳门史研究中所体现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给后辈学者留下的启迪和教益，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更显出其价值。

注：

①梁著刊于中山大学《文史研究所月刊》，第2卷第3、4期合刊（1934），为研究王鸿绪《明史稿·佛郎机传》之作；张著为《〈明史·佛郎机、吕宋、和兰、意大利亚传〉注释》的一部分，该书于1934年由哈佛燕京学社出版，1982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改名《〈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

【责任编辑：许锡挥】

# 读《澳门通史》

李 燕      司徒尚纪

澳门自古即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自16世纪中叶开埠以来,沧桑世变,世事更迭,客观上铸就了澳门作为国际贸易往来的中转港和中西思想文化交流的桥梁这一不争事实。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珠江三角洲经济的迅速崛起,粤港澳经济一体化格局已被具雏形,澳门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也愈发显得重要。值此世纪之交,中国即将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而澳门也因这一历史性转折而备受世人瞩目。为了让世界了解澳门曲折的发展历程和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等,中山大学黄启臣教授历十六年艰辛而成就的《澳门通史》一书的问世,则不啻为迎接澳门回归这一盛事的最好献礼。

这是迄今为止我国首部全面系统地叙述澳门自远古开始至回归祖国之前的历史发展的通论性著作。全书共65.8万字,分22章72节。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纵横捭阖,谈古论今,不仅追溯了澳门自史前文明伊始曲折而特殊的发展道路,而且对澳门政治、经济、文化的每一侧面无一不作了淋漓尽致的描述,可谓包罗万象,详尽入微。谋篇布局亦甚为得当。首从澳门历史发展的地理基础入手,对澳门的自然生态和人文地理进行分析,如地质地貌、水文气候、地理位置及人口繁衍的演变规律等,言简意赅,全而不杂。继而罗列大量确凿的考古资料,证明早在远古时代古老的中国越族祖先就一直在澳门地区劳动生息,并与珠江三角洲古越族先民文化一脉相承,即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接着又以大量史实证明在1553年葡萄牙人进入澳门之前世代代都有中华民族子孙繁衍生息,从而有力地驳斥了某些外国学者对澳门历史事实的歪曲。在叙述澳门自葡人入侵以来的四百多年历史时,为避免事件纷纭、杂无头绪而失去重点,作者采用了时段比较分析法。根据历史发展的脉络特征,将其划分为明、清、近代和现代四个时期;在

每一时代剖面上,都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阐明其发展过程,描述其阶段特点,并分析其发展机制和内在规律,同时,每一项内容都注重反映澳门华洋杂处的特殊性。纵横结合,系统完整地构建出澳门历史发展的框架体系,为读者认识澳门、思考澳门、研究澳门提供了丰富可靠的史料依据。

本书作者素以经济史研究和比较分析见长,故对澳门经济兴衰史研究尤为透彻,见解尤为精辟。从明代澳门对外贸易的一枝独秀和经济兴盛,经清代对外贸易的式微、经济衰退以及鸦片走私和苦力贸易的猖獗,近代国际贸易中心地位的失落、以手工业、渔业、商业、金融业等为代表的澳门经济的缓慢发展和博彩等特种行业的畸形繁荣,至现代澳门经济呈多元化结构的迅猛发展和经济腾飞,无不以高超的写作手法,勾勒出澳门经济兴衰的全貌。但作者并不以此为满足,在叙述历史的同时更着重于对其内在机制和原理的思考和探讨,以澳门现在和将来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或参考。如对外贸易在澳门向居特殊地位,其兴衰过程几乎左右了澳门经济的历史发展,作者对此亦颇有研究。从政治、经济、自然、社会等多个方面探求其兴衰原因,指出明清两代的对外贸易政策,西方国家之间的利益争夺,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以及澳门自身的地理位置与港口条件等,都是影响澳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从而揭示其外贸经济由盛而衰的历史必然性。然而澳门经济在几经衰退、困难、恢复的起伏跌宕之后,于本世纪70年代重新起飞并进入高速发展时期,作者对这一现象也进行合理解释,将其归结为六个因素:中葡关系的改善;大陆的对外开放政策;工业出口产品获得的优惠待遇;充足而廉价的劳动力;日趋改善的城市基础设施;优异的地理位置,从而使读者对澳门经济的历史变迁有更深层次的理解,不仅了解事物的表象,更可以深刻认



识其本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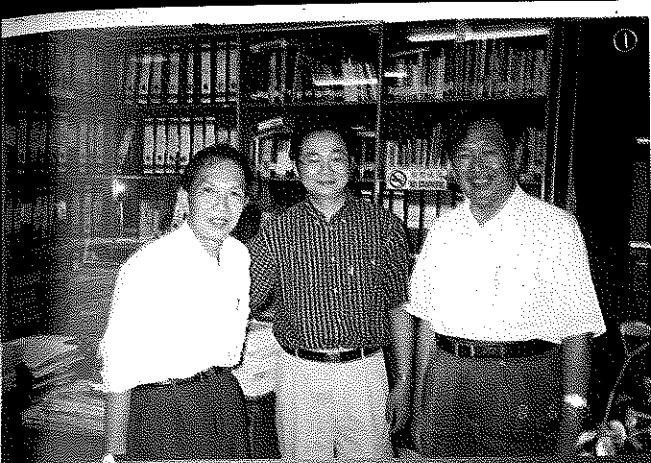
本书在内容的选择与编排上也不乏独到之处。资源丰富,条理清晰,举凡任一时段,任一方面,无一不作详尽、系统地阐述,可谓是研究澳门历史必不可少的参考用书。与以往同类著作相比较,本书最值得称道之处在于其近代史和现代史两部分。在此之前,对于澳门历史的研究多偏重于明清时期,近代史虽有涉及,多失之于简略,现代史方面的系统研究则寥若晨星,屈指可数。本书则弥补以上的不足,可称是目前最系统、最完整的一本澳门历史专著。如近代史部分,首先详细叙述了澳门领土主权被破坏的前后始末根由,并指出“澳门一直是中国领土,中国拥有主权,只不过在 1887 年后遭到破坏,而变成了中国领土,葡国管理的一个特殊地区而已”。表明葡人管理澳门其实只有 1887 年后的 100 多年时间,而非习惯上所认为的 400 年时间。对于葡人管理澳门的政治体制,作者也有较为详尽地介绍。此外,本书还加述了初期康有为、孙中山等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在澳门的活动以及抗战时期澳门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并以新近发现的档案资料为依据,重新解释抗战时期澳门所谓“中立”之谜,这是本书一大贡献。有关近代澳门经济的研究,此前亦无专门论述。本书则以一章篇幅,分渔业、手工业、商业、外贸、交通运输与邮电通信业、金融业、博彩等特种行业七个部门进行分析研究,阐明这一时期作为从清后期经济衰退至现代经济腾飞的缓慢过渡阶段的重要性。再如现代史部分,以中国人民为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而进行的斗争为基础,详述了中国政府为解决澳门问题所进行的种种努力,《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的签署过程,《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制定、颁布及其内容、特点等,从而首次完整地展现了澳门自远古文明诞生——葡人入侵——主权被破坏——恢复行使主权的全过程。至于澳门现代经济的发展,作者采用了全书近 1/5 的篇幅,约 120 页,对工业、农业、渔业、对外贸易、市内商业贸易、房地产建筑业、旅游博彩业、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业、财政金融业等多个部门的结构、特征和发展趋势进行论述,可谓备尽其详,堪称国内首例。此

外,有关澳门近现代的教育和文化事业,如教育制度、教育行政管理、文学艺术、戏剧音乐、新闻出版、文化设施等,本书也提供了详尽的历史资料。这样的通史,可以使读者获得全过程的系统了解,不仅认识澳门的前天和昨天,而且对澳门的今天也有真切感受和深刻印象。因此,本书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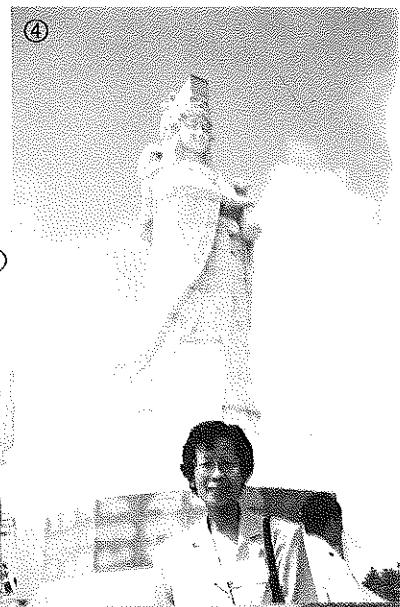
除此之外,本书的学术价值也无需赘言。论述精辟,见解深刻,观点独到,但绝非以个人观点强加于人,而是以大量丰富可靠的史实为依据,作出科学、合理而具说服力的解释。据粗略统计,本书引用注解 466 条,包括正史、方志、各朝实录、政府公报、年鉴、档案、专著、杂志、报章、公私笔记、研究报告、诗词、碑记等中外文文献资料 206 种,其中不少是前人未引或极少引用过的,如《葡中关系史资料汇编》、《澳门专档》、《葡萄牙东坡塔档案馆藏汉文文书》等;另作者还配用了图画、照片等 94 幅,统计图表 85 个,图文并茂,生动形象,既增强历史真实感,又能激发读者兴趣。不论是立论抑或是推理,均援引不同出处的原文加以印证,或以直观的图表以资证明,资料翔实,论据有力,从而使其结论更具科学性和权威性。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作者数十年来潜心致力于澳门历史的研究工作,已先后出版了《澳门港史资料汇编》(合编)、《澳门经济四百年》、《澳门宗教》(合著)、《澳门历史(自远古—1840 年)》、《中外学者论澳门历史》等专著,发表相关论文 30 多篇,并数十次赴澳门实地考察,收集资料,为本书的完成奠定了坚实基础。总览全书,时间跨度大,覆盖面宽广,但作者以深厚的史学功底和精妙的写作手法为基础,将大量的历史资料揉合于一体,内容充实而不冗长罗嗦,行文流畅,条理清晰,系统完整地叙述了澳门沧桑历史,可谓集国内研究之大成的作品。既是学者、专家、研究人员等案首必备的参考书,也可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认识澳门的过去和现在,共创澳门美好的未来。

【责任编辑:周运源】



① 本校港澳研究所所长陈广汉教授（中）与雷强教授（右）访问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左为该中心黄汉强主任。



③ 本中心粤港澳文化关系课题组人员访问澳门中华教育会。右二为该会理事长刘美冰女士。左二为吴福光教授，右一为李辉讲师，左一为张振江讲师。

④ 本校港澳所郑佩玉教授在澳门。

⑤ 中山大学老校友参观澳门岭南中学。

⑥ 澳门回归与穗澳合作研讨会在广州举行。本中心多位代表出席。







母亲，我回来了！